

2935

12 AUG 1957

A 15

歷史教學

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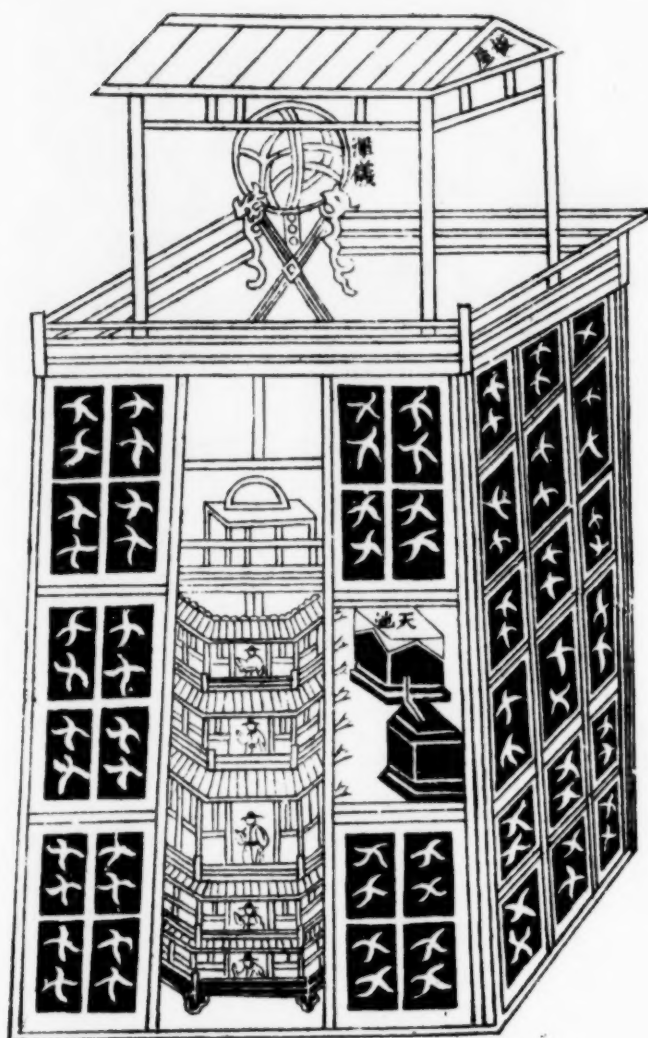
3

3 APR-6
C007 7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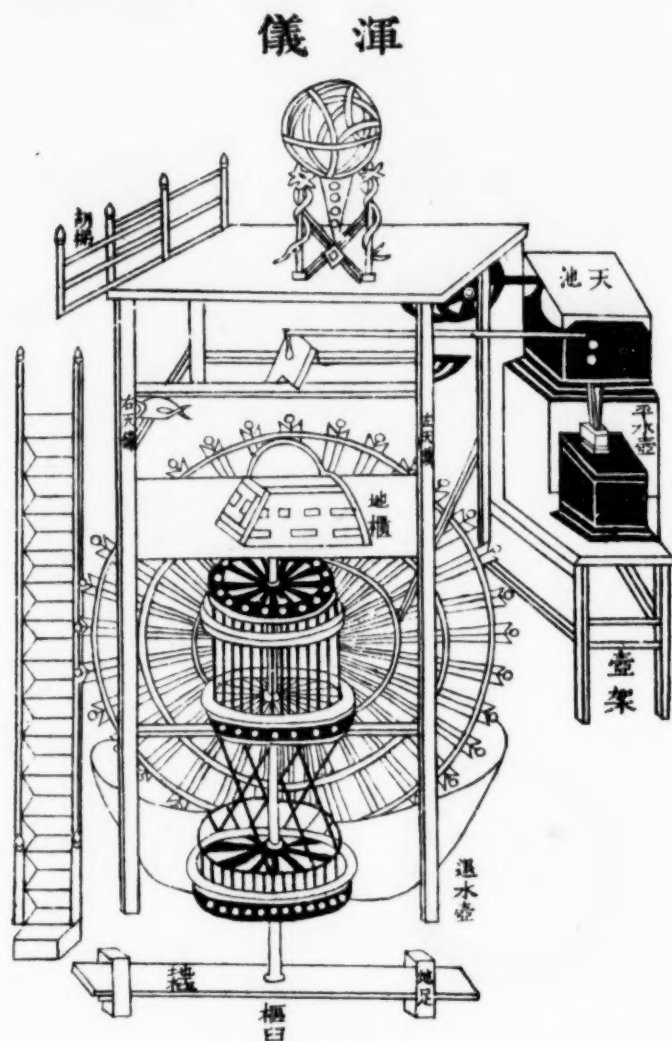
1957

中國歷史參考圖片(二十七)

圖一 水运儀象臺



甲、水运儀象臺 (外形)



乙、运动儀象制度 (内部構造)



圖二 岳飛像

說明

圖一 水运儀象臺

甲、水运儀象臺(外形)乙、运动儀象制度(内部構造)

1088年苏頌制造，臺分三隔，上隔置渾儀，中隔置渾象，下隔置司辰。司辰有水閘五層，每層都有門，門里有木人出入报时。右边設有几个水壺，引水升降，以轉机輪。“时至刻臨，則司辰出告星辰躔度所次，占候測驗，不差晷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鐘，是近代机械鐘的始祖。(采自“新儀象法要”)

圖二 岳飛像

宋刘松年画，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这是現存最早的岳飞画像。(采自“岳飞傳”)

目 录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紀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卅二周年 邓初民 (2)

教 学 参 考

初級中学課本中国历史第二册的基本綫索和重点 王永兴 (7)
 明正統年間叶宗留邓茂七起义的經過及特点 李龙潜 (11)
 試談孙中山的土地綱領 尹广瑤 (17)
 略談拉薩尔的历史功績和錯誤 关勛夏 (21)
 兩次大战之間英美对德国的扶植和縱容 李純武 (26)
 反法西斯統一战綫是怎样形成的 穆 林 (30)

补充
资料

布列斯特和約的簽訂和条款 王繩組 (36)

讀 史 参 考

从讀史的方面談談“詩經”的时代和地域性 孙作云 (38)

教 学 問 題

談談历史課联系现实的目的和原則 天津市一中政史教研組 (45)
 对于在历史教学中如何联系现实的意見 天津师范学院 黄光碩 (47)
 关于分析和組織教材的几点体会 东北师大附中 王 登 (50)

書 評

对初中課本世界史上册的一些意見 楊連山等 (53)

圖 片

中国历史参考圖片 (二十七) 世界历史参考圖片 (十四) (封里、封底里)

問 題 解 答

1.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距今五十万年, 还是五、六十万年?
 新石器时代距今一万年还是五、六千年? 安志敏 (56)
 2. 什么是驛站? 胡如雷 (56)

历史教学

· 月 刊 ·

一九五七年三月号

(总第 75 期)

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历史教学月刊
 編輯委员会

出版者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錦州道六号)

發行者 天津市报刊推广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局
 代售处: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印刷者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

定价每册 0.30元

預定价目

三个月三期 0.90元
 半年六期 1.80元
 全年十二期 3.60元

本期印数 1—44,000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紀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卅二周年——

邓 初 民

各个时期历史的主体都是人民，中国近代史的主体也是人民，孙中山先生则是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人民的领袖，人民革命的领导者。

各个时期的历史都有它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近代史也有它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应该从社会历史生活的内部去找，首先应当注意社会的经济诸关系，特别是它的生产和生产方式，对于有阶级的历史，还应当注意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遵循着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去领导人民的革命斗争，就会取得胜利。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的某些胜利，例如推翻了继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和打破了继续二百多年的清朝统治的“民族牢狱”，就是这样取得的。而辛亥革命所要完成的基本任务，即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任务，终于失败了，这也是受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限制的。

大家都懂得这一真理，哲学的任务，不仅在于认识世界，而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那么，历史科学的任务，就不仅在于认识历史，而重要的在于改造历史。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就是这样来考虑问题的。只有懂得和总结过去阶级斗争和革命斗争及其领导人物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而又能虚心接受这些经验教训，来为当前的革命斗争和所要完成的任务努力奋斗，才能把旧历史改造为新历史，才能把人类历史逐步推向更高阶段的发展。

我这里所说的中国近代史，是专门指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止

的这八十年的历史。

鸦片战争引起了中国的重大变化，这主要的是中国原来的封建经济开始崩溃，而民族资本的原始蓄积，又受到了欧美资本主义侵入的破坏，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因而一开始就在中国近代史上提出了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是由独立的封建主义的清朝帝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以至变为完全殖民地化的国家；一是由封建主义的国家经过变革建立近代资产阶级的独立的民主主义国家。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太平天国革命（1850—1864）后，特别在中法战争（1884）与甲午战争（1894）后，就更显得明朗化了。毫无疑问，孙中山先生是坚决站在第二条斗争道路上的，而且是站在最前面的。

同时，在鸦片战争中已经看出在谋取中国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问题上，也开始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对资本主义列强妥协的、不抵抗的、甚至是依附资本主义列强，来宰割剥削中国人民的，这就是清朝政府和封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所持的路线；另一条则是中国人民对于资本主义列强所持的坚决抵抗、不屈不挠的斗争路线，这一开始就表现在鸦片战争过程中广东人民反英的直接行动——广东平英团的英勇行动上。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太平天国革命后，特别在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后，更加明朗化了。毫无疑问，孙中山先生是坚决站在中国人民所持的路线方面的，而且也是站在最前列的。

中国近代史的主体是人民，在阶级社会里，是没有什么一般的人民的，只有打了阶级烙印的人民，因而我们首先不能不把中国近代史上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分析一下。在鸦片战争以前，我国还是一个封建社会，主要的阶

級关系和階級矛盾，是地主階級和农民階級。鴉片戰爭以後，地主与农民的階級矛盾仍占主要地位，然而，已開始产生了买办階級，逐漸也有了民族資產階級；同时，因欧美資本主义的侵入，也開始有了在外国企業內的工人，为此后我国產業无產階級的前身。除了階級关系和階級矛盾外，当时还存在着很严重的民族矛盾。在鴉片戰爭以後，民族矛盾也開始发生了变化，在战前，滿族为統治的压迫民族（当然也只是其中的少数統治者），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为被統治被压迫的民族，主要的民族矛盾，是滿族和汉族及其它少数民族；在战后，这仍为主要的矛盾。但是，除了这个内部的民族矛盾以外，開始发生了国内各民族和来自国外的欧美資本主义的压迫民族的矛盾。此后，这种矛盾逐漸增漲为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矛盾。

由于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在鴉片戰爭以後，都開始发生了变化，反映在政治上，一方面因清朝政府对外战争的失敗，使它的封建統治发生动摇；另一方面，因为英、法等国在“南京条約”、“天津条約”等不平等条約中，得到了許多利益，开始与封建的清朝政府相勾結，一直到帮助它鎮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共同来宰割和剝削中国的人民。于是，在中国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上，就形成了革命与反革命两个鮮明对立的陣营：一个陣营，就是革命階級的陣营，亦即人民革命的陣营，这里包括工人、农民、手工業者、平民、游民、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国外华侨，此外，还有一部分士大夫階級与地主階級，因看破清朝政府的无能与中国民族的危机，也走向革命方面，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反清統一战綫，这也就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另一个陣营，就是反革命陣营，这里包括清朝政府与拥护清朝政府的腐敗官僚、大地主階級、旧軍閥、买办資產階級与帝国主义，簡單些說，也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資產階級，它們与清朝政府相互勾結，企圖維持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統治，以各种方式来反对革命，形成一支反人民、反民主、进行民族压迫的統

一战綫，这也就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对象。

在革命階級陣营中所包括的社会階層虽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則是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农民。当时虽然有了工人階級，但是还没有成为一个自覺的階級走上政治舞台，而农民虽然占絕大多數，則处于分散、保守、落后的状态，沒有可能起来領導革命，因而当时革命的領導者就不能不是民族資產階級。孙中山先生則代表这个階級的革命派，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偉大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

不过我們在这里要指出，就是民族資產階級在当时也是十分軟弱的，因为中国資本主义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才得到了初步的发展。試看那时的紡織工業，根据不完全的統計，从1905年到1909年，才有沿海地方的上海、无錫、宁波等八个厂，总資本額約690万元；再看面粉工業，根据不完全的統計，从1905年到1909年，才有上海、汉口等地七个厂，总資本額不到200万元，其它工業，如山东中兴煤矿公司、汉冶萍公司、揚子机器公司、云南錫务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虽亦開設在这个时期，然而一开始就外而受到帝国主义的阻碍，內而受到封建主义的束縛。特別在1901年訂立辛丑条約后，中国賠款45,000万兩，本息合計98,000万兩，这对中国的經濟財政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对于中国民族資本主义的发展，也是一条沉重的鎖鏈。

因此，中国民族資產階級的本身，一开始就是不健全的，就具有兩面性：一面傾向于革命，一面傾向于改良妥协。于是民族資產階級內部，一开始就分为革命派和改良派。革命派以孙中山先生为首，上承太平天国革命傳統，下开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先河；改良派以康有为、梁啟超为首，上承李鴻章、張之洞洋务运动傳統，下为辛亥革命前后資產階級立宪派奠立了基础，使他們在一个时期把自己变成主人，革命派变成客人，这就是清政府設立資政院和各省諮議局的时期，并有可能在辛亥革命后，立即联合旧封建势力建立軍閥統治来篡夺革命的果实。以康、梁为首的改良派引起了戊戌政变（1898年）而遭受失敗，这

是清朝政府当时“宁赠友邦，勿与家奴”所表现的狭隘民族意识所必然有的结果，也是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本身在当时还很脆弱的结果。

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1894年（即甲午战争之年）成立兴中会于檀香山，与康有为、梁启超派的保皇党相对立，创刊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报”，与保皇党的机关报“清议报”相争辩。同时，孙中山先生根据几年来在欧、美、日本各国考察的心得与活动的经验，开始提出了三民主义的主张，他曾说：“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接交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者，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后于1905年，兴中会即与“光复会”

（以章太炎为首）、“华兴会”（以黄兴为首）合并，组织革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并在宣言中指出：“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待变更，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机关而已。自今以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戮力，以尽责任。”

根据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同盟会的纲领和宣言来看，它已具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正是要以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代替旧的封建统治。“民生主义”和“平均地权”这个口号的提出，虽然并不曾真正解决当时什么社会问题和土地问题，但仍有它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当时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确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全体中国人民身上所要迫切解决的普遍问题。同盟会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树立。任何一个革命的阶级，如果没有一

个革命的政党来领导，革命是不可能进行的；任何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果没有一个革命的、杰出的、英明的领袖来领导，革命也是不可能进行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否认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更没有否认一个革命政党的伟大领袖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党的组织与领袖的意义，即在于锻炼出必需的知識，必需的經驗，必需的——除了知識与經驗外——政治警觉力，以便迅速地正确地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见列宁著：“左派幼稚病”）孙中山先生在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领袖。自从有了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革命政党，才提出了明确的革命纲领，也就是辛亥革命的纲领。列宁曾把它称为“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他并且指出：孙中山先生已经完全懂得种族革命之不够，直接提出民众生活状况问题，群众斗争问题，对劳动者与被剥削者表示热烈的同情，是具有远见的。

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当时不仅领导了民族资产阶级起来革命，而且也领导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及游民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孙中山先生当时是很看重“会党”与“新军”的革命力量的，同时，也发动了一部分农民，不过往往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而且发动得也很不够，甚至有些抗捐、抗税运动，反对借款筑路、开矿运动，层出不穷的教案运动，都没有好好利用。但这并没有阻止辛亥革命的成功，也没有损害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总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家，他代表着一个时代——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个时代。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取得了胜利，有它成功的地方，这就是推翻了中国历史上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专制皇帝政治制度，开辟了中国和亚洲民主共和国的新纪元，这对于中国后来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意义。对于亚非两洲被压迫、剥削的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亦即反殖民主义运动，也有很大的意义的。甚至对于世界历史的发展，都有很大的意义。这是它第一

个成功的地方。

辛亥革命的第二个成功的地方，是在它打破了清朝政府統治中国人民二百多年，在中国所建立的殘忍陰暗的“民族牢獄”，这一“民族牢獄”不仅是清朝政府为了維持其在中国长期統治所需要的，而且是万惡的帝国主义列强为要維持其在华的长期統治所需要的。因此打破这个“民族牢獄”，也就是把民主革命的矛头首先引向反清斗争的革命号召。这在当时客觀的历史条件上，不能不說是一个正确的步驟。虽然由于強調反清，放走了一个真正敌人——帝国主义，又由于把反清过于簡單化了，又放走了一个真正的敌人——封建势力，但那是受了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制的。否則，就不能結成很广泛的反清民族統一战綫；不能实现反清的任务，反帝反封建就根本談不到。只有首先实现了反清的任务，打破了这座“民族牢獄”以后，中国人民才能走出来，拿起反帝反封建的武器，繼續斗争下去。因此辛亥革命决不是象后来人們所說的那样剪了几条辮子就完事。

自然，辛亥革命有它成功的地方，也有它失敗的地方，这就是說，它只实现了它革命綱領的上半，**“驅除韃虜，恢复中华”**，而沒有实现它革命綱領的下一半**“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而且失敗是多于成功的。因为在辛亥革命以后，北洋軍閥袁世凱代替了清朝政府的統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不仅沒有被推翻，而且正象列宁于1913年在他所写的**“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一文中說过的一样，外国帝国主义正与中国一切黑暗复古势力联合着来羈絆和压迫中国，使开辟了中国民族資本主义独立发展道路的历史要求又成了流产；而整个中国民众且由于北洋軍閥的出卖，依然并进一步在帝国主义的奴役下，封建势力的榨取下，度着黑暗凄慘的生活。这是与辛亥革命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亦即发展中国資本主义，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国的任务背道而馳的，这就是它失敗的地方。它的失敗，也是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的，因为二十世紀初列强資本主义已进入它的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不容許中国

再走資本主义的路。中国民族的覺醒，特别是中国工人階級已逐步由**“自在的階級”**在向着**“自为的階級”**轉变，也不容許中国再走資本主义的路。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觀規律，所以辛亥革命終於失敗了。

失敗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有人說：这是由于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革命派所領導的革命对反革命一連串妥協的結果。这也許是事实。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曾公开以自我批評的方式指出这一錯誤，曾說：**“此种妥協是間接与帝国主义相調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敗之根源。”**但我認為这是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却不是主要的原因。

又有人說：辛亥革命的失敗，是沒有把广大的群众真正動員起来。例如我們在前面所說的，孙中山先生虽然重視**“会党”**与**“新軍”**的力量，組織了多次的武裝暴动，但沒有发动和利用广大群众抗捐抗稅运动等等，这也是事实。但我認為这是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也不是主要原因。

那么，辛亥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在于民族資產階級本身的軟弱性和兩面性，不能强有力地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同时，由于反清民族統一战綫的破裂。

“革命軍起，革命党消”这两句話，充分表現了当时統一战綫破裂的实質。当时同盟会虽曾发表團結同志宣言，說：**“元凶未灭，如虎負隅，盟誓已寒，义士所不忍为。”**但由于許多同盟会的分子，却仍然紛紛退出同盟会組織，另組統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進会、共和实進会等等，再合并为国民党，集合官僚、政客为一团，喪失了革命性質，反对革命的繼續，而其党员，則唯一己之升官發財是圖。革命集团这种分裂，和革命党人这种墮落腐化，恰好給反革命派以进攻的最好机会，而当时反革命派的代表——袁世凱，也正是首先从分化革命营壘和腐化革命內部来着手以进攻革命的。这才是辛亥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也正是我們要从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所取得的經驗教訓。

大家必須牢牢記住这一真理，敌人往往是

从革命营垒的内部来攻破革命堡垒的，所以任何一个革命的阶级，一个革命的政党，首先必须求得内部的团结，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和可以团结的力量。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这是何等英明的号召和响亮的声音啊！

然而辛亥革命的失败，并没有损害中国的革命，反之，这种失败的教训，却教育出了更伟大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也没有损害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反之，这种失败的教训，却使得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改组了中国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并明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革命的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所提出来的新民主主义在原则上达到了基本的一致，因而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联盟，第一次结成了颇为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展开了新的革命斗争。

“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是孙中山先生思想发展的重要标志。孙中山先生所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和他所没有实现的革命

理想，今天，都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一一完成了，一一实现了。这就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又在1955年下半年和1956上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也就是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这是值得我们兴奋鼓舞的。

但是必须指出：我们国内外的敌人还没有完全消灭，我们的台湾还没有解放，我们不仅要从小辛亥革命中取得教训，我们还要从孙中山先生勇于批判自己和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中，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建设社会主义，为保卫世界和平，特别要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反对和批判从波、匈事件发生以来各种流派的修正主义而奋斗。

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就是为着要认识清楚：过去我们曾为什么历史任务而奋斗过，现在正在为什么历史任务而奋斗，将来还要为什么历史任务而奋斗。

（上接第44页）

慷慨，休则作巧姦治，多異物（言此地手工業發達）。女子則鳴瑟跕屣，游媚富貴，入後宮，徧諸侯。”此謂河北之衛也。又曰：“趙女鄴姬，設形容，揜鳴瑟，揜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者，奔富貴也。”趙邯鄲故衛地，此謂河北之衛，與鄭同俗也。……蓋古時河北之妹邦，邯鄲，河南之漆淠、曹濮，其声色藪澤乎？”

这个解释比“汉書地理志”所说的鄭地

“土陋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

“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可謂高明得多了。

汉書地理志評唐風的特点說：

“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蟋蟀），‘宛其死矣，它

人是婦’（山有樞），‘百歲之后，歸于其居’

（‘葛生’、案此例不當），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我想唐風的作者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沒落之感，恐怕与晋国“鹽鉄之饒”，商業的發達，領主的沒落有关。

“汉書地理志”說陈風的特点在于巫風特盛：

“陈国，今淮陽之地。陈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后媯滿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陈詩曰：

‘坎其击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持）其鸞羽’，此其風也！”

我想：陈詩之多巫風，或因其地近淮夷，而淮夷的文化落后，所以才有这种巫風。

总之，利用詩經作史料，对于这些地域性的特征也是不容忽視的。从这种地域性的差別中，可以推測各地的經濟發展情况。

教 学 参 考

初級中学課本中国历史第二册的 基本綫索和重点

王 永 兴

为了帮助教师钻研初中中国历史教学大纲第二学期部分和初中課本中国历史第二册，这篇文章试图讨论中国历史第二册的基本綫索和重点。文中有些材料超出了大纲和課本的范围，仅供教师参考。

初中課本中国历史第二册包括从隋朝到清朝鴉片战争以前的历史。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綫索就是課本的基本綫索，现在分别叙述如下：

（一）土地制度的演变和农民身分的改变

唐朝前期，国家控制着大量土地，官僚、地主也占有大量土地。国家控制土地的主要形式是均田制；此外，国家还用屯田、庄宅等经营土地的办法掌握了很多土地。均田制的精神是：土地的所有权是属于国家的，因此，国家就掌握了土地的“授”和“收”的权力，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向农民征收租调 and 征发徭役。土地的买卖受到政府严格的限制，不按照政府规定私自买卖土地的，要受到刑罚或处分。农民不能随意离开土地，他们的身分是不自由的。

唐朝前期，全国各地都有地主的田庄，这是大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耕种地主田地的劳动者主要是部曲和佃户。部曲的身分很低，近似奴隶。佃户所受实物地租的剥削比受田农

民重一些，但是他们可以从这个地主的田庄转移到另一个地主的田庄，他们不担负国家的徭役，因此，他们从事于农业生产的时间多一些，他们比受田农民受到的束缚少一些。

唐朝后期，均田制不存在了，但是国家用屯田的办法控制着大量土地。唐朝前期，屯田大多在边境地区；唐朝后期，全国各州都有屯田，屯田的面积很大，楚州的一个地区的屯田就超过一万顷。耕种屯田的农民是征发来的，但是他们不是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过了一定时期，他们可以离开屯田，为另外被征发来的农民所代替。大土地所有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耕种地主土地的佃户增多了，他们的身分和唐朝前期的佃户大致相同。

宋朝时期，官僚、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国家通过屯田、营田、官庄等形式控制大量土地。国有土地和地主田庄采取同样经营方式，地主和客户之间存在着租佃关系。

宋朝时期，有土地的叫作主户，没有土地的叫作客户。客户要向国家或地主交纳十分之五或十分之六、七的收获物，按照规定，他们不担负国家的徭役。客户耕种地主的土地是有一定期限的，过了规定的期限，客户可以离开地主的田庄，他们比较地有了一些人身自由。

宋朝时期的地主和客户的关系到唐朝发展来的。这一点说明了土地制度的演变，也反映了阶级矛盾的进一步的发展。

明朝时期，政府控制的屯田和皇庄很多；另一方面，土地日益集中在少数大地主的手里；明朝末年，太湖流域的土地集中在这一区域内十分之一的人家手里。这一事实反映了大土地所有制高度发展的情况。从宋朝开始的封建的契约租佃关系，在明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现象在东南沿海地区更为突出。佃户受到的剥削虽然还是沉重的，但他们在契约规定的时期以后，可以离开地主的田庄，在某种条件下，在契约规定的时期以内，佃户也可以离开地主的田庄。

清朝初期，虽然也有官庄、屯田和圈地，但是圈地不能长久维持。明朝各藩的田产都分给人民耕种，因此，清朝初期，国家控制的土地大为减少了。大土地所有制却继续发展下去。从1729年起，地丁制度确立了，一般农民可以不再服徭役，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放松了。

(二) 商品生产逐渐发展，商品经济的比重逐渐增大，明朝后期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清朝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继续成长。在手工工业和商业发展的过程里，工匠的身分有了变化。

唐朝时期，手工工业和商业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城市里的作坊手工工业发展了。钜鹿郡南和县有纸坊，“长垣悉晒纸”；有的铜坊能制造精美的铜器，铜器上有制造者长老的姓名；冶成坊的削师能制造锋利的兵器；长安有规模很大的造车作坊；长安附近有规模很大的碾磑作坊，碾磑作坊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增多以及较多的农产品变成商品是分不开的。第二，“行”的出现说明商业上的分业很细，商人有了自己的组织，也说明商业的规模很大。第三，金属货币使用的比较普遍。唐朝前期铸钱数量之大是过去所没有的，唐朝后期出现了“飞钱”和“柜坊”，这些都反映了商品生产的发展。第四，“短番匠”的纳资代役和“和雇匠”的增多，一方面说明徭役的减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商品生产的发展。

在唐朝手工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基础上，宋朝的手工业和商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下几点

值得注意。第一，城市的作坊手工工业的种类很完备，分工很细，有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裁缝作、腰带作、碾玉作等。第二，“行”在宋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唐朝时候，店铺只能开设在市里；宋朝时候，店铺随处开设。草市和墟市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市镇是城市和乡村的桥梁。第三，宋朝时期的铜钱的铸造量，比唐朝时期增加了很多；此外，金、银也逐渐成为货币。十一世纪初年，我国最早的纸币“交子”出现了。这些都反映商品生产的发展。第四，雇募的工匠越来越多，他们的劳动兴趣比过去的工匠增多了。

明朝后期，手工工业作坊逐渐发展成为手工工场。长江三角洲是丝织业繁盛的地区，那里的工场主靠剥削丝工发财；在同一地区里，还出现了向“牙行”收购棉布的包买商。这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已经萌芽了。明朝时期，商业城市的发达和海外贸易的发展是空前的，这都说明商品经济的比重增大了。

清朝时候，手工工场的规模扩大了。丝织业的手工工场拥有几百张织机，雇用工人几百人。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逐渐在成长。农业里的商品作物增多了。广东、福建一带有果园、甘蔗田、烟草田，长江流域有桑园、茶园、棉田，黄河流域也有棉田和烟草田。海外贸易更加发展了，出口商品的数量大大增加。银子成为固定的货币。

明清两朝，有专门技术的工匠在固定工场里工作，计日领取工资，他们的身分比过去的工匠大为不同了。

(三) 农民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每一次农民战争都是跟当时的主要的社会经济问题联系着的，每一次农民战争以后，社会经济都有一定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人民担负的徭役极为苛重。隋朝时候，人民担负的徭役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减轻，但徭役仍旧是阶级斗争里的主要问题，隋炀帝的大规模修建工程和对高丽的战争更加重了人民的徭役负担，因此就爆发了以反徭役为其特点的隋末农民战争。隋末农民战争严重

地打击了统治阶级，唐初统治者不得不在徭役方面对农民作一定程度的让步；同时，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人民负担的徭役也逐渐减轻。这样，农民的生产时间增多了，农民的生产兴趣也提高了，农业生产有了发展。这就造成了唐朝前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富裕。

唐朝后期，徭役制度有很大的改变，人数众多的客户不担负国家的徭役，按户等服役的制度开始了。由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沉重的租税落在小农户的肩上，反抗沉重的租税就成为唐朝末年阶级斗争里的主要问题，因此就爆发了唐末农民战争。五代时期，南方和北方的一些统治者，接受了唐末农民战争的教训，减少了农民的租税负担，这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这一点在江南尤为明显。

宋朝初期的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战争的规模并不大，时间也比较短，但它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元朝时期，在蒙古贵族的统治下，人民担负着奴隶般的徭役，还负担着极其沉重的租税，因此，反徭役和反租税是当时阶级斗争里的重要问题；但是元末农民战争的主要特征是反对元统治者的民族斗争，这跟蒙古贵族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是分不开的。元末农民战争推翻了蒙古贵族的统治，加在人民头上的奴隶般的徭役减轻了或解除了，人民负担的租税也减少了。这样，在劳动人民的艰苦劳动下，明朝的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

明朝时期，土地高度集中，土地问题是阶级斗争里的主要问题，沉重的租税迫使农民破产，因此，农民军就提出了“均田”“免赋”的斗争口号。“均田”这一口号明确地表示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这和土地制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清朝初年的“更名田”和明末农民反对大地主的斗争有一定关系。在满洲贵族入侵的条件下，明末农民战争演变成反对清统治者的斗争。由于农民战争的打击，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清统治者被迫实行了对农民有利的地丁银制度。“更名田”和地丁银制对清朝社

会经济的发展是有重大作用的。

(四) 我国历史是各族共同的历史。在我国历史上，各兄弟族和汉族一样都有贡献。

唐朝时候的吐蕃是藏族的祖先，回纥是维吾尔族的祖先，南诏是云南境内各族的祖先。那时候，他们和汉族就有密切的联系。九世纪时，契丹族兴起，接着，建立了辽。十一世纪时，党项族建立了西夏。十二世纪时，女真族建立了金；蒙古族也兴起了，建立了元。这些族的贵族对宋进行了侵略，给各族人民带来了灾害。在上述各族兴起的时期里，吐蕃、回纥、南诏各族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明朝时期，帝国的北边有蒙古各族，东北边有女真各族，西北边有畏兀儿（维吾尔）族，西南边有乌斯藏（藏）族，西南边境还有苗、彝、瑶、僮等族。各族之间的联系和各族跟汉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在经济文化上互相影响。清朝时期，在我国广大疆土上，居住着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藏族、苗族、黎族、僮族、瑶族、高山族等很多民族。在统一政权下面，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亲密。在清政府的残暴统治下，各族人民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他们共同劳动开发祖国的土地，他们共同反对国内压迫者；后来，又共同反对外国侵略者。

二

课本第五篇包括隋唐五代的历史，教材的配置环绕着以下几点。第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中心内容。课本第二十一章叙述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课本第二十三章叙述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两税法的建立；课本第二十四章叙述了五代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课本第二十五章叙述了隋唐五代的文化。唐朝的均田制是承袭隋朝的。均田制的广泛推行、均田制的破坏和土地买卖的盛行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变革的基本线索，环绕着这一线索就有租税制度的改变和政治上的许多变革，如科举制的发展等。商品生产的逐渐发展是这一时期

社会经济发展的另一基本线索，环绕这一线索，课本叙述了这一时期手工业和商业上的特点，如作坊手工业的发展、铸钱数量的增加等。文化的发展和政治经济的发展不能分开。第二，强盛的唐帝国和它跟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另一个中心内容。课本第二十二章叙述了唐帝国的强盛、唐帝国是亚洲各族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课本第二十五章叙述了唐帝国跟印度、中亚细亚的文化交流。唐帝国的强盛和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唐帝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亚洲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唐和亚洲各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条件。经济文化交流又促进了唐和亚洲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这对于我国历史的发展和亚洲各族历史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三，两次农民战争是另一个中心内容，课本第二十章叙述了隋末农民战争，课本第二十一章叙述了隋末农民战争的作用，课本第二十三章叙述了唐末农民战争和它的作用。关于这两次农民战争的特点和意义，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说过，这里不再重说。

课本第六篇包括宋辽金元的历史，教材的配置环绕着以下几点。第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中心内容。课本第二十六章叙述了北宋经济的发展，课本第二十七章叙述了宋金对峙下南北经济情况，课本第二十八章叙述了元统治下的社会经济情况，课本第二十九章叙述了宋元文化。政府掌握大量官田、大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和主户、客户的对立是这一时期土地制度的特点，也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里的基本线索。商品生产在这一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就是环绕这一基本线索来叙述的。南方经济的较高发展和元统治者对经济发展的破坏是这一时期里的特点。宋元文化里的三大发明跟经济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着。文学的发展和政治经济的变革是分不开的，如宋词反映了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元曲的兴起和城市商业的关系等。第二，人民的反金反元的斗争是另一个中心内容。课本第二

十六章叙述了北宋军民保卫开封保卫太原的斗争；课本第二十七章叙述了南宋的抗金斗争和抗元斗争。人民的反抗女真贵族和蒙古贵族斗争事迹的叙述，在这一篇中占了很大篇幅，这对于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有重大作用。第三，元末农民战争是另一个中心内容。元统治者实行了民族压迫政策，元政府把耕地变成牧场以及残酷地奴役工匠等措施使社会经济遭受了破坏。元末农民战争一方面表现了农民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它的民族斗争的色彩，各族人民终于推翻了蒙古贵族的统治。

课本第七篇包括明朝和清朝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教材的配置环绕着以下几点。第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中心内容，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是这一中心内容的重点。课本第三十二章叙述了手工工场和城市经济、土地的高度集中；课本第三十三章叙述了跟工、商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市民斗争；课本第三十五章叙述了清朝前期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封建主义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的阻碍。资本主义的萌芽是长时期以来商品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线索贯穿着课本所包括的全部时期。国家控制着大量的军屯和皇庄或官庄、大土地所有制的高度发展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另一基本线索，租税制度和政治上的许多措施的叙述都环绕着这一基本线索。明清时期的民主思想、反对封建制度的文学和资本主义的萌芽有密切的关系；明清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具有总结性质的，总结了我国关于药理学研究和劳动人民在农业、手工业方面的经验。第二，明末农民战争是另一个中心内容。本文第一部分对明末农民战争已作简略的分析，这里不再重说。第三，清帝国内部各族人民的亲密联系是另一个中心内容。课本第三十五章具体地叙述了这一中心内容，并环绕这一中心内容叙述了清政府对各族人民的统治和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

明正統年間叶宗留邓茂七

起义的經過及特点

李 龙 潜

明代正統年間，在我国东南的广大地区，曾暴發过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矿工”和农民起义。根据起义史料的綜合分析，發現这次复杂的剧烈的阶级斗争过程，具有和以往农民起义不同的性質和特点，即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农民起义的性質和特点，因此我把这次起义材料加以整理写成本文，供同志們研究和教学参考。

一 明代政府对矿業的政策及叶宗留领导的“矿工”起义

明初朱元璋由于要对农民和手工業者实行讓步的政策，政府对矿業，听任人民自由开采冶炼，抽收輕微的矿課，不主張政府随意开采冶炼，申斥請开采冶炼的官員，認為“利于官者少，損于民者多”^①，除非軍事上的急需，决不随便采矿冶炼。

直到英宗正統年間，国内资本主义因素已經在某些經濟發达的地区开始萌芽，促使封建政权的自然經濟基础在商品經濟較發达的地区开始分解，这就与封建势力發生严重的矛盾，封建統治者企圖克服这种矛盾，便对某些手工業部門——尤其是矿業——采取統制政策；同时，随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封建統治者的貪欲增长了，需要更多的金銀；此外統治者惧怕私营矿業，对“矿工”控制不严而出乱子。因此政府对矿業采取統制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是以最高土地国有制或皇族所有制为基础的^②，所以政府才能將所有矿業，收归政府經營，苟非政府特准，不論軍民人等皆不得私自开矿冶炼，地方府县粘貼“矿禁”布告，直接派官軍到各地巡查，严拿私自采矿冶炼者。如正統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命浙江福建等处“都察院即揭榜禁約，今后犯者即令該官司拏問具奏，將犯人处以極刑，家迁化外，有如不服追究者，即調官軍剿捕”^③。为了防止人民“盜矿”，地方政府还特地划定封禁山区，設立“关卡”“驛路”，住兵防守。如橫跨閩浙贛三省的仙霞嶺就是被封禁的山区之一^④。可見从中央到地方都严格地貫徹着矿業的統制政策。

当时政府經營的矿業，是凭借着政权力量，派官員到各地征集大批民夫，按“十名編为一队”，进行开采冶炼，不問实际的生产如何，要他們繳納定額的矿課。如浙江福建就是“由閘办官督令坑首冶夫納課”或是“煎銀甲夫陪納”的^⑤。当时矿課相当苛重，如銀課，福建在洪武間岁課銀2670余兩，宣德間增至40270余兩；浙江在洪武間岁課銀2890余兩，宣德間增至94040余兩^⑥。因此他們經常“煎办不前”而有“賠累矿課”的痛苦。

在明政府統制矿業并借此向人民搜括的政策下，商人沒有經營矿業的自由，即使得到政府特許，也因矿稅苛重或官僚“課外索賂”而瀕于破产，被政府招集去采矿冶炼的“矿工”群众，脱离农業生产，也免不了“包賠矿課”，生活痛苦；如果政府停止經營，虽然“差官已

① “太祖实录”卷一四五，“典故紀聞”卷四。

② 依侯外廬先生关于封建社会最高土地所有制的意見，參見“历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三期。

③ “英宗实录”卷四九。

④ 顧炎武：“天下郡国利病書”卷八二，江西四。

⑤ 乾隆欽定“續文献通考”卷二三，“明大政彙要”卷二三。

⑥ “英宗实录”卷一一九。

去，矿徒犹在散之何处，給之何食，此輩豈能遙故里事农業”^①。于是大批失業，生活无着。这样無論矿商或“矿工”，都被迫得无路可走。他們为了生存便和刚从土地排斥出来的流民結合起来，携着“皮甲、篳筵、鈎刀、叉掌”^②，一起逃入林箐茂密的高山大谷中，不顧統治者森严的政令，据險开矿，等到明政府派官軍追捕时，就必然要走上武裝起义的道路。

当时規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斗争，是1444年浙江叶宗留领导的“矿工”起义。

叶宗留，浙江庆元人，少年学过武艺，曾充当处州府隶役^③。后来大概因生活困难和不堪压迫，便“常为矿盜”^④，领导“矿手”二千余人，“僭拟名称縉紳”潜入封禁区仙霞嶺的銅塘山，开采銀矿，遭到官軍追捕，便在銅塘上“覘險立穴，鑄冶兵甲”^⑤，組織武裝开矿，公开反对封建統治者的迫害。一方面向政府提出要求：矿业自由“听我采取”，另一方面出“揭紙票”：如果官軍要战，“定限某日大战”^⑥。于是武裝斗争便剧烈地展开了。

1444年（正統九年）春夏間，叶宗留领导“矿工”們“盜掘”少陽坑和少亭坑，因生产技术落后，“无所得”，或“所获微甚”，“亦不給用”，又加上官軍追捕甚急，叶宗留就正式提出起义的口号：“与我取于山，既无所得，孰若与尔取于人，一撑而有余矣。”^⑦这个富有鼓动作用的起义号召，立刻得到“矿工”們的热烈响应，从此便不再开矿，正式揭起义旗，宗留“自称大王”，招龙泉良葛山人叶七为教师，演習兵器，訓練队伍，直接进行革命斗争。

十月，起义軍分兩路进军，一路打进了福建蒲城，連下金华、武义，占領了建陽。起义軍所到的地方，为民除害，杀貪官污吏，沒收官僚地主財物，分給“小民从之者”，因此“从者日众”。另一路进攻江西鉛山，控制了車盤嶺的交通，頓時鉛山震动，“行旅断絕”，使統治者受到严重的威胁^⑧。

当革命形势伸展到江西福建，明政府才感到問題严重了。正統十一年三月五日英宗应浙江右參議吳昇的請求，派御史柳华往督福建浙

江江西三司，調兵剿灭“盜矿諸賊”^⑨。年底柳华到了福建，即“令村聚皆置望楼，編民为甲，擇其豪为长，得自置兵仗，督民巡緝”^⑩。但是这个措施不仅未能把矿工起义鎮压下去，反而因为把农民編制起来，發給武器，为农民起义創造了有利的条件，接着便产生了有名的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把革命引导到新的阶段。

二 邓茂七起义的原因及其初期的斗争

明英宗正統年間，随着商品貨帛日益活躍，工商業的繁榮，封建統治階級力圖增加自己的收入，仗借封建特权，对农民进行殘酷的榨取，使階級矛盾激劇增长。

本来明代封建地主階級兼并土地的现象已經日漸严重，到英宗时，土地开始高度的集中。例如福建十分之七、八的土地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顧炎武指出：“南靖县境内田亩归他邑豪右者，十之七八，土著之民，大都佃耕自活”^⑪，就是明显的佐証。当时的佃农一无所有，靠租地耕种过活，除承租时，向地主交“粪土銀若干”，“名曰田佃头銀”外，还要承办地主一切大租小租，亩地租額都在一石左右，“宣宗实录”載：“小民佃种富室田亩出私租一石。”^⑫此外还要“送租”（把租谷送到地主家里），及送給地主鷄鴨豆蔬菜之类，名曰“冬牲”。

当时政府的賦稅徭役亦相应地加重了。以

① 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二七“抗治”。

② 張宣：“西園聞見錄”卷九二工部“抗治”。

③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十，浙江八。

④ “明史”卷一七二張璠傳。

⑤ 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一七藝文奏疏三，清蔡士英“封禁山疏”。

⑥ “明大政纂要”卷二三。

⑦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三一“平閩浙盜”，“鄧惟京”列傳卷三一葉宗留傳。

⑧ 張宣：“西園聞見錄”卷九二，抗治。

⑨ “英宗实录”卷一三九。

⑩ “英宗实录”卷一七八，“明史”卷一六五丁璠傳。

⑪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四，福建四。

⑫ “宣宗实录”卷六。

正統元年与洪武初年比較，民田每亩賦稅就由三升增至三斗以上，差不多增加了十倍^①。由于封建地主和官吏的勾結隱瞞漏稅，增加的賦稅仍全部轉嫁到农民身上，因此形成“富者田阡陌坐享无苗之利，貧者地无立錐反多数外之賄，富益富，貧益貧”^②的現象。就在这种階級矛盾熾化的历史条件下，爆發了邓茂七領導的农民起义。

邓茂七原籍江西建昌人，原名邓云，佃农出身，幼时“勇悍自智”，及长，“以豪俠为众所推”^③。曾在家乡杀了地主惡霸，被“官府下捕”，逃到宁化陈政景家，改名茂七。与陈政景“聚众为墟，集会常数百人，巡按御史柴之显立为会长，远近商販皆咨焉”^④，他就利用这种商販的“集会”作公开的合法斗争。不久“集会”遭地主惡霸破坏，被迫与弟逃往沙县二十四都，为人佃田，准备更大的斗争。恰好这个期間，柳华鎮压“矿工”起义，“編民为甲”，發給武器，茂七兄弟被推为甲长，管轄二十四都的白水等十三个單位。他就利用这个机会組織武裝力量，准备發动起义。

1448年（正統十三年）二月，邓茂七領導农民兄弟坚决拒絕向地主送租和交冬牲，被地主們控告。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衙門，立刻派兵前往逮捕他，茂七率众拒捕，且“杀弓兵数人”。衙門知县聞訊，亲率官兵三百余人前来追捕他，茂七在群众支持和帮助下，不但把官軍“格杀殆尽”，并認為起义时机已經成熟，便“設官署”，“封官职”，“称剗平王”，“刑白馬祭天，歃血誓众”，宣誓“剗平”封建特权所造成的賦役不平，土地不平，乃至封建習俗上人格不平，遂正式起义^⑤。

邓茂七的起义，鮮明地代表着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凡远近至者，皆附其党”^⑥，“他县游民，皆举金鼓器械应之”^⑦。例如尤溪墟主蔣福成因不堪福建参政朱彰的“貪漁”：“課外索賂”，“小民甚为所迫”，而率領墟丁、市民、“无賴”、农村貧民响应茂七起义，直接参加茂七的革命行列^⑧。所以茂七起义不久，便拥有“众十余万人”的革命队伍了。

四月，茂七、福成領導起义軍，在歼灭了同知邓洪的官軍二千多人后，决定以沙县为据点，分兵向福建的反动中心延平府进军。守城御史張海派遣張都司刘指揮率兵四千企圖阻止起义軍进攻。不料，行至二十里的双溪口，道路險隘，起义軍二十余人“伏左右村店中”，俟前驅官軍过溪將尽，都指揮和随兵数十人赶到时，起义軍“伏猝起”，“举排柵塞道”，使“前驅兵不可返”，然后將他們个个縛杀，等“前驅兵觉还”，已被排柵所阻，“御之无及”，而起义軍早已“登山拥众”，居高临下，吹起号角，把他們全軍圍困并歼灭于險隘的溪口中^⑨。这种創造性的歼灭战，充分表現了起义軍机智勇敢善战的精神。

起义軍扫清了前进道路后，繼續向延平府进军，張海和奉命招討的御史丁瑄在惊惶失措的情况里，曾陰謀派遣賁書使者到茂七軍中，詭詞劝誘說：“解散得免死。”企圖拖延時間等待中央官軍救援。具有革命坚强意志的邓茂七拒之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据建宁，塞二关，傳檄南下八閩，誰敢窺焉。”^⑩遂杀賁書使者，“据貢川及玉台館、緝置里闔甲役”^⑪。革命声势愈益浩大了！

三 叶邓联盟作战、革命形势迅速发展

張海丁瑄的招撫政策失敗后，“恐賊众軍寡，猝不能制”^⑫，1448年（正統十三年）八月，英宗派左都督刘聚，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楷監軍并調选各地官兵六千，及强悍的蒙古达

① “明史”卷七七食貨三“賦役”。

②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二，福建二。

③ “明書”卷一六一鄧茂七傳。

④ “沙縣志”卷二“大事記”。

⑤ 重纂“福建通志”卷二六七，雜錄：“明外紀”。

⑥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二，福建二。

⑦ 方孔炤：“全邊略記”卷十一。

⑧ 陳仁錫評纂“皇明世法錄”卷八二，“平福建寇”。

⑨ 高岱：“鴻猷錄”卷九“平福建寇”。

⑩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三一，“平閩浙盜”。

⑪ “明書”卷一六一，鄧茂七傳。

⑫ “英宗實錄”卷一六九。

达回回軍各三百，馬五百匹，前来镇压起义軍。

邓茂七起义不久，即聞叶宗留的“矿工”起义軍活动于閩浙贛边境，基于阶级利益一致，即多利用“分水拓陽二关間小徑，陰通間牒”^①，与宗留联盟，互相呼应，彼此声援，所以当張楷的官軍到江西广信时，宗留的“矿工”起义軍早已控制了閩贛边境，使“鉛山不通”，并且准备随时阻击官軍，牵制他們进入福建镇压茂七的起义軍。

正統十三年十一月初，張楷的軍队到了江西广信府鉛山县黄柏鋪地方，叶宗留亲率“矿工”起义軍从福建桐木关經祝公桥到黄柏鋪予以狙击。当时宗留穿着緋紅的衣服，立在前綫的最前列，“呼众登战”，与敌人“野战浪杀”，消灭了敌军都督陈荣指揮戴礼及其所部二千五百人，“收取其器械甚多”，不幸宗留也因中流矢而壯烈牺牲了^②。

叶宗留光荣殉难后，“矿工”起义軍立刻推出叶希八为領袖，仍用宗留名号，繼續使人“从鉛弋間道厚結茂七，互为声援”^③，并派遣陈鑑胡陈堂率領四百余人，“俱以紅帕裹首”，前往参加茂七起义軍^④，以少数队伍留駐江西十三都，控制車盤嶺，繼續阻击張楷軍队。希八即亲率主力部队經蒲城、龙泉、遂昌、松陽、丽水，向浙江的反动中心处州府进攻。

1449年（正統十四年）二月底，希八圍攻处州府，守城官軍“据城自守”，时張楷軍队正被茂七起义軍牵制无法馳援，加上城中“軍多粮食不繼”，“諸將終日相对泣”。至五月初一日“矿工”起义軍猛烈攻城，守將徐恭等被迫出战，官軍大敗，“三司等官皆为賊所杀，徐恭仅以身免”，狼狽逃入城中，从此“閉門固守”，不敢复出。經此战斗后，“矿工”起义軍声势益盛，群众“投入者益众”^⑤，顿时成为一支拥有数万人的勁旅了。

与此同时，茂七亲率主力軍进攻延平府，并分遣別將陈德敬、吳都总等率領水陸軍进攻將乐、連城、永春等二十多个州县，甚至打到广东潮州海陽^⑥。起义軍所过，“民为之响导”^⑦，造呂公車攻城^⑧，在群众的支持下，英勇的起义軍出师必胜，攻城必破。每次攻进城中，

“縱火延燒衙厅”，“燒官舍”，“焚廨舍，縱獄囚”，“取册籍”，沒收“县庫”金錢，“民兵被杀者不可胜計”^⑨，張楷的軍队亦被杀得落花流水，“逡巡顧忌”，不敢擅进，“惟求神許醮，冀其保祐而已”^⑩。起义軍不下数月間，完全“控制八閩”，拥有数十万的水陸軍，腐朽的張楷軍队自然不敢正視了。

革命蓬勃發展的原因：第一，叶邓起义軍由于目标一致，阶级利益統一，構成了农民和“矿工”的联盟，并肩作战，这就使敌人到处挨打，正如顧炎武指出，他們“此入彼出，官兵首尾不能相应”^⑪。同时也分散和牵制了敌人的兵力，給兩支起义軍迅速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起义軍能迅速發展，是起义軍提出了反对封建超經濟剝削与帶有平等主义性質的口号，直接反对地主阶级及其專制主义的政府，反对大地产的劳役及納貢式的地租剝削，反对社会上不平等的封建特权。这样便把劳动群众跟統治者提到对立的境地，符合于当时社会人民群众的要求，因此得到他們拥护和支持，紛紛参加革命，替起义軍作响导，掩护起义軍斗争，形成一个反封建的广泛的群众革命运动。

四 起义軍的失敗及原因

革命形势迅速發展，震撼了封建統治基础。封建王朝統治者“聞敗報踵至”，惊惶失

① 顧炎武：“天下郡国利病書”卷八二，江西四。

② “英宗实录”卷一七三。

③ 顧炎武：“天下郡国利病書”卷八二，江西四。

④ “英宗实录”卷一八五。

⑤ 張宣：“西園聞見录”九二，抗治。

⑥ “英宗实录”卷一七八。

⑦ “龙岩縣志”，“寇警”。

⑧ 潘紹詒重修“处州府志”卷一二“戎事”，呂公車“約高三丈、广丈餘，其形如置，匿強壯，以軸推至城下，期搭梁头，蟻附而登。”

⑨ “松溪縣志”卷一地理志；“連城縣志”卷三大事紀；“处州府志”卷一二“戎事”；“福建通志”卷六五“詳異”；“宁泰縣志”卷七“寇警”。

⑩ “英宗实录”卷一七二；“福建通志”卷二六七“明外紀”。

⑪ 顧炎武：“天下郡国利病書”卷八二，江西四。

措之余，怒杀了所谓“失机”的巡按御史柴文显等，随即一面严责张楷：“进兵日久，全无实效，只虚文支吾，再不用心必杀不宥。”^①一面派宁阳侯陈懋佩带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刑部尚书金濂参赞军务，共率京师二万人，南京骑兵二千、江浙漕运军二万七千人采用全面包围各个击破和恶毒的分化政策，首先向福建起义军进攻。

1448年（正統十三年）十二月，敌人企图从江西边境通过建阳，入福建向起义军进攻。当时茂七以沙县陈山寨为根据地，派遣部将率领起义军向敌人反击，可惜在敌人进攻面前，扼守建阳的部将黄翠等三十余人，丧失了革命胜利信心，被建安知县胡钦许以“复业”及“赏官”所迷惑，诱杀了革命部将刘宗等人，投降敌人，使敌人顺利地通过建阳，进入福建，向起义军进攻。由于起义军来不及调整部署而处于不利的被动作战状态，因此仅在建阳便牺牲了一千五百人^②，导致革命走向低潮的危机。

当革命处于危险的关头时，潜伏在革命内部的反革命地主分子罗汝先，即乘机从革命队伍内部来绞杀革命。史载：“汝先乃诡从贼，果诱茂七下山攻延平府，官军预于溪北湾伏置兵器，贼拥众南岸，乘浮桥过，火药齐发，烧死贼数百，（丁）瑄督众军分道冲击之，贼大败逃走，指挥刘福直前斩茂七，追余贼至秋竹铺，得贼船百余艘，招抚脅从百姓凡五百一十户，二千五百口。”^③1449年（正統十四年）二月五日，英勇善战而缺乏革命斗争经验的革命英雄邓茂七，便壮烈地牺牲了。

茂七牺牲以后，革命的形势立刻转向低潮，但是起义军并没有瓦解和屈服，仍旧拥茂七兄子邓伯孙为领袖，以陈山寨为根据地，“声言为茂七报仇”^④，继续进行了一连串的斗争。可惜伯孙和茂七一样缺乏革命斗争经验，中了敌人的挑拨离间计，误杀了革命的支柱张留孙，致令“人人自疑，弃伯孙降”敌^⑤，大大地削弱了革命力量，最后在五月七日也被敌人各个击破，陈山寨陷入敌手，茂七家属及伯孙等二百余人全部殉难^⑥。

五月底，刽子手张楷将福建起义军镇压以后，依照明政府的“移师浙江灭宗留”的指示，立刻调集大军万余，水陆兼程，赶赴处州，镇压“矿工”起义军。

二十五日，张楷的官军解了处州之围，并用阴谋故伎，以“老母百口为誓”，招降了陶秉伦、叶希八等及其所属人员，只有陶得二坚持斗争，领导“矿工”起义军攻陷武义、丽水等县，杀了浙江签事陶成，但由于孤立无援最后在景泰元年十一月五日也光荣地牺牲了^⑦。至此“矿工”起义军才告失败。

叶邓起义军，前后经历八年的斗争，转战于东南广大地区，革命的声势相当浩大，但毕竟失败了，其原因：第一，叶邓虽然曾经一度联盟，希八也曾派遣陈鑑胡率领部分“矿工”起义军参加茂七起义军，但这种联盟仅是作战时互相呼应而已，实际上陈鑑胡并没有按希八的指示，参加茂七起义军，反而自称“大王”，国号太平，建元泰定^⑧，独立一支，孤军作战。到了后期，叶邓的联盟就不紧密，如当叶希八“矿工”起义军“获征南将军印，贼（邓茂七起义军）行文移，辄用之以自侈，且分兵通茂七，茂七……恶征南印章，拒之曰：‘汝今未能破一城，尚须自力据城以待我。’”^⑨这就使革命力量不能再壮大起来，共同打击优势的敌人。由此可见叶邓联盟是很有限的。从整个革命斗争过程看，起义基本上是地方性分散孤立进行的，缺乏坚强的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统一的领导，而且参加成员复杂，更不容易集中领导，长期坚持，终被敌人各个击破了。

第二，起义军的领袖们缺乏革命斗争的经

① “英宗实录”卷一七五。

② 陈仁锡评纂“皇明世法录”卷八三，“平福建寇”。

③ “英宗实录”卷一七五。

④ 重纂“福建通志”卷二六七“明外纪”。

⑤ 明朱国祯：“湧幢小品”第四册卷三二。

⑥ “英宗实录”卷一七五。

⑦ “英宗实录”卷一九三，一九八，“明史”卷二七二孙原贞传、张骥传，“括苍集”“丽水县志”卷一四“戎事”引。

⑧ “英宗实录”卷一八五。

⑨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浙江八。

驗，沒有在革命陣營中徹底肅清反革命分子，鄧茂七不僅沒有辨別出反革命分子羅汝先，反而誤信了他的陰謀詭計，結果犧牲了自己，葬送了革命。他的繼起者鄧伯孫也蹈了同樣的覆轍，結束了革命；同時起義的基本群眾是个体經濟生產者，因受階級壓迫喘不過氣來被迫自發地起義，隨時都希望重新回到土地上去從事生產，因此容易被敵人以“復業”及“賞官”所迷惑，在敵人惡毒的“招撫”政策下，一部分人脫離了革命。

第三，從起義失敗過程中可以看出，地主階級組織的“民快”“民兵”武裝和陰謀暗算手段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最具体的例子是地主“羅文通等密令里人嘗被（茂七起義幹部羅）丕協從者，置酒佛寺，約丕飲，至猶執刀自衛從者數十人，有頃文通擁眾入執丕，杀其從者五人，余遁去”^①。這就是地主階級扼杀這次起義軍的殘酷手段。

五 總結語——起義的歷史意義及特點

蘇聯歷史學家С·Д·斯喀茲金同志在“中世紀時農民反對剝削者的鬥爭”一文中說：“階級鬥爭的具体歷史是極不一樣的，這種差別是由基礎（即社會的經濟制度）的差別來決定的。”^②葉鄧起義，處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代，因此研究這次起義，結合當時社會經濟發展情況加以考察，便發現跟以往農民起義具有不同的性質和特點。

這次起義軍中的階級成分是相當複雜的，有礦工、流民、佃農、商人、“市井無賴”等。“礦工”是農村的脫離農業生產的手工業工人，流民是農村中被土地排斥出來的農民，佃農是在農村中忍受着地主高額地租剝削的農民，商人及“市井無賴”是城市的“中等階級反對派”及“平民反對派”（即中小工商業主及手工業工人、日工等）。處於資本主義萌芽時代，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尚未確立之前，農民固然是个体小農經濟生產者，就是城鄉的手工業工人及中小工商業主中，絕大部分與農民之間還保持着密切的聯繫，“依然保存有農民性質的顯著基礎”^③，他們昨天還是農

民，現在也還是小規模的手工業生產者而不是現代大工業的代表。因此葉鄧起義的性質和過去農民起義有相同的地方，已如前面所說，但更重要的，是這次起義包含着新的區別於過去農民起義的新東西。

（1）葉鄧聯盟雖然有一定的限度，但這種典型聯盟的反封建主義的鬥爭，是歷史上所未見的，其主力是手工業者“礦工”和農民，這就表明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作為無產階級的历史先驅者——手工業工人的階級覺醒，和農民聯盟，採取武裝鬥爭方式，掀起了震動全國的大起義，為中國農民戰爭史上創造了光輝的範例，豐富了中國人民鬥爭的經驗，同時也比稍後一些的市民運動只用縱火、鼓譟、毆斗等落後的鬥爭方式進步得多，其影響和給予敵人的打擊，也比市民運動大。

（2）起義的領導者大部分不是農民^④，而是手工業者“礦工”或“爐匠”及其他小商販，他們從本身利益出發，反對封建統治者對礦業的統制政策，要求成為獨立的“業主”和小商品生產者，要求土地自由經營，“聽我采礦”等。很明顯的，這些不是農民的而是城鄉手工業者及商人的要求，這種要求是和當時發展着的社會經濟相適應的，因此使整個起義標志着資本主義萌芽時代反封建鬥爭的特徵——帶有近代市民反對封建專制主義鬥爭的性質。

（3）茂七起義前夕，和陳政景聚集小商販，利用“集會”的方式，對封建統治者進行公開合法的民主鬥爭，這是資本主義萌芽時期新的鬥爭方式；同時他們反對封建大地產及其所造成的封建特權，反對給地主“送租”的勞役地租及“冬牲”的剝削制度，宣誓剷除地主與農民間政治上、

（下轉第52頁）

① “英宗實錄”卷一九三，“景泰附錄”十一。

② 尚鉞編：“封建社會歷史譯文集”，第143頁。

③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生活書店版，第16頁。

④ 作者按：根據起義領袖成分看，葉宗留固然是手工業“礦工”，就是鄧茂七也作過“礦工”。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八二江西四載：“正統中閩賊鄧茂七蓋嘗盜冶其中（銅塘山）。”乾隆“續文獻通考”卷二三亦有此說，故從之。

試談孙中山的土地綱領

尹 广 瑤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的形成是在1896至1897年間。甲午起事敗后，他去美英各国游历，“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發达，如欧美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極乐之乡也。是时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为一劳永逸之計，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問題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張所由完成也”^①。

在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理論——民生主义中，土地問題占有重要地位。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本人的家庭出身，使他切身体驗了农民无地之苦^②。他認為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土地已經是几千年来社会矛盾的焦点。因此当他在欧美各国看見了資本主义社会中土地問題的严重后，便想趁中国“一般小地主的权力，还不甚大”来“用一种思患預防的方法，阻止私人的大資本”^③。解决中国土地問題的綱領，孙中山称之为“平均地权”。

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最終目的，是欲使中国“耕者有其田”。他說：“至于將來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农民問題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們对于农民問題的最終解决。”^④他坚信土地公有为天經地义之真理，确信地主之坐享农民劳动果实为不合理的制度^⑤。他实行平均地权有兩方面措施，二者是彼此关联的。他說：“我国今日而言社会主义，主張土地公有，則規定地价及征收地价稅之二法，实为社会主义之政策。”^⑥下面分別来談：

定 地 价

土地不是劳动的产物（非指土地上的人工設施），故本身沒有价值。但它有价格。这种土地价格不是由价值决定的。馬克思說：土地的“那种購買价格，并不是土地的購買价格，

而是凭土地所提供的地租，依通常利息率来計算的購買价格”^⑦。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地价，可以表示如下公式：

$$\text{地价} = \frac{\text{地租}}{\text{利息率}}$$

很明显：地租如增高，地价也增高——地租与地价成正比；利息率愈低，則地价愈高——利息率与地价成反比。地租与利息率决定着地价之高低。随着資本主义經濟的發展，地租有昇高的一般趋势，这是因为某些地区工商業、交通事業的發展，人口的密度增大等原因，使土地單位面积的收入增多了。这是土地的級差地租不断增大，从而使整个地租增大。随之而来的是土地（价格的）昂貴。另外，随着資本主义的發展，銀行、商業信貸日益龐大，使利息率有下降的趋势。除此以外，社会平均利潤率的下降，也决定利息率下落。利息率的下降，标志着地价的上漲。这就是資本主义工商業繁华地区地价所以上漲的兩個緣由^⑧。

孙中山流亡海外各国，目睹欧美地价日益

① 胡汉民編“总理全集”第一集上册，“自傳”第5頁。

② 宮崎滔天問平均地权思想的由来，孙中山答：“吾受幼时境遇之刺激，頗感到实际上及學理上有講求此問題之必要。若吾非生而为貧困之農家子，則或忽視此重大問題，亦未可知。”（宮崎：“孫逸仙傳”，“建国月刊”五卷，四期。）

③ “中山全書”第一卷214頁“三民主义”。

④ 同注③。

⑤ “社会主义之派別与方法”，这是一九一二年他对中国社会党人的講演。載“中山全書”第三册18頁。

⑥ 同上書。关于平均地权兩個办法，孙中山在自己的作品与講演中屢有提出，但分的不明显，以致使人难以考其究竟。可參看“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載“中山全書”第三册，第33—34頁。

⑦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讀書出版社1947年版，第523頁。

⑧ 參看陈伯达著：“近代中国地租概說”第六章。

高涨，大地主坐收其利。在国内，他见上海、广州、汉口附近各地，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资本侵入，修筑铁路，工商业日趋“繁荣”，地价上涨，已有萌露。他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限定地价之法。

1905年他说其办法是：如今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就定为一千元，或多至两千元。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仍得两千元，“赢利八千，当归国有”。又说：“少数富人把持壟断之利，自当永绝。”^①

同年他又说：“平均地权，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②1912年他讲：“…所报之价，即为规定之价。此后地价之增加，咸为国家所有，私人不能享有其利。地主虽欲壟断，其将何辞之可借哉？”^③这是让地主自报地价，把这一地价固定下来，今后土地涨价，地主也得不到好处了。这就是定地价的内容。它是法律强制，使土地上涨之价归国家所有。如何实现呢？那就是国家依原定之价强制收买。譬如某块地地主原报之价为五百元，数十年后这块地之价格涨至五千元了。国家早有既定之立法，可用五百元把这块地买为国有。这样政府就多收入四千五百元，作为公用，成为国家财富。用这种办法政府渐次夺去地主土地，使全国土地尽为国有。与此并行的是，农民耕种国家土地，只向国家交单一税，这就消灭了封建剥削，达到耕者有其田了。但人们会问：地主如果放长眼光，把他的土地价格报得很高很高，使政府无力收买或买而无利，那怎么办呢？孙中山曾想到这点，就用“地价税”的办法来预防这种现象发生。

孙中山很乐观地谈到这种剥夺地主土地的社会作用：“行了这法之后，文明越进国家越富，一切财政问题断不难办，现今苛捐尽尽扫除。物价也渐便宜了。人民也渐富足了。把几千年捐输的弊政，永远断绝。…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就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国家。”^④这就是孙中山的崇高理想。他鄙视欧美资本主义的“繁荣”。

他说：“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贫困甚于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⑤

“定地价”是孙中山土地纲领中最进步的一个方面。然而反动的改良派、保皇党人梁启超却诬蔑孙中山是“欲以野蛮之力，杀四万万人之半，夺其田而有之”的“盗贼”^⑥。当时中国社会前进的主要障碍是封建势力，进攻封建堡垒就必须从土地上着手。因此孙中山土地国有思想的伟大，决不是改良派的几句滥言所能淹没的。它起了动员农民的作用（尽管是有限的）。

地 价 累 进 税

这是平均地权另一个重要方面。孙中山认为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同情甚至赞美社会主义。但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他认为阶级斗争（他一般称为阶级战争）是社会的“病症”，并相信各阶级在争取生存的道路上利益似乎是一致的，可以调和的。由于马克思揭示了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的学说，孙中山便说“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⑦。基于这种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对解决中国土地问题，他是主张逐渐、改良、和平的方法。他说：“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不过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产将来，不是共产现在。这种将来的共产，是很公道的办法。”^⑧

① “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总理全集”，第二集，第71页。

② “军政府宣言”。

③ “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方法”“中山全书”第三册，第18页。

④ 同注①。

⑤ 同注①。

⑥ 梁启超：“饮冰室全集”六册，“开明专制论”，驳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革命并行。

⑦ “中山全书”第一卷，第190页，“三民主义，民生主义”。

⑧ “中山全书”第一卷，第211页。“三民主义，民生主义”。

“地价税”对这“共产将来”是必须的，但全国那样多的土地把持在地主手中，政府不想夺来分给农民；政府更没有钱把那些地从地主手中买出来。所以“耕者有其田”、“土地国有”等理想的实现，当然是遥远未来的事情，孙中山自己也不知道需要多少年的“过渡”。为了在没有实现全国土地国有化之前，使农民减少一些负担，使地主一部份级差地租变为全民财富，用以建设国家，就必须用地价累进税的办法，向地主征以高税。这就是地价税的社会意义。它的具体办法大致如下：

如果地主土地初定价为一千元，按1%税率抽税，税额为10元。每年地价上涨，地主也必须向政府报新的、较高的地价，并被国家多征一些税（地主之所以“主动”、“诚实”地报出真实价格，乃是国家有按原报之价收买土地的法律；如地主为少纳税而不把市价报为自己土地的定价，国家一旦买去就大吃一亏。）。这样，假定十年后涨为两万元，地主要交二百元的税了。这就造成“水涨船高”的形势。“此在富人视之，仍不为重。”①孙中山写道：“苟地税依地价而定者，甚为稳当。地价高则纳税多；地价低则纳税少。”其目的是“使土地不劳增益，归之社会，不致为占据土地之资本家所有也”②。又说：“调地主所有之土地，使自定其价，自由呈报，国家按其地价，征收地价百之一税。地主报价欲昂，则纳税不得不重，纳税欲轻，则报价不得不贱，两者相权，所报之价遂不得不出之于平。国家据其地价载在户籍，所报之价即为规定之价。”③这就是孙中山的“地价税”主张。

这种累进税无疑是可以把地主一部份级差地租收为国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地价之高涨是以级差地租增大为主要内因的（尤其在交通发达地区更为明显）。地价上涨之倍数，也就是地租上涨之倍数。因此，随地价上涨相应增加地租，就可以从地主那里夺来一部分农民劳动果实。

这个办法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因为地租不增加，地价不能增涨，从而国家的税收也无法增加。

因此孙中山在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上有个重大矛盾：他一方面通过“定地价”，地价与时俱增之额，不为地主所有；另一方面“地价税”，标志着地主占有之土地价格，可以累增，并依据其累增之额，征其累进之“地价税”。前者必须以地价不变为前提，方能成立；后者必须以地价之累增为前提，才有意义。看起来二者不能并存，必择其一了。其实这种矛盾，正反映了民主主义革命派在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的软弱性。这个矛盾反映了这种土地纲领在实践上的空想性质。

“定地价”的目的，是逐渐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按限定之价将土地收归国有），这已经是包含着对封建势力的让步了。而“地价税”的实行，由于：第一，地价之上涨被法律所承认；第二，孙中山不主张用暴力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第三，土地价格日增，政府又无力把土地一一购为国有。足以证明：“地价税”不能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更谈不到是达到“耕者有其田”的手段了。不过“地价税”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那就是它可以迫使地主交出吞食农民的一小部份血汗，拿来“充公”，行的彻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富国”。过分夸大“地价税”的进步意义是不对的。它根本不能使“农民得享人生应有之乐”④。而封建势力也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经济领域中扩大自己的阵地，或一身兼为农业资本家来榨取农民。

“定地价”的主张，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并在宣言中声明：“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征收法、地价税法……”在宣言的对内政策部分说：“土地的税收、地价之增益，…皆为地方政府所有。”对内政策第十四条说：“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及土地征收法、地价税。私人所有

① “总理全集”第二集122页“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

② “中国之第二步”，这是孙中山一九一二年二月，辞去临时大总统时发表的。

③ “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方法”“中山全书”第三册，第18页。

④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总理全集”第二集，第39页。

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价收买之。”^①这里表明改组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确有通过国家立法实行平均地权的意图。^②但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出了平均地权两个方面（定地价、地价税）的自相矛盾，难以执行。因此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土地纲领，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军阀、帝国主义面前，注定是一种“善良的空想”了。所以说它是空想的，就是当时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不敢去发动广大农民用暴力去剥夺地主土地。孙中山在1924年说：“中国人民本来是分作士、农、工、商四种。这四种人除农民以外，都是小地主。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就效仿俄国的急进办法，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农民，那些小地主一定会起来反抗的。就是我们的革命一时成功，将来那些小地主还免不了再来革命。”同时孙中山谈到他对用暴力推翻地主的政策的看法时，说道：“我们此时实行三民主义，如果马上就要耕者有其田，把地主的田都拿来交给农民，受地的农民固然可以得利益；失地的地主，便要受损失。但是受损失的地主，现在都是稍微明白事体的人，对于国家大事，都很有觉悟；而一般农民，全无觉悟。如果地主和农民发生冲突，农民便不能抵抗。”^③这是对当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典型而完整的表述。虽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对农民也是很同情的，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特有的软弱性，这种对农民的同情，远小于它对封建势力的畏惧，因而不敢大胆依靠农民，并从农民那里获得力量，致使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不得不落空了。资产阶级不能彻底解放农民，这在中国得到了更确切的证明。

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失败了。但他仍不愧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先进的战士。他有坚强的斗志。在他的晚年，看到了他的政府由于脱离农民而没有任何作为，便想重新发动农民摧毁封建势力，组织农民代表与政界人士联欢，他又创办农民运动講習所，培养农民运动领导骨干，到乡下去发动农民，支持政府、要求土地，向封建地主斗争。孙中山

转向农民，是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及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他说：“现在俄国改良农业政治之后，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国的土地，都分到一般农民，让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对国家纳税，另外没有地主来收租钱。这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我们现在革命要效仿俄国这种公平的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是最彻底的革命。”^④但他不久就逝世了。

孙中山先生伟大之处，在于他不断前进。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及中国共产党初期的奋斗，促使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毛主席在1940年写道：“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⑤

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有其伟大的意义，有助于动员农民彻底消灭封建经济体系。它的性质是什么呢？列宁在论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任务时这样写道：“土地国有底经济意义，并不在于人们常常所追求的地方。它不在于反对资产阶级关系底斗争，……而在于反对农奴关系的斗争。”^⑥

“当无产阶级把历史上较老的敌人尚未推翻以前，则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是不能充分广泛开展和达到胜利结局的。因此，无产阶级在自己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最彻底的自由和最充分地消灭地主（农奴主的）土地占

①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总理全集”第三集39页。

② “耕者要有其田”，一九二四年对农民运动講習所学员的讲演，“总理全集”第二集496页。

③ “耕者要有其田”，“总理全集”第二集496页。还可参看“农民大联合”同上书，50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82—683页。

⑤ 列宁：“十九世纪末期俄国的土地问题”，“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98—99页。

有制。”^①很明显，孙中山土地国有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范畴，不是象他自己所想象的“社会主义的政策”。这种土地纲领是反封建的，不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这个任务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农民才完成的。1947年以后的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②。

但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方法与孙中山的土地纲领有本质的区别。第一，孙

中山在实现方法上是改良主义的，因而是空想的；共产党在与封建主义斗争中，是领导农民以排山倒海之势，用革命办法来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第二，孙中山平均地权的客观作用，是促进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迅速发展；而党在完成土地改革之后，并未使农业停止在小农基础上，并抛弃了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道路，领导农民在社会主义农业建设方面，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① “列宁全集”第11卷，俄文版153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央财经政策法令彙编，第一辑509页。

略谈拉萨尔的历史功绩和错误

关 勋 夏

在世界近代史教学中，讲述到德意志统一时期的工人阶级以及十九世纪晚期的工人运动时，都要提到拉萨尔这个人物。因此，对拉萨尔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历史功绩的评价和对他的错误观点的批判，是非常必要的。批判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纲领和策略，能够使学生进一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这对于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菲迪南·拉萨尔（1825—1864），出身于犹太富商之家，初起以律师为业，但主要是从事著述工作。他是当时著名的演说家和政论家。1848年，他曾参加莱茵省的革命运动，为马克思所主编的“新莱茵报”撰稿，因号召反对王权而被捕入狱。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德国工人运动从新开展起来，拉萨尔当此工人运动复甦之际，挺身而出，从事鼓动和组织工作。1863年五月，十一个城市的工人团体组织了“全德意志工人联盟”，拉萨尔当选为该联盟的主席。1864年，拉萨尔因为和海伦·顿尼吉恋爱与贵族拉可维柴在日内瓦

进行决斗，结果身遭重伤而死。

拉萨尔从1848到1863年，一直与马克思保持密切的通讯联系。他说他崇敬马克思，甚至还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马克思在五十年代德国工人运动开始复甦的时候，对拉萨尔的确很器重并曾寄以很大的期望。马克思虽然看到拉萨尔有缺点，但仍认为他是“坚决而精力充沛的”（1853年三月十日致恩格斯的信）。可是，拉萨尔并不能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拥护者和门生，相反地，他经常把从马克思那里剽窃来的正确理论和他自己的谬论混淆在一起，并且自吹自擂。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拉萨尔是一个牛皮政客。他对马克思一直玩弄着诡计，最后他与马克思的关系终于断绝，成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一翼的鼻祖。

1865年二月二十三日，马克思在伦敦致库格曼的信中使我们更能清楚地了解拉萨尔的品德。马克思写道：“首先我想简略向你说明我对拉萨尔的态度。在他从事鼓动期间，我们的关系中断了，这是：（一）由于他喋喋不休地从事自我吹嘘，同时他又极无耻地剽窃我以及

其他某些人的著作；(二)因为我毅然指斥了他的政治策略；(三)因为我在倫敦这里，早在他从事鼓动以前，就向他詳細地解釋和‘証明’过：由‘普魯士的国家’进行直接社会主义的干涉，是一种謬論。在他給我的信件中（从1848至1863年），也和跟我亲自会面时一样，他一直声明自己是站在我所代表的党方面的。但是当他在倫敦（1862年末）一确信不能对我施展他的伎倆的时候，他就决定以‘工人独裁者’的身份出来反对我和旧日的党。尽管如此，我还是承認他有鼓动工作的功績，虽然在他那短促的生涯結束时，甚至这一鼓动工作也开始使我感到越来越曖昧不明了。”①

二

馬克思所肯定的拉薩爾的历史功績是甚么呢？

拉薩爾的主要历史功績在于：他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促使德国工人階級脱离資產階級的政党而独立。1848年革命失敗后，德国經過了一个極端黑暗的年代。到了五十年代，反动势力的压迫稍为放松了一些。于是，德国工人运动从沉睡中甦醒过来。但是无產階級的政党还没有形成，德国工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还没有脱离行会的生产組織。六十年代初期，自由資產階級組織了各种啓蒙协会，阻碍着工人团体的形成；魏特林空想社会主义理論仍然毒害着当时的工人組織；叔尔茲·德里支組織的信用合作社，把工人階級引向脱离政治斗争的歧途。拉薩爾针对这些情况，指出工人階級必須爭取工人权利和进行政治斗争。1863年五月二十三日，在拉薩爾的领导下，組成了一个独立的工人政治組織，即“全德意志工人联盟”。虽然拉薩爾不是德国第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的組織者，但是他畢竟促进了六十年代的工人运动，促使工人階級脱离資產階級政党而独立。这是拉薩爾主要的不可磨滅的历史功績。关于这一点，列宁曾指出：“在德国方面，拉薩爾底偉大历史功績，就是他使工人階級由自由主义資產階級底尾巴变成了独立的政党。”②

馬克思与拉薩爾的关系后来虽然决裂了，

并且坚决反对拉薩爾的錯誤綱領和策略，但馬克思仍然在拉薩爾死后，公允地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績。1868年馬克思在給施維澤爾的信中写道：“在十五年的沉睡之后，拉薩爾复兴了德国的工人运动。这是他不朽的功績。”③

但是，这里必須注意的是，拉薩爾这一偉大的历史功績不能光是屬於他个人的。因为远在“全德意志工人联盟”成立之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已經为它的創立奠定了基础。在1848年革命时期，“同盟”在德国成立的支部已达三十个。“同盟”的盟員到处都站在革命的最前列，特別在萊茵区一帶，在“同盟”活动的影响下，工人曾受过共产主义的薰陶。1852年科隆共产党人審判案之后，“共产主义者同盟”虽然解体了，但是它的个别黨員还在繼續进行斗争，他們为德国独立的工人組織的創立奠定了基础。拉薩爾就是利用这种基础来組織“全德意志工人联盟”的。但是对于这一点拉薩爾是認識不足或者不願承認的，他否認和德国以前的工人运动一切自然联系。这种宗派的情緒使拉薩爾未能把“全德意志工人联盟”变成群众性的組織，它成立的第二年，其成員不超过五千人。拉薩爾所关心的只是如何組織和扩大他的宗派性質的組織，企圖要求整个工人階級运动服从于他的特殊宗派运动。

三

拉薩爾是德国社会民主运动中机会主义的鼻祖，他在政治和經濟綱領及策略問題上，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錯誤。拉薩爾主要的机会主义錯誤是甚么呢？

拉薩爾否認工人爭取組織工会权利的斗争，企圖把工会变成政党，取消工会运动，特別是否認工会領導的罢工运动。他說：“組織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二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55—456頁。

② 列宁：“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1948年莫斯科中文版，第98頁。

③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Избранные письма, 1953, стр. 212.

工会对于工人没有任何用处。它不能使工人的情况发生任何重要的改善。”

拉萨尔这个主要论点的根据是甚么呢？他认为英国工人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就获得组织工会的权利，但争取增加工资的斗争，其结果只是“悲惨的经验”。拉萨尔强调工人阶级不能改变“工钱铁律”，所以工会争取增加工资的斗争是绝对没有希望的。拉萨尔在1863年五月的一封公开信中是这样阐明他所“发现”的“工钱铁律”的：“这个铁的经济规律在今天的关系之下，在劳动供求支配之下，决定着工钱的这个铁的经济规律就是平均工钱始终停留在最低的生活必需的限度上……这个限度为维持生存和生殖起见是必需的。”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论工人如何进行英勇的斗争，也不能使工资提高，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

其实，“工钱铁律”只不过是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和普鲁东理论的翻版而已。这个“规律”的实质就是要求工人阶级放弃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因此它阻碍了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发展。拉萨尔不懂得甚么是工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钱铁律”是根本不存在的。工资包括两个部分，即物质的和社会的最低标准。工资的高低不仅依从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而定，同时，还随着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发展而变更。关于“工钱铁律”，马克思曾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给予严厉的批判。马克思写道：“大家知道，在‘工资的铁的法则’里面，除了从歌德的‘永恒的，铁的，伟大的法则’中借用来的‘铁的’这个词以外，任何东西都不属于拉萨尔。……这个论据是甚么呢？正如兰格在拉萨尔死后不久就已证明的那样，这就是（兰格亲自宣传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拉萨尔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资，而是追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外表当作事物本质哩。”^①

拉萨尔否认工人阶级为组织工会而斗争是极端错误的。他不懂得工人通过工会组织成为一个阶级的重要性。工会是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它不但教会工人阶级与资本家进行日常的斗争，从斗争中锻炼自

己，而且它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工人群众，把他们提高到了了解本阶级任务的水平，并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紧密联系起来。当时德国工人阶级争取组织工会的权利是绝对必要的，它不仅对工人阶级本身有利，而且还是对德意志各邦特别是普鲁士警察统治的一种打击，它破坏“雇农法规”和容克地主的统治基础。

拉萨尔既否定工人的经济斗争和工会运动，那末，他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规划了甚么样的道路呢？拉萨尔不是在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去寻求工人阶级真正获得解放的道路，而是依靠从普塞和普鲁东那里抄袭来的某些教条，作为万应灵丹。拉萨尔提出了争取普选权，通过有普选制的“自由国家”和普鲁士皇家辅助的工人生产协会来渐进到社会主义。

拉萨尔所提倡的普选权问题，在当时德国的情况下，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做，德国无产阶级可以把选举权作为宣传和接触群众的手段。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也没有否认过议会斗争的作用。然而拉萨尔却把这种议会斗争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唯一的手段。这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拉萨尔主张通过普鲁士皇家辅助的生产协会来渐进到社会主义的纲领，完全是毒害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拉萨尔在很多场合里都强调他的机会主义经济纲领。1863年四月十六日拉萨尔在他的演说中说：“我已经屡次强调指明，我需要有个性化的自愿的组织，但是，为了能使这些组织出现，必须经由国家辅助来获得必需的资本。”拉萨尔又在“全德意志工人联盟致柏林工人书”中写道：“为了解放你们的阶级，为了解放劳工本身，而不是解放少数的个别的工人，需要千百万的塔来尔，这些钱由国家立法拨给。”拉萨尔不仅在工人当中发表演说，同时还在反动政府的报纸上发表言论，并且组织工人代表团去觐见普鲁士国王威廉第一。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拉萨尔及其门徒形容为“普鲁士式的庸俗民主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7—28页。

者”、“普魯士皇家底社会主义者”是十分恰当的。

拉薩尔这一綱領的錯誤，在于他根本不懂得“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切形式中，不可缺少的而且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就是以工人阶级先锋队为首的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①。

拉薩尔否認工人阶级在其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中必須与农民結成联盟。拉薩尔認為农民是“反动群众”。他常常說：“和工人阶级相对立的一切其他阶级只是一个反动集团。”拉薩尔这个謬論是篡改了“共产党宣言”上的精辟論断而作出的。“宣言”里写道：“在現時与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一切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趋于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中等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都是專为挽救他們这种中等等级生存地位于灭亡而与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們并且是反动的，因为他們企圖使历史車輪倒退。如果說他們是革命的，那就是因为他們行將落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因为他們不是捍衛着他們現时的利益而是捍衛着他們將来的利益，因为他們抛弃他們固有的观点而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②拉薩尔并非不懂得“宣言”这段话的意思，恰恰相反，“拉薩尔熟知共产党宣言，犹如他的虔誠信徒熟知他編写的聖經一样。而他这样粗魯地歪曲宣言，不过是要为他跟那些專制主义的和封建主义的敌人們建立的反资产阶级联盟作辯护罢了”^③。

拉薩尔沒有从1848年欧洲革命运动，特别是法国六月起义失敗的原因中吸取应得的教訓，即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未能与农民結成联盟而失敗了的教訓。无产阶级若不与农民結成牢不可破的联盟，就不能贏得革命的胜利和巩固革命的政权，更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德意志最重要的政治問題是統一問題，即結束德意志在政治上支离破碎的局面。当时可以經由兩条道路来完成統

一：一条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建立全德意志共和国的革命道路；另一条則是由普魯士的地主贵族来领导，經過普魯士王朝的战争，建立普魯士君主国的反革命道路。拉薩尔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他当初对革命的統一德国的道路，采取了动摇观望的策略，而后来采取了反对的态度，并且与俾斯麦直接勾結起来。

早在1863年五月，拉薩尔就与俾斯麦訂立了默契，他领导的“全德意志工人联盟”就是得到了俾斯麦的默許才組織起来的。从此，他与俾斯麦的勾結更加紧密了。1863年六月八日，拉薩尔給俾斯麦的信中說：“工人層方面可能轉移得过来……承認皇帝为社会独裁底自然的負責者去反对資产者社会的利己主义。倘皇帝方面……肯下决心……开辟一个真正革命的民族方向并且亲手把特权身份的君主国改成一个社会的革命的民众君主国。”1864年九月末，拉薩尔曾准备到汉堡去要求俾斯麦兼并丹麦的石勒斯維格和哈尔斯丁兩公国，并保証“以工人的名义”来拥护这一兼并，以求得俾斯麦賜予普选权和对社会主义的贊助。但是，拉薩尔並沒有能够干完这个无耻的勾当，而在决斗中結束了他的短促生命。拉薩尔在德意志統一运动中出卖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他把工人阶级引向拿破侖式国家社会主义的錯誤道路上去。拉薩尔通过“全德意志工人联盟”实施了他的机会主义的策略，因而严重地阻碍了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傳播，阻碍了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形成。

四

拉薩尔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促使工人阶级脱离自由资产阶级而組織自己独立的政党，这是他的历史功績，但拉薩尔同时又是一个把资产阶级的影响帶到德国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来的先导者，他成为德国工人运动全部历

① 赫魯曉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20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版，第40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9頁。

③ 同②，第二卷，第24—25頁。

史中的机会主义者所崇拜的偶像。拉萨尔死后，施维泽尔继承了他的衣钵。拉萨尔派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障碍。

1875年，埃森那赫派与拉萨尔派合并，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90年改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并通过了“哥达纲领”。由于埃森那赫派对拉萨尔派作了不能容许的让步，使“纲领”变成了颂扬拉萨尔的信条。这样，不能不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及其理论和策略作一次彻底的批判。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和恩格斯在评论“纲领”的书信中，光辉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

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者长期地隐藏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纲领”批判的文件，不让它们公诸于世。直到1891年，该党在爱尔福特举行代表大会，通过新的纲领之前，恩格斯认为不能再推迟发表“哥达纲领批判”这个重要文件。这个文件终于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恩格斯又为这个文件作了序言。这样，就触怒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1891年五月二十三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发表了专论，公开反对“哥达纲领批判”，并抨击马克思对拉萨尔的评价。这些机会主义者认为，他们采用了“哥达纲领草案”，即那个充满和颂扬拉萨尔谬论的纲领，是该党的一个重要功绩。倍倍尔也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反对马克思的文件，他曾企图阻止“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后来，倍倍尔在他的自传中仍然流露了这种不满的心情。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又竭力削弱批判拉萨尔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无产阶级的叛徒考茨基，就是这一类的典型人物。1891年考茨基在他主编的“新时代”上，发表了“我们的纲领”一文。在这篇论文里，他竭力贬低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实践意义，而强调了拉萨尔的“丰功伟绩”。考茨基写道：“马克思对于拉萨尔所取态度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底态度，……社会民主党另外有一个态度对于拉萨尔，和马克思底态度不同……我们那能忘记这个人（拉萨尔）？所有我们党的老同志甚而大多数年青的朋友们底最初的社会主

义的知识和对社会主义的热情都是从他（拉萨尔）的著作里得来的。我们谨慎的研究并检讨马克思说些什么关于他学生拉萨尔，但我们决不忘拉萨尔也是我们最初的许多导师和战士之一。”^①的确，拉萨尔是德国社会民主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导师，并且还是机会主义者的一面旗帜，以后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社会法西斯主义者，都屡次提出“回到拉萨尔去”的口号。

最后我们引用1891年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信（二月二十三日）中的一段话，作为对拉萨尔批判的总结。

“拉萨尔已有二十六年是属于历史的了。如果在非常法律时期没有使他受过历史的批判，那末现在终于已到了历史的批判应该完全出现的时候，已到了应该弄清拉萨尔在对马克思的关系上所处的真正地位的时候了。要知道，掩饰拉萨尔的真实面目并把他捧得天花乱坠的神话是不能成为党的信仰象征的。尽管把拉萨尔对于运动的功绩评价很高，但他在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仍然是两重性的。……1862年前他在实际上还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波拿巴主义倾向的特别普鲁士式的庸俗民主主义者……，由于纯粹私人性的原因，他骤然改变了阵线而开始了他的鼓动工作。还不到两年，他就已开始竭力使工人站到国王政权方面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与性格和他相近的俾斯麦共同进行了这样的阴谋，以致如果他不是及时侥幸被打死的话，那就一定会实际出卖运动。在他的鼓动著作里，从马克思那兒剽窃来的正确的东西与他自己的即拉萨尔的并且通常是错误的议论如此交織在一起，二者几乎不可能区分开来。感到自己被马克思的批评所侮辱了的那一部分工人，只是从拉萨尔两年的鼓动活动上了解拉萨尔的，而且还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看这一点的。但是在这种偏见面前，历史的批判不能永远保持恭敬的姿态。……应该一劳永逸地肃清关于拉萨尔的神话。”^②

① “新时代”，1891年第一卷，第680页。转引“哥达纲领批判”附注114，人民出版社版，第14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5—46页。

兩次大战之間英美对德国的扶植和縱容

李 純 武

一 德国經濟力量是怎样恢复和發展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冲垮了霍亨佐倫王朝在德国的統治，在經濟上也使德国蒙受巨大的損失——举例說，这个战敗国家損失了五分之二的煤，三分之二的鉄矿儲量，十分之七的鋅，十分之一的制造厂，七分之一的农产等等①。

霍亨佐倫王朝对德国人民的統治是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德国經濟力量是恢复得很快的。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德国以外的国家領土上进行，德国工業本身未遭到战火的严重損害；更重要的是1924年以后流入的大量外資，培育了德国的經濟力量。

我們知道，1924年出現了所謂的“道威斯計劃”。这个計劃的实施是德国經濟恢复和發展的起点，也就是德国軍国主义复活的轉折点。“道威斯計劃”的起草者，認為德国的賠償能力以它的通貨的稳定、預算的平衡和生产的能力为轉移。因此这个計劃要借德国經濟的恢复，来提高德国的賠償能力。要恢复德国的經濟，首先必須使德国的通貨得到稳定（1924年以前因通貨膨脹的結果，德国的馬克价值实际上已丧失殆尽，德国經濟已經完全崩潰）。因此，这个計劃建議先貸給德国八亿金馬克的国际信用貸款（在当时等于四千万英鎊或一万九千零四十万美金），用来协助德国稳定通貨和平衡預算。接着，德国發行了重工業公債和鉄路公債一百六十亿金馬克（其中重工業公債为五十亿，鉄路公債为一百一十亿），公債的半数以上銷于美国，四分之一以上銷于英国②。

“道威斯計劃”替外国資本，特别是美国資本敞开了德国的大門。在以后五年里面，差

不多每个德国的重要城市和私人企業都在美国和英国大量借款，举例說，在1925到1927年間，它們所借的外債即达四十三亿五千四百万馬克。从1924到1929年，涌入德国的外国資本里有一百五十亿馬克以上的长期貸款，有六十亿馬克以上的短期貸款，根据某些材料看来，当时外資总额还要大大超过这个数目。这些外資的百分之七十都是来自美国的③。

对于德国經濟的恢复和發展，外資的作用就象生命中的血液一样。当然有一部分借款用来支付了賠款，但是絕大多数都用来恢复和扩展工業了。借着外資，借着对无产阶级压榨的加强（通过“合理化运动”的形式），德国經濟高漲的現象从1925年已經开始。举例說，它的輸出額急速地增长，到1927年已达1913年的水平。就几种重要产品的生产情况說，1927年煤的产量达到一亿五千三百余万噸，差不多比1913年的产量多了一千五百万噸；褐煤产量达到一亿五千一百余万噸，差不多比1913年的产量多百分之八十④；1928年鋼鉄的产量已經达到1913年的百分之九十七以上⑤。德国的冶金工業、化学工業、机器制造工業、电工器材工業都特別發达。在1928到1929年間，也就是在世界資本主义遭受严重經濟危机的前夕，德国出产的工業品占全欧洲产量（除开苏联，下同）的三分之一，电力占欧洲的三分之一，煉鋼占五分之二，化学产品占二分之一，机器制造

① 藍森：“1914年以后的世界”，商务印書館版，第431頁。

② E.H.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the Peace Treaties” 第四章第一节。

③ “揭破历史捏造者”，莫斯科中文版，第8頁。

④ 同①，第433頁。

⑤ R.L.Buell: Europe: A History of Ten Years, 第93頁。

業的产品占到將近三分之二^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的壟断組織本来極為發達。在战后德国經濟复兴和扩展的进程中，它們又很快地摆脱了战敗的影响而迅速地恢复了元气。二十年代里，德国出現了巨型的冶金康采恩——“联合鋼鐵公司”，大財閥史丁尼斯^②建立了“煤業帝国”，化学康采恩——“伊·格·法本（顏料）化学公司”——加强了。这些重要的工業壟断組織跟美国 and 英国的壟断組織有密切的联系。举例說：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化学康采恩“杜邦化学企業公司”和不列顛化学托拉斯“帝国化学企業公司”，都跟德国的化学康采恩“伊·格·法本化学公司”有着工業上的密切关系，并且在1926年簽訂了瓜分世界火葯銷售市場的协定。德国的鋼鐵工業托拉斯“联合鋼鐵公司”的信用貸款，差不多都是从华尔街的最大銀行之一“第倫·里德銀行”貸来的。从1924年十月到1928年年底，这个銀行就在德国投入了二亿金馬克以上的貸款。

以上的情況一方面說明了英、美的壟断資本家和德国壟断資本家之間的密切关系，同时又說明：“德国賴有主要是美国壟断組織底財政援助，在短期間內便恢复了强大的軍事工業，这种工業能够生产大量的头等軍备，即成千成万的坦克、飞机、大砲、最新型軍艦及其他种种武裝。”^③

二 英国对德国侵略的縱容

外国資本特别是美国的資本促成了德国重工業的恢复和發展，給德国的侵略創造了必要的物質条件。此外，助长法西斯德国發动侵略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所推行的罪惡昭彰的“綏靖”政策，換句話說，就是縱容侵略的政策。

1933年一月，当德国还未从資本主义世界經濟危机漩渦里爬出来的时候，德国的大工業家和大銀行家想用法西斯專政来維護他們的統治，把法西斯头子希特勒捧上了台。希特勒执掌德国政权，就意味着侵略战争的开始發动。关于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对待法西斯德

国的态度或政策，英国的邱吉尔曾在1942年六月二十二日的“关于德国侵略苏联广播演說”里作过这样的評述：“我們和世界其他国家（笔者按：只能指美法帝国主义）愚昧因循，任令納粹匪徒从一无所有而年复一年地建立了可怕的战争机器”。事实上，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不仅听任法西斯国家建立了可怕的战争机器，而且听任它“在不断的运用中殘害人类生命和蹂躪千百万人的家园和权利”。

这里我們首先看看英国怎样推行它的“綏靖”政策，并促使希特勒的侵略行为一步步扩大起来的。

希特勒攫取德国政权之后的头一二年，法西斯德国由于力量未足，还未进行公开的侵略，但是1933年十月德国为軍备問題而退出国际联盟的举动，已足以显示德国的挑战态度了。当时排在希特勒侵略日程上的首要工作是取消凡尔赛条約对于德国的軍事限制^④。1935年三月間，德国半官方声称，此后德国政府將解除它所負的不得成立空軍的义务，接着德国政府又發布了普遍兵役令。这是德国政府公开撕毀凡尔赛条約的行动，凡尔赛条約的主要签字国之一的英国仅仅作了簡單的外交表示，即向德国提出抗議。德国政府对英国的作法很满意，德国報紙說英国政府“对当前局势有适当的了解”。事实上，英国的抗議确实是一个形式，因为三个月以后英国就跟德国簽訂了海軍协定，其中規定“德国海軍力量等于英国海軍力量的百分之三十五。”如果說，英国对德国

① 梅尔尼珂夫：“为統一、和平、民主的德国而斗争”，人民出版社版，第8頁。

② 史丁尼斯是德国的大財閥。据說在他死的时候（1924），他跟1388个企業有利益关系，拥有土地、森林、旅館、紙厂、避暑地、油田、报館、电气公司、銀行、煤鉄矿、銅矿、鉛厂和其他几十种财产，操縱了德国生产总額的五分之一。

③ “渴破历史担造者”，莫斯科中文版，第10頁。

④ 凡尔赛条約第159—163各条規定德国陸軍不得逾十万人；第173条規定德国廢除普遍和强迫的兵役制；第191—197各条規定德国海軍只許有主力艦6艘、輕巡洋艦12艘、驅逐艦12艘、魚雷艇12艘；第198条禁止德国建立空軍。

撕毀凡尔賽条約軍事条款的妥协态度，等于把侵略者的手解开了，那么英德海軍协定，又明白地說明凡尔賽条約不仅被德国所破坏，而且也被英国政府踐踏了。

希特勒侵略日程上的另一行动是出兵萊茵非武裝区。按照和約規定，德国不得在萊茵区駐兵設防；在“羅迦諾公約”里，签字各国共同地或各別地保証此項規定的履行。1936年三月七日，法西斯德国的軍队开进了萊茵非武裝区。对于此事，英国政府宣称德国違反条約义务，但是馬上又說德国的举动實質上并不構成战争行为，亦无釀成武装冲突的威脅。結果，希特勒又胜利地把他的侵略政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法西斯德国提出了“以大砲代替奶油”的口号。整軍备战工作因德国的重工業早已恢复和革新而获得迅速的进展。到1936年，德国已拥有軍用飞机四千五百架，坦克一千五百余輛。同年年底，德国正規軍已达七十到八十万，步兵的技术装备要比1914年优越四倍。希特勒仗着这股軍事力量，于挑起西班牙法西斯匪徒的叛乱之后，跟法西斯意大利一起去屠杀西班牙人民。

在西班牙內战的过程中，英国跟法国結合起来，实行了罪惡昭彰的“不干涉”政策。由于这种政策的推行，西班牙共和政府事实上被英法窒息了。但是另一方面，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的飞机、大砲和軍艦却在屠杀西班牙人民。西班牙共和政府被“不干涉”政策封鎖了，从德意运給西班牙法西斯匪徒的軍火却源源不絕地从葡萄牙涌进去。

法西斯德国的侵略步步向前，英国对法西斯德国的“綏靖”政策也推行得更为徹底。当1938年三月法西斯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时候，英国首相張伯倫虛偽地宣称：德国这种行为值得严惩。但是不到一个月，他的政府就正式承認了奥地利并予法西斯德国。

德国吞并奥国，就是实现了它的統治中欧的第一步計劃，并且掌握了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南欧的战略基地。几个月以后，它就向捷克斯洛伐克伸出了魔掌。当时法西斯德国的侵

略正是得寸进尺，所以連邱吉尔这样的頑固分子也認為應該联合苏联，制止侵略。他在“欧洲危机”那篇文章里說：“英、法、俄如果联合照会希特勒，叫他了解进攻捷克就要引起三国立刻的干涉。如果罗斯福同时也声明該照会得到美国精神的支持，那么方可希望文明世界不致淪于大禍。”^①但是以張伯倫为首的英国反动集团仍然繼續推行那縱容侵略的“綏靖”政策。当希特勒陈兵德捷边境的时候，張伯倫不惜“僕僕風塵”，从1938年九月十五日到九月二十九日，三次飞往德国向希特勒屈服。九月二十九日英、法、德、意簽訂了慕尼黑协定，把捷克斯洛伐克出賣給了法西斯德国。英国“綏靖”政策的罪惡，到此已达頂点，对德国侵略的縱容似乎无以复加了。

对于英、法縱容侵略的政策，斯大林曾經断言他們必定自食其惡果。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說过：“那些主張不干涉政策者所开始的巨大而危險的政治把戏，結果是会使他們自己遭受严重失敗的。”^②慕尼黑协定簽訂不到一年，希特勒的侵略矛头就直接指向英、法了。

三 美国对德国侵略的縱容

英、法統治集团所实行的“綏靖”政策，罪惡昭彰，人所共知。但是我們也不可忽視美国資产階級反动集团亲法西斯主义的立場及其罪惡的結果。

我們知道三十年代开头，侵略势力已經抬头，日本帝国主义侵犯我国东北地区就是一个鮮明的标志。希特勒取得德国政权以后，亞洲和欧洲的侵略力量一天天地狂狶起来，与此同时，美国孤立主义的势力也最为囂張。著名的孤立主义分子象參議員威勒尔和塔虎脫，前总统胡佛，林白上校代表那些跟德国壟断企業有关联的美国壟断資本家的利益，反映壟断集团的观点，在对內对外政策上采取公开的亲法西斯的立場，主張对法西斯的侵略采取不干涉政策。

① 轉引自“世界外交史”第五分册，五十年代出版社版，第211頁。

② “列宁主义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748頁。

美国孤立主义分子罪恶主张的结果之一，就是美国国会在1935年八月所通过的“中立法案”。这个法案规定，授权总统禁止把军火等战争物资运赴交战国。1937年，这个法案又补充了一些新的条款，禁止美国政府和美国公民的船只为交战国运送物资，又禁止出售武器给交战国和爆发内战的国家。

美国实施中立法案的时候，正是法西斯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发生内战、日本大举进犯我国、德国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际。“中立法案”一方面使那些被侵略的国家购买不到美国的军火，同时也就是起了鼓励侵略者的作用。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者黎文斯曾经批评说：“他们急忙地放弃他们祖先在两次战争中所保存下来的许多权利，向全世界宣告，不分是非，一切交战国都得不到他们的援助。这一切都包括在1935到1937年的中立法案里。”^①连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说：

“我们的中立法案推行起来可能很不平均，很不公平——可能实际上援助了侵略者，而对于被侵略者则拒绝了援助。”^②

当法西斯德国挑起侵略战祸的时候，罗斯福正任美国总统。他是“一个获得美国广大民主群众拥戴的自由主义者”^③。在对外政策上，罗斯福站在反对法西斯侵略的立场上，

“可是，他自己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利益以及政府内外的国内反动势力太强大，以致他的政府在紧要关头的战前年代，不能采取一个真正的反法西斯的政策”^④。举例说，美国对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采取了不干涉政策；美国对法西斯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暴行只是袖手旁观；当德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美国又向慕尼黑分子屈服了；更坏的是：美国也跟英、法一样，拒绝了苏联建立集体安全制度的建议。

美国跟英国一起纵容了法西斯德国的侵略。纵容的方式容有不同，但是纵容侵略的罪恶同样是洗不掉的。

四 英、美扶植和纵容德国的阴谋及其结果

美国和英国对法西斯德国的扶植和纵容，

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是“纵火上身”。那么它们为什么要这样作呢？分析起来是有其原因的。

从经济的利益上出发，美国和英国都有它们自己的打算。就美国说，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了横财，由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那时候，协约国向美国借的借款多到一百亿以上的美元^⑤。就法国说，如德国缴纳赔款，法国就须向美国付借款。英国在战争期间，一方面向大陆上的协约国家放债，另一方面向美国借入，它表示各国解决债务问题的时候，英国收回的借款数目要足以付给美国，这样一来，战债问题便和德国的赔款问题发生了难以分割的牵连。很明显，美国用“道威斯计划”来稳定德国的通货，恢复德国的经济，从而提高德国赔偿的能力，也就是为美国收回借款创造了一个条件。而且，德国通货的稳定，又给美国的资本形成了一个有利的投资场所；美国垄断集团还打算透过投资，使德国各个重要工业部门屈从于美国垄断资本家们的控制。

就英国说，它也希望德国的通货稳定下来，给英国开辟一个投资场所。除此以外，英国还怀有另外一个目的，英国保守党的重要头子之一曾经出任过首相的鲍尔温对此一点说得很明白：“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可使德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德国对俄贸易向来最称活跃。……据我看来，国际贸易最有利的办法是借德国的帮助去对苏联扩展贸易。德国过剩的产品可以倾销于苏联市场，从而可以取得它所需要的款项，使我们可以支付我们欠美国的债务利息。而德国大批出口货也不致向英国及殖民地倾销了。”^⑥英、美的统治集团都替本国的垄断资本家打算的很周到，实际上都是

① A. Nevins, H. S. Commage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第484页。

② 转引自黄绍湘著“美国简史”，三联书店版，第378页。

③ 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人民出版社版，第561页。

④ 同上。

⑤ R. L. Buell: Europe: A History of Ten Years, 第95页。

⑥ 转引自“世界外交史”第四分册，第266页。

些“利令智昏”的想法和作法。

从政治的角度上去看，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扶植和縱容德国的陰謀是人所共知的，那就是要利用德国去作进攻苏联的急先鋒。在罗迦諾公約里，他們明显地透露了这种陰謀。1929年以后，帝国主义国家的資產階級又認為法西斯主义是摆脱資本主义危机的唯一出路。这就是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縱容希特勒及其盟友的原故。比較地說，前一种陰謀更为主要。对于帝国主义的陰謀，斯大林曾一針見血地揭露过：“在不干涉政策中浸透有一种趋向，一种願望，就是不妨碍侵略国去干它們的黑暗勾当，譬如說不妨碍日本糾纏于对华战争，更好是对苏战争；譬如說不妨碍德国陷落于欧洲事务和糾纏于对苏战争；讓一切交战国都深深陷入战争深渊；暗中鼓励它們这样干；讓它們彼此削弱，互相消耗；然后，当它們十分疲憊时，就帶着新鮮力量出台活动，当然是‘为了和平’来出台活动，迫使那些精疲力竭的交战国来接受它們所提出的条件①。”

“作繭自縛”是英、美扶植和縱容侵略的

一个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終究不是由德国侵犯苏联开始的。希特勒大規模的进攻首先对着英法，第一，这是因为他們各別之間强烈的帝国主义的对立，終于不能使他們結合起来。具体地說：“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壟断資本家本身可以接受法西斯主义，但他們却不要一个以德国資產階級为主腦的世界。在他們所夢想的新的法西斯世界中，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大資產階級都要操縱統治和剝削，甚至象他們在垂死的資本主义世界中所充当的首腦地位一样。”②其次，法西斯德国也認識到社会主义的苏联絕不会去侵犯別人，而且苏联的强大也使法西斯德国不敢首先去侵犯它。

英、美扶植和縱容法西斯德国，給人类造成了一次大灾禍。它的慘痛的結果，人們記憶犹新。但是，今天美帝国主义者在西德不仅重复二次大战以前的罪惡活动，而且更变本加厉了。看起来，帝国主义者并未接受历史的教訓；可以断言，到头来又必然是“玩火自焚。”

① “列宁主义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746頁。

② 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綱”，人民出版社版，第587頁。

反法西斯統一战綫是怎样形成的

穆 林

从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来已經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中，被压迫人民經历了长期而坚苦的斗争，終于赢得了巨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已越出一国范围成为世界体系，并出現了反殖民主义的和平中立国家集团。到目前止，在世界范围以內，九亿以上的人口摆脱了資本与殖民奴役的束縛，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六亿以上的人口摆脱了殖民主义者的压迫，沿着民族独立的道路向前發展。

四十年来，世界历史發展进程所表現的特点是：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出現，无产階級与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發展成为两种体系和两种制度的对立与斗争。另一方面，由于資

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殖民地与宗主国以及資本主义国家間的矛盾空前激化和尖銳起来。在这一系列的矛盾斗争中，以苏联为首的世界无产階級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形成反帝国主义的共同战綫。这就是現代历史發展的推动力量和主流。而帝国主义势力在这种形势面前，无时不在企圖以他們的联合力量，来窒息乃至扑灭世界革命力量。但是由于它們之間的不可克服的利害冲突与矛盾，而不能不經常处于破裂状态中。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由共产国际所提出的，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形成的为反法西斯而斗争的統一战綫具有重大的意义。当国际帝

国主义，时时刻刻在陰謀組織、准备和伺机發動新的侵略战争的今天，重新回顾一下为反法西斯而斗争的統一战綫的历史，仍然是有意义的。

1929年，泛资本主义世界的經濟危机爆發之后，整个世界处于机噤不安之中。少数壟断財閥日益依靠法西斯主义来拯救他們已經动搖了的統治地位。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籠罩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法西斯分子取得政权的国家里，残余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与广大劳动人民起碼的自由与生存权利已被剝夺净尽。仍然保留着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中，壟断財閥企圖建立公开恐怖專政的陰謀也在不断地策划着。

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土崩瓦解着。所謂“未吃饱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就是已經建立了壟断資本公开專政的法西斯国家，現在已經走上了公开的侵略与發動新的世界再分割战争的道路。例如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一書中，即露骨地表明了他的侵略計劃：（一）發動对苏的侵略战争；（二）击败法国；（三）粉碎欧洲各小国与不列颠帝国。德国于1933年退出国联，在这以后即公开重整軍备，撕毀凡尔赛和約与罗迦諾公約，步步走向發動新的世界战争的道路；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燃起了战火；1935年意大利开始侵略埃塞俄比亚，而后，就形成了所謂柏林——羅馬——东京軸心的公开侵略集团。

德、意、日的重分世界市場与殖民地的意圖，虽然与当时所謂“吃饱了的”帝国主义国家——英、法之間存在着十分尖銳的矛盾，英、法的利益遭受到上述法西斯国家的严重威胁，但是它們对于进行一次新的世界战争并不是不感兴趣的，它們同样企圖在一次新的世界大战中来削弱和消灭它們的競爭者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便在更大的規模上树立它們的世界霸权，并以此来緩和与解脫它們的内部危机。美帝国主义在这一点上也并不例外。不过，当时所謂民主国家还不願立刻發動这样的战争，因

为对于拥有更多的殖民地的英、法說来，保衛它們已获得的大量殖民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問題。任何新的战争对于它們的危險更要大一些，只有在确保必胜的条件下，它們才会發動这样的战争。因此，在法西斯国家步步走上侵略道路之时，所謂民主国家不仅一般地准备新的战争，而且特别是鼓励法西斯国家从事反苏战争，以达其一举兩得之目的。而法西斯国家正是以反苏先鋒自任，吸引一切国际反动势力来支持其战争政策，为發動战争准备和創造更有利的环境与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法西斯恐怖專政的威胁与新的世界大战的危机日益严重起来。

在当时条件下，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不仅只是一般的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問題，而且是如何击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消灭资本主义中的最反动的部分以保衛世界和平的問題。这就要求国际无产阶级团結起来，要求各国人民与进步势力团結起来，以形成一条反法西斯与保衛和平的共同陣綫，来击退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保衛世界和平与民主自由。

1935年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提出了为反法西斯統一战綫而斗争的任务。它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工人与社会民主党工人——首先团結起来，与广大的劳动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形成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綫，在法西斯掌政的国家中，集結力量，为最后推翻法西斯專政創造条件，“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阻止反动势力底进展，打退資本及法西斯主义底进攻，不讓资产阶级的政府取消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①，进而形成人民陣綫政府，以結束这些国家当权派的罪惡的反苏与亲法西斯政策，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和制止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活动，为最后消灭法西斯势力創造条件。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中，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組織广泛的民族战綫，以打退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和結束帝国主义的殖民奴役。在无产阶级已經取得胜利和作为世界和平堡壘的

① “季米特洛夫文集”，解放社1950年版，第206頁。

苏联，则大力支持各国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的努力，利用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孤立法西斯势力，组成反法西斯国家间的联合，揭露各国当权派的反动政策，为各国人民力量的发展创造条件，以便最后埋葬法西斯势力。由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苏联和各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起来。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的历史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二次大战前时期与大战爆发后到其形成时期。前一时期主要任务在于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在法西斯主义尚未取得胜利的国家中，打退法西斯的进攻和制止法西斯国家准备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侵略活动。后一时期的任务在于争取变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为反法西斯战争，以便最后消灭法西斯势力。

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各国共产党与无产阶级，在为争取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法国工人阶级不仅依靠着自己的团结，在1934年二月打退了法西斯的武装进攻，并于1936年一月形成了包括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与共和党在内的人民阵线。同年四月国会选举中，人民阵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由于人民阵线的建立，法国的工人和农民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条件和政治地位。在那几年中，法国共产党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中等阶层中博得了广泛的信任，在劳动人民中间树立了极高的威信。到1939年初，法国共产党已成为由四万人增加到二十七万人之众的大党。

西班牙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36年一月组成了包括共产党、社会党、左翼共和党、民主联合党与加达隆尼亚工党等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利益的人民阵线，同年二月的国会选举中，人民阵线取得胜利，在西班牙人民阵线掌政期间，共产党团结了广大的人民，改善了工人的生活，使农民取得了土地，并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反对叛军和武装干涉者的斗争。在这一斗

争中，西班牙共产党，由1931年不到一千人的党，发展到1939年初的三十万人的大党了。

中国共产党人，在执行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决议过程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英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以及其他各国共产党，在执行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路线中都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就，英国共产党在1934年九月击退了摩斯里法西斯匪帮的进攻。意大利共产党于1937年七月，与社会党人缔结了统一行动的协定，它奠定了后来两党在反法西斯事业上共同行动的基础。而在这些年代中，值得特别提出的就是各国共产党人、工人阶级对西班牙共和事业的援助，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际工人阶级团结的进一步发展。

尽管如此，在第二次大战之前，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未能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起来，未能在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以人民阵线政府代替反动的亲法西斯政府，而某些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后来又失败了，致使后来的法西斯国家的战争政策得逞。这一过错主要是由于右翼社会党人的背叛政策所致。例如在法国，掌握着社会党领导权并两次组阁的勃鲁姆，是一个彰明较著的阴险政客，虽然在群众压力下与共产党人建立了统一战线，然而“却背着群众去和资产阶级商量：怎样才可以最快地取消这个‘实验’，怎样才可以约束工人阶级，怎样才可以最好地实现本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计划”^①。在他第一次领导内阁时，曾暗地帮助法西斯组织“火十字团”的活动，而在其第二次组阁时，则公然反对共产党人加入政府，致使法国人民阵线遭到破裂。在西班牙，以贝斯泰罗为首的右翼社会党人则不断向叛军出卖共和国的军事机密和策动反革命阴谋，最后，当共和国遭到严重困难之时，他们则公然背叛了共和国，致使西班牙人民共和事业遭到失败。当然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工党领导与法国社会党人都不能辞其咎，谁不知道勃鲁姆与工

① “共产国际”，1940年第五号，第22页（转引自“世界现代史”，1936年三联书店版，第698版）。

党上层分子是“不干涉”政策的倡导者和赞助者呢?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战前之遭受挫折,第二国际应当负重要的政治责任。从1935年起,共产国际不断向第二国际呼吁,提議两个国际在反对法西斯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支援西班牙人民共和事业与反对法西斯侵略事业上,共同行动起来,但是所有的提議都为第二国际的领袖拒绝了。由于国际工人阶级的统一遭受第二国际领袖的破坏,因而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阵线运动也遭受到破坏,这样也就使法西斯国家得以顺利地推行其战争政策。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曾为反法西斯的国家联合事业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它在为实现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事业中,作了最大的努力:一方面,对遭受法西斯国家侵略威胁的国家给予真实的援助和支持;另一方面,则争取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爱好和平国家的统一战线,以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发生。

1935年秋,法西斯意大利发动对埃塞俄比亚侵略战争之后,苏联在国际联盟内,力争对法西斯意大利实行全面制裁,以保卫埃塞俄比亚的民族独立。在西班牙发生了佛朗哥的军事法西斯叛乱与德、意干涉之后,苏联一方面以物资与志愿人员来援助西班牙人民,一方面不断揭露英法等国当权派所奉行的“不干涉”和“中立”政策的实质,以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支援法西斯受害者西班牙人民而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所给予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当希特勒德国1938年占领奥国和威逼捷克的时候,苏联也为制止这些不幸事件的发生而做了很大的努力。在奥国问题上,苏联政府声明它“仍然决心参加一切集体行动,只要这些行动是由它参加决定,以期停止侵略势力之发展,并消弭业已加深的新的世界大战危险”^①。在捷克危机迫在眉睫,西方帝国主义出卖捷克的阴谋已经成熟之时,苏联政府曾通过捷克共产党主席哥特瓦尔德,转告捷克总统贝奈斯:“苏联可以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唯一的条件是捷克斯洛伐克也自己保卫自己,并向苏

联提出援助的要求。”^②苏联正是企图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奠定反法西斯联合的基础和推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在争取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联合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外交斗争中,苏联一方面揭露西方国家当权派所执行的亲法西斯政策的阴谋实质,一方面力争反法西斯国家联合战线的形成。当法西斯国家对外侵略威胁刚刚形成时,苏联于1932年至1933年,就和许多国家(包括法国、波兰、芬兰、意大利等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1933年夏,在伦敦经济会议期间,苏联又与许多国家,主要是与其接邻的国家,签订了侵略国定义公约,以孤立法西斯侵略国家,并打击西方帝国主义恣意法西斯国家反苏的阴谋。

其后,当侵略势力日益扩张,中立与互不侵犯条约不足以制止侵略事态发生之时,苏联便致力于建立集体安全阵线。这时苏联一方面应邀加入国联,一方面于1935年先后与法、捷两国订立了互助公约,以便经过多边互助公约之缔结形成集体安全体系。1939年春,当世界大战已迫及眉睫之时,苏联乃力争与英、法等国结成制止法西斯国家侵略行动的同盟。但是苏联这些努力都没有得到相应的结果。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由于西方国家当权派的反苏政策,在法西斯侵略威胁面前,他们宁愿对侵略者让步,牺牲小国,以换取帝国主义国家的反苏联合之实现,特别是法西斯国家反苏战争之实现。

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苏联与世界工人阶级为首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由于第二国际领袖们对工人阶级利益的背叛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当权派的反苏阴谋,而未能形成,以致当各法西斯国家已经形成罪恶的战争集团之时,世界人民与各和平国家尚处于分裂状态,无力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虽然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与各国人民的努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文件和材料”第二卷,1943年莫斯科中文版,第85页。

②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0年二月廿五日,中文版。

力并不是白費的，它不仅在于若干国家内抑止和打退了法西斯的进攻，保卫了资产阶级民主制，而且推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日。在这些斗争中，锻炼了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提高了他们的组织性和政治觉悟，使各国无产阶级日益摆脱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而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使各国人民不仅认清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質，也进一步认清了第二国际領袖之本質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当权派的反动实質，認識到保卫民主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事业，在国内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人民，在国际上只有与苏联建立联盟和团结在苏联周围，才能取得胜利。特别有意义的一点是：由于苏联的强大和它所执行的政策正确，又由于英、法当权派及其幕后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之反苏意圖及其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事业的破坏，使极端反动的法西斯势力认清了他们的弱点，因此由法西斯国家所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首先从侵犯苏联开始而开始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間。这就使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不能不和法西斯侵略集团正面冲突，因之也就大大便利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事业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三

从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之后，特别是1939年九月法西斯德国发动对波兰侵略之后，由法西斯国家所长期准备的侵略与重分世界的战争便全面地爆发了。这时除了被侵略国家人民奋起进行反抗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之外，为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英、法统治集团，也投入了战争。这时由战前种种矛盾而逐渐形成的三个营垒，由于战争的爆发，而完成了这一过程。即：极端反动的法西斯侵略集团，为维护其殖民利益的英、法集团（包括其幕后支持者美国）与团结在苏联周围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及法西斯主义的人民阵营。

这一时期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的斗争形势表现为：法西斯侵略集团利用了和继续利用着英、法统治集团的反苏政策来实现其侵略计划。即当德国在占领波兰之后正准备着对包括

英、法在内的欧洲国家的闪击，意大利在地中海夺取战略地带和准备夺取英、法在非洲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除继续其侵略中国的战争之外，正伺机夺取英、法、美、荷等国在太平洋上的势力范围之时，英、法帝国主义集团则仍然企图变帝国主义国家间重分世界的战争为国际帝国主义联合反苏的战争，特别希望法西斯国家与苏联间的战争，以便达到其廉价的称霸世界的目的。因此，英、法一方面在西欧进行着“奇怪的战争”，一方面在苏联边境准备新的反苏基地，例如利用苏、芬边界事件，支持芬兰的反动统治集团，并图谋在苏、芬冲突基础上，形成与法西斯德国的反苏大合唱。又如在德国入侵西欧危机已经十分严重之时，法、德两国政府还秘密地信使往还，策谋于1940年六、七月间，自近东向苏维埃南方发动武装进攻。自然，如后来的事实所证明，英、法当权派的反动策谋实际为希特勒所利用，作为其向西欧发动进攻的掩护体了。

苏联和各国无产阶级——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组织和發展自己的力量，并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为争取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反法西斯战争而斗争。

在希特勒暂时占领下的各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不懈地领导着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城乡劳动人民进行着反占领斗争。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人则在动员一切力量击退法西斯进攻和反对本国政府的反动政策旗帜下进行着斗争。英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慕尼黑分子必须滚蛋”的口号，不断揭露张伯伦政府的帝国主义企图与保守党中的亲希特勒分子，并为加强反希特勒的军事力量而努力。它的党员不仅在前线奋勇战争，在后方也为加强防空设施，揭露奸商，保障工人工资而斗争着，特别是积极地为反对张伯伦政府派遣远征军支持芬兰的反动派而斗争着。在法国由于共产党之被迫转入地下，法共所处的环境十分险恶，即使如此，法国共产党仍然进行着保卫民族利益的斗争，反对当权的反动集团的卖国政策。当1940年五月，希特勒侵略军侵入法国时，法共是当时唯一号召进行全民抗战的党。尔后，当法国统治集团投降之后，法国

共产党首先揭起了抵抗旗帜，领导了内地军的抗敌斗争。

作为世界和平与反法西斯堡垒的苏联，由于英、法当权派的反动政策，而不得不以自己的全力用于加强苏联国防地位为击败法西斯主义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从1939年下半年到1940年六月，经过不断的努力，完成了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东方”战线的建立工作，从而进一步改善了苏联的战略地位和国际地位。

在大战初期，苏联与各国共产党的努力，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线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实力基础。而后由于西方帝国主义与法西斯国家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及其力量之削弱，使其不能不在生存与死亡之间寻找一条出路——即在与苏联联合或向希特勒德国投降之间选择一条出路。这就使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线在世界范围内的形成成为可能了。

希特勒匪帮利用了英、法统治集团的反苏政策，在1940年四月以后的短短两月之内，席卷了北欧与西欧大陆，在1941年春又进而控制了东南欧。作为世界大国之一的法蘭西已经溃降，英倫三島则时刻面临着希特勒德国登陆的威胁。英国当权派，虽于1940年六月和1941年五月，先后两次与希特勒的特别使节进行反苏勾结的秘密谈判，但是慑于人民的反对和对其未来的命运的考虑，不得不转而采取反法西斯的立场了。

美帝国主义原指望在英、法与德国的冲突中，寻求与希特勒妥协的途径，用牺牲其他国家利益的办法，来重分势力范围，并力图煽动希特勒德国去进攻苏联。但是在1940年春天威尔斯与希特勒的会谈中，希特勒所要求的乃是德国的世界霸权。因此，在后来，当法国失败与英国削弱之后，美国才与英国一致，支持英国的反德立场。及至苏德战争爆发之后，以苏、英、美、中为首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线便形成了。

四

1941年苏德战争的爆发，使反法西斯国家的联盟最终形成了。

苏联在战争的初期，由于对希特勒德国突然袭击估计不足，而处于暂时失利状态，但是在尔后的战争进程中，证明它是当时唯一有能力抵抗并击败希特勒的国家。所以当时西方国家不能不把击败希特勒德国和解除自己危机的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采取了与苏联合作的政策。因为苏联如果失败，那就意味着英国乃至美国严重危机的到来，所以在苏德战争爆发的当日晚間和第二天，英、法两国的领导者即发表了支持苏联抗德的演说。接着于六月二十四日，美国政府解除了由于苏芬战争而实行的对苏联资金的冻结。七月十二日，苏、英之间签订了共同对德作战的协定。这样，就初步形成了反法西斯国家的联合。

自然，美、英两国与苏联的联合是有它们的帝国主义打算的。在邱吉尔看来，希特勒德国之进攻苏联是不列颠帝国摆脱危机的生路，而战争的结果，必将使德国与苏联都遭到削弱。因此，虽然邱吉尔代表英国声明支持苏联，但是他并没有想用有效的办法援助苏联。美帝国主义者则认为，苏联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定将削弱美国的竞争者——德国。

尽管美、英帝国主义者作如此打算，美、英两国人民却在此时进行了支援苏联的斗争。在人民压力之下，美、英两国不得不对苏联进行若干援助，在1941年九月二十九日到十月一日举行的三强会议上，经过很大力气的争论，才达成了在九个月内供应苏联为数不多的物资援助的协议。

1941年冬季，德寇在莫斯科近郊溃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与苏联团结的新浪潮。这时，在希特勒占领下的欧洲各国人民的抵抗运动在法国、捷克、波兰、阿尔巴尼亚、希腊、挪威、南斯拉夫等国，在各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希特勒德国占领下各国的抵抗运动与苏联人民所进行的斗争，形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坚强基础，推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起来。

1941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一些新的国家卷入了反对法西斯集团的斗争。1942年一月一日，在华盛顿公布了二十六国宣

言。反法西斯斗争的世界联合形成了。

综上所述，由于参加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战线的国家具有不同性质，因而在反法西斯事业上表现为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以苏联与各国工人阶级为首的世界人民，始终积极地为争取早日击败法西斯势力而斗争。反之，美、英帝国主义集团则是为了利用苏联与世界人民的力量，以达其帝国主义的目的。因此，美、英帝国主义以及其追随者，一贯对反法西斯事业消极怠工，拖延第二战场的开辟，拒绝援助各国的反法西斯人民武装。所以在尔后的反法西斯战争进程中，在反法西斯阵营中，一直贯穿着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

补充
资料

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和条款

王 繩 祖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苏维埃政府公布了一道和平法令。它“向一切交战国人民及其政府提议，立刻开始进行正义民主的和平谈判”。这个和平必须是“不兼并（即是不侵占别国土地，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和不赔款的和平”^①。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不仅拒绝和平谈判，而且支持俄国反革命政党发动叛乱。德奥集团则企图在东线停战，以集中兵力于西线，十一月二十七日表示同意跟苏维埃政府谈和。苏维埃政府得到消息后，即刻向协约国政府提出照会，征询他们是否同意在十二月一日同苏维埃政府一起进行和平谈判，协约国没有答复。

1917年十二月三日，在被德军占领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城开始了停战谈判。苏方代表越飞在会上阐明布尔什维克的和平原则，并要求一切交战国停战。他提出三项条件：停战定期六个月，德国海陆军撤出里加湾、蒙桑德群岛，禁止德军由东线调往其他战场。德方代表霍夫曼认为苏方代表没有权替英法来谈停战条件。德国要保持原有阵地，反对撤出蒙桑德群岛，拒绝接受关于禁止德军调转的规定。由于双方意见分歧，会议决定休会一周。在休会期间，苏维埃政府再度要求协约国参加和平谈判，而协约国方面仍然置之不理。十二月十三日苏德双方代表复会，开始谈判单独停战条款。十二月十五日签订停战协定，规定：停战定期二十八天，如于七天前没有通知，停战期限将自动延长。关于德军调转问题，由于苏方代表的坚持，德国被迫答应立即停止在停战之前已经开始的军队调转，并禁止新的调转。至此，全面和平的建

尽管如此，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战线的形成却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由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战线的形成，使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德、日、意处于完全孤立地位，使其易于为苏联和世界人民所摧毁，在极大的程度上便利了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正是在法西斯国家崩溃的基础上，第二次大战之后，欧亚大陆出现了一系列的人民民主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亚非两洲出现了一系列的解除了殖民奴役的民族独立国家；而各国无产阶级与共产党，也在经过第二次大战之后，在各国的政治生活中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

议，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拒绝参加，已转为苏俄和德国同盟集团的单独停战，此后将由单独停战进入单独谈判的阶段。

十二月二十二日，苏俄和德国同盟集团的代表正式举行和平谈判。担任会议主席的是德国外交大臣辜尔曼。越飞根据和平法令的原则提出六项纲领，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是：“不准用任何暴力，吞并战时所侵占的领土，占领这些地区的军队，应在极短的期限内撤退。”^②会议经一度休会后，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会议上，辜尔曼提出德国同盟集团的复文：“同意立即签订全面的、无任何暴力吞并和赔款的和平条约”，但必须是一切与参战有关的国家毫无例外确实地遵守和平原则。德方的保留条件无异取消对和平原则的同意。因而谈判由于德国拒绝撤出被其占领的土地，坚持无理的领土要求，使和会陷入僵局。十二月二十八日大会决定休会十天，苏方代表团离开布列斯特。

苏维埃政府为了向交战国人民表示自己的和平政策，为了打破德军当局的新闻封锁，于1918年一月二日照会德、奥、保、土四国政府，把谈判地点移往斯德哥尔摩。它们复电拒绝了这个主张，并要求苏维埃政府代表团至迟于一月五日回到布列斯特，否则废除停战协定。一月五日它们又打电报说，协约国既然不来参加，德国同盟集团附有保留条件接受苏维埃和平

①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72页。

② 鲍得姆金等编：“世界外交史”第三分册，五十年代出版社版，第330页。

原則的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聲明就不能再約束它們今后的行動了。很显然它們意圖取消作為和談基礎的不兼并不賠款的原則。蘇維埃政府堅持易地談判，但是看到德、奧、土、保代表團都已到達布列斯特，所以它也派代表團前來，準備在會上力爭。

1918年一月九日和會重開，德國強盜仍然堅持其無理的領土要求。在這種情況下，領導蘇維埃代表團的托洛茨基及其走狗別有用心地主張停止戰爭，解散軍隊，不簽訂任何條約。“左派共產主義者”布哈林一派反對接受德國的苛刻條件，但是他們主張立刻進行革命戰爭。兩者都以為德國革命即將到來，德國無力進攻蘇維埃。在一月二十一日黨的會議上，列寧駁斥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謬論。按照他在前一天寫的提綱，“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所進行的和平談判，已完全闡明，在現時，即是到1918年一月七日時，德國政府（它是完全能夠操縱四盟國中其餘諸政府的）內無疑是主戰黨占了上風，該黨在實際上已向俄國提出了最後通牒（可以而且必須預料到，這在日內便會正式提出）。……現在俄國社會主義政府面前擺着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或是立刻接受這種割地的和平，或是立刻進行革命戰爭。這裡，任何中間的決定，實際上都是不可能的。再無法繼續推延下去了，因為我們為了故意延緩談判，已經施盡了一切可能的以至不可能的方法。……把我們對於主張立刻進行革命戰爭的各種論據之批判總括起來，就應得出結論說，這種政策也許可以適合那班專求外觀漂亮，色彩奪目的人底癖性，可是完全沒有顧及到已開始了的社會主義革命所處時期的階級力量及物質因素之客觀對比關係。毫無疑義，我們的軍隊在目前和在最近幾星期內（也許會在最近幾個月內）絕對無力來順利擊退德國的進攻。……我們締結單獨和約，便能在現時可能的最大限度內從彼此敵對的兩個帝國主義集團下擺脫出來，利用它們相互間的敵視和戰爭，——這種敵視和戰爭是阻礙它們勾結起來反對我們的，——而取得相當的行動自由時間來繼續并鞏固社會主義革命。”①指出了立刻進行革命戰爭必然招致大的災難；“不戰——不和”又將引起敵人前進，其結果是被迫訂立更屈辱的條約。為了不要把“在俄國開始了的社會主義革命底命運作孤注一擲”，列寧主張立刻同德國簽訂和約。托洛茨基違抗列寧的指示，拒絕同德國簽訂和約。他在二月十日的會議上宣布，蘇維埃現在正停止戰爭，但不簽訂和約。於是德軍便於二月十八日在全綫上發動進攻，十九日列寧通電接受布列斯特和約。二十一日列寧宣布“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號召全國工農用一切力量捍衛蘇維埃共和國。二十三日，紅軍在納

爾瓦和普斯可夫擊退了敵人。但這時德國的最後通牒中提出的條件比二月九日的更加苛刻了，而且時限只有一天。二十三日列寧在黨中央會議以及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駁倒托洛茨基份子和布哈林份子。二十四日早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接受了德國最後通牒。三月三日蘇俄代表與四盟國代表簽訂了和約。

布列斯特和約共十四款。（一）雙方宣布停戰。

（二）彼此停止惡意宣傳。（三）在附件地圖上雙方同意的分界綫以西的舊俄領土將不再隸屬於蘇俄主權。其未來地位由德奧與該地居民協同解決。（四）在締訂全面和約及蘇俄軍隊完全復員以後，德軍將撤出條約中所指明的界綫以東的領土。蘇俄不只應立即撤出阿那托利亞東部，將其交還土耳其，而且須把河達罕、喀斯和巴統割讓于它。（五）俄國軍隊應完全復員。俄國軍艦在全面和約簽訂之前，應駛回俄國海港，或立時解除武裝。（六）蘇俄將立即與烏克蘭中央議會簽訂和約并承認它與四盟國所訂條約。俄國軍隊必須立即撤出烏克蘭、愛沙尼亞、里伏尼亞、芬蘭及愛蘭德群島。愛蘭德群島的砲臺應予銷毀。（七）雙方尊重波斯及阿富汗兩國的主權獨立與土地完整。（八）雙方釋放戰俘。（九）雙方放棄賠償戰爭費用。（十）在和約批准以後，立即恢復邦交。（十一）雙方經濟關係由附件規定。（十二）官方及私人法律關係的恢復，戰俘及拘留公民的交換，赦免問題等，另由條約規定。（十三）關於條約文字的規定。（十四）條約在兩星期內批准，即于批准之日生效。②按照這個條約，德國占領凡達一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奪取俄國百分之三十四的人口，百分之三十二的耕地，百分之五十四的工業，百分之八十九的煤礦。真是一個極苛刻的條約。

1918年三月六——八日，列寧在俄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發言，肯定“戰略和政策是要求簽訂最恥辱的和約的”。“我正是要將空間讓給實際的戰勝者，以贏得時間。”“我們接受布列斯特條約，——較好的條約是得不到的，——以便準備革命的戰爭”。列寧的路綫是“退守，一有可能，便去進攻”③。三月十四日第四次全俄蘇維埃非常代表大會批准了和約。

事實證明，布列斯特和約的簽訂，使蘇維埃共和國獲得了暫息時機，來繼續并鞏固社會主義的革命。由此可見列寧領導的正確和列寧政策的偉大。

①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20——325頁。

② 惠勒——貝納特：“遺忘了的和約”，1939年英譯本，第403——408頁。

③ “列寧文集”第六冊，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2—49頁。

★ 讀 史 參 考

从讀史的方面談談“詩經”的时代和地域性

孙 作 云

一 当做史料來用的詩經

詩經是我国第一部詩歌选集，它的时代上起西周初年，即公元前1100年左右，下至春秋前期，即公元前600年左右。它所包括的时代，前后約計五百年。

在詩經以前，即夏商时代的詩歌，可以說早已完全失傳了。詩經里的“商頌”，前人誤以为商朝的詩，其实，那是春秋时代宋襄公时（公元前650—637在位）的祭祖歌。在周代以前的商代的詩歌都沒有保存下来，更不要說夏代的詩歌了。

在詩經以后，即春秋前期以后，到战国中期、屈原时代以前，其中約有三百年的光景。在这三百年間的詩歌，也差不多丧失殆尽了。因此說，詩經是我国先秦时代——夏商周三代，約兩千年間当中一小段時間內的詩。它可以說是：前无古人，后仅有来者。因此，無論从哪一方面說，都是值得我們特別重視的。它不但是学文学的人的詩歌宝庫，同时也是学历史的人的史料淵藪。

作为史料來用，詩經有为其他古書所不及的地方，就是材料的真实性。

詩經中沒有后人的偽作，梁啟超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一書中說：“現存先秦古籍，眞偽杂揉，几于无一書无問題；其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宝者，詩經其首也。”

其次，詩經中詩篇的字句，也比其他古書錯誤較少。詩的特点，在于組織严密，字有定数，章有定句，所以很不容易窜改；又因为有韵，便于記憶。因此，和詩經周頌同时代的“周書”，便詰屈聱牙，不能卒讀，而“周頌”却依然可以朗朗上口，悅人心目。詩經和尚書同时經過秦始皇的焚燒的，然而詩經就因为便于記憶，所以还能比較完整地保存下来。“汉書艺文志”說：“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独在竹帛故也。”就是这个道理。

西周的考古学資料，因为尚未作大規模的地下發掘，成績实在寥寥。截至現在为止，已經發掘的西周遺迹，主要的只有河南濬县辛村的墓葬，还有解放后發掘的西安普渡村和洛陽东郊的墓葬。在这些發掘中，还未得到什么結論。至于春秋时代的考古發掘，就連这点成績也未有。因此，在目下說來，西周及春秋时代的考古發掘，其貢獻于史学者还无法和詩經比較。

二 詩經各部分的寫作时代

研究詩經或引用詩經作史料，首先必須辨別詩經中各部分的写作年代：——年代不明，則一切研究皆无从談起。朦朧地、混作一团的乱引、乱比較，只能增加問題的混乱，而沒有其他好处。

但这話說來容易，作來很难。严格地辨別詩經各部分的年代，以目下的学术水平而言，还是可望而不可及。并且，有一些作品，根本无法确定其时代。不过，大体上，还是可以推断的。

今本詩經的順序，是以“國風”为首，“小雅”“大雅”次之，“周頌”、“魯頌”、“商頌”殿后。这种排列順序，在春秋末年，孔子以前就已經是这个样子了。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記載吳季札至魯訪問，“請觀周乐”，魯国宮廷里的乐工为他唱詩。乐工們所唱的詩，就是今日的詩經，其順序与今本詩經几乎全同。这一年孔子八歲，所以說，今本詩經的順序在孔子以前已經如此。

大体上看来，詩經的排列順序，除去“周頌”、“魯頌”、“商頌”三組祭祀歌为“物以类聚”，不按时代先后排列以外，其余各部分是按照时代的順序排列的。——不过，这个順序是一种由近及远的、向上倒算的逆排法。換句話說，國風的时代最近，其次为“小雅”，其次为“大雅”，再其次为周頌。我們根据作品本身的时间順序，把它顛倒过来，那就是最

早的是“周頌”，其次及“二雅”，再其次是“十五国风”。

“周頌”的时代 詩經中最早的詩是“周頌”，周頌凡三十一篇，其中全部为祭祀歌。周頌中最早的詩，是武王伐紂以后，得胜回朝，祭祀文王庙时所作的“大武舞歌”。“大武舞”原来有“六成”（六个节目），每一“成”配合一首歌。这六成是：

“武，始而北出（由鎬京向东北方殷京北伐），再成而灭商（杀殷紂王），三成而南（班师回朝），四成而南国边疆（言經營南国），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以現在河南陝县为界，东方新占领地区由周公总督之，西方老根据地由召公管理之），六成复綴以崇天子（言跳舞者再返回行列，表現拥护周天子）。 ”

在这个跳舞中，事实上是把周初开国大事重新表演一番。大武舞有六成，每成配合歌一首。但可惜的是：这六首歌，在今本詩經中只能找到三四首。根据左傳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所載楚庄王之語，知道：周頌中的“武”“賁”“桓”就是其中的三首。我疑心周頌中的“酌”，可能是这六首詩的第一篇^①。总而言之，大武舞歌是西周开国的詩篇，可以說是周朝的国歌。这几首歌是詩經中最早的歌，也是今天所能考出的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詩歌。

“周頌”中其余各篇，我想大部分是周成王时代的作品。中国古書上說：周公东征，徹底灭殷以后，曾經“制礼乐”，周頌中一大部分祭祀歌的制作大約就在此时^②。同时，也唯有在这种胜利的基础上，周朝統治者才能大兴祭祀，制礼作乐。

周頌中最晚的詩，是“执竞”。“执竞”这首詩是周昭王初年祭祀武王、成王、康王的歌。“执竞”篇說：

“执竞武王，无疆維烈。丕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听所）其明。”

这“成康”与“武王”并列，当然是成王、康王。“毛傳”說“成康”为“成大功而安之”，可謂大誤。以周天子而能祭祀成王康王，当然最早的是昭王^③。因此，我們說周頌中最晚的詩是周昭王时代的詩。

以“执竞”为基点，分析它的形式特征，然后再比勘其他詩篇，可以肯定周頌里的“載芟”“良耜”也是周昭王时代的詩。

总之，周頌是西周初年七八十年間的詩，其時間約自公元前1100左右至950年左右。

“二雅”的时代 据傳統的及一般的說法，說“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詩，“小雅”是西周末年之詩。他們之所以說“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詩者，是因为大雅

中有祭祀周人先公先王的詩。——如“生民”祭祀周人始祖后稷、“公刘”祭祀迁豳始祖公刘、“緜”祭祀迁岐始祖公亶父（大王）、“皇矣”祭祀奠定灭商基础的文王、“大明”祭祀灭商的“武王”，还有“下武”我以为祭祀成王。除去这些有名的、功業煊赫的先公先王以外，又祭祀三位女祖：一是大王妻、文王祖母太姜，二是王季妻、文王母大任，三是文王妻大妣。主張大雅为西周初年詩的人看見了这些先公、先王、先妣的名字，便为这些大名所炫惑，以为这些詩是西周初年所作的詩，甚至于說是西周以前的作品。其实，这是一种皮相的看法。从常識来判断，我們不能根据詩歌中所贊美的人物，便說这首詩的写作时代就是它所贊美的人物的同一时代，或距离不远的时代；因为后人也照样地可以贊美古人，远世的子孙也照样地可以贊美往古的祖先。譬如魯頌是春秋时代魯僖公时的作品（魯僖公在位在公元前659—627），在“閟宮”一篇中，就贊美姜嫄、后稷、大王、文王、武王、与上引大雅諸篇所贊美的对象完全相同，但它的时代却明明是“周公之孙、庄公之子”的魯僖公时代的作品，而不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再如“商頌”，里面贊美簡狄、契、相土、成湯、武丁，但我們知道它确乎是宋襄公时代的作品。为什么对于大雅中这些歌頌祖先功德的詩，便說它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呢？

还有，从形式上看，大雅中这些祭祀祖先的歌，与周宣王时代的詩，在遣詞造句、布局用韻上完全一致，而与西周初年的周頌完全不同。假若它真是西周初年的作品，而按其內容，又与周頌一样，同为祭祖歌，它就應該和周頌完全一样，至少是近似；但它們为什么这样的不同呢？它和周頌在形式上是这样的不同，而和周宣王时代的詩又是这样的相同，必須說，它是西周末年的作品，或許就是周宣王时代的作品。

① 王国維“大武乐章考”以“周頌、昊天有成命”为大武舞詩第一篇，誤。这首詩是成王祭天的乐歌，与大武無关。又以“般”为“大武”第六章，亦誤，这一首是周天子巡狩祭方嶽的歌。王說見“周大武乐章考”，載在“观堂集林”卷二，今輯入“海宁王靜安先生遺書”第二册，1940商务印書館出版。

② “尚書大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还政”。又“史記周本紀”說成王“既黜殷命，襲淮夷”之后，“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頌声兴”。可見周頌中許多篇章成于成王时代。

③ 魏源“詩古微”卷六，“周頌篇次發微上”也以“此篇作于成康之后，当昭王即位初年”。“皇清經解續編”本。

而不是西周初年的作品①。

我認為：“大小雅”統統是西周末年的詩。“大小雅”中一百零五篇，其中有一半的詩是周宣王時代（公元前827—782）的作品。大概“大小雅”詩的排列法，或編制法，是以周宣王為中心，而上及厲王（公元前857—841），下及幽王的（公元前781——771）。它與西周初年七八十年間的“周頌”，正是遙遙相對。其詳細的論證俱見拙著：“說大小雅同為西周末年詩”，茲不贅。

至于当初編詩的人，為什麼又把这些同為西周末年的詩又分為“大雅”與“小雅”呢？我以為這是根據內容來分別的。他們把這些追述西周初年祖先功德的詩，也就是誇張西周初年開國盛世的詩，叫做“大雅”；把那表現西周衰世，特別是幽王之世的詩歌，叫做“小雅”。“雅”的本字原來是“夏”，這些詩大概當初也叫做“夏詩”，——“墨子天志下”篇引今本詩經“大雅皇矣”篇不曰“大雅”而曰“大夏”，可謂鐵證。至于周詩為什麼稱“夏”，我想這是因為西周王畿在夏人故地（周初人常常自稱為“夏人”，即夏故地之人），而大雅小雅都是西周詩篇②，所以把這些詩叫做夏詩，——猶十五國風用地名來區別一樣。周詩原稱夏詩，而夏字古與“雅”字同音，古同音字可以互用；又古人也許有意地把它與夏代的“夏”區別，所以才固定地寫作“雅”③。“雅”即是夏，而夏又指周，所以他們把講西周盛世的詩叫做“大雅”（=大夏、大周），把講西周衰世的詩叫做“小雅”（=小夏、小周）。這是就詩的內容而言，而不是就詩的寫作時代而言的。又“大雅”中有許多詩是宣王時代的詩，但宣王是所謂“中興時代”，有一定程度的文治武功，“史記周本紀”說：

“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

因此，編詩的人把那些誇張周宣王武功的詩，也編在“大雅”里。從這裡更足以看出大小雅的區別在內容，而不在時代。說到這裡，我們不能不舉出最早的“文學批評家”吳季札論“大小雅”的話了。他批評“大雅”說：

“廣哉！熙熙乎（和樂貌），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又批評“小雅”說：

“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風）焉！”

可見“大雅”之為大，因其詠文王，“小雅”之為小，因其詠衰周。這是有關“大小雅”的區別的最好的解釋。

至于“二雅”詩中有些錯亂，那是當然的事，孔子不云乎：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衛靈公篇）

他說三百篇經過他整理之後，雅頌才各得其所，可見在他整理之前，雅頌是不得其所的④。其實，即使是經過他一番整理，但不得其所的詩還是很多；不但雅頌是如此，國風也是如此。

總之，“大小雅”同屬西周末年詩。

國風的時代 國風一百六十篇，其中絕大部分是春秋初年的詩，有一小部分是西周末年的詩，一小部分是春秋中晚期的詩。大致說起來，國風是公元前770—600，一百七十多年間的詩。

今本國風的順序是：

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桧、陳、曹、豳。但“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所記）吳季札至魯觀“周樂”，所“觀”的國風順序，是：

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鄘、曹。

鄭玄詩譜的順序是“王風”下為“桧、鄭”，其餘與今本同⑤。這種排列的順序，固然有種種的說法，但大致上是按照時間順序排列的，——特別是按照春秋時代列國興起的順序排列的。這種排列法頗有歷史眼光，給我們研究歷史的人以不少的方便。

但例外的是“豳風”。左傳的順序是“豳”“秦”並列，或許因為地域相同，所以才排列在一起；但今本詩經與鄭玄“詩譜”，又以“豳風”殿後，或許因為豳風本為西周故土民歌，所以才把它放在國風之後，西周詩“二雅”之前。

（周南、召南）先談“周南”“召南”。從前說二南是文王時代的詩，——這是因為文王有經營南國之事，所以便以為“二南”是文王時代的詩。但“經營

① 又從詩經的編制上也可以推知“大雅”非西周初年詩，因為假若它是西周初年詩，而其內容與“周頌”同為祭祀歌，就應該把它放在“周頌”里。今編者分置二處，可見非同時代之作。

② “小雅”中“十月之交”有“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之語，知確為東遷後詩。又“周無正”（“周”字今本誤作“雨”）言東遷後王官厲散情形，亦為東遷後作。但二詩皆東遷不久之作，內容講西周亡國，故編詩者放入西周詩的小雅內。可見編詩的人時代觀念很清楚。

③ 見拙著“說雅”，載1957年1月号“文史哲”。

④ 樂與詩是不能分開的，“正樂”亦即正詩。

⑤ 參看馬融“釋史”輯本。

南国”是一回事，“南国”之诗”又是一回事；我们不能把这二者混淆为一。又从诗的内容上看，它与文王也毫不相干；因此，此说之不能成立，可以不必赘论。从形式上看，二南的遣词造句，与其他国风同，也不象是西周初年的诗。又“周南”有“何彼穠矣”，赞美王姬下嫁，而这位王姬是“平王之孙”（孙女），对象是“齐侯之子”，这平王显明的是“周平王”；前人解释“平王”为“平正之王”，大误。又“召南”有“甘棠”，鲁诗韩诗都说是东周遗民思召伯（案为召虎）之诗。总之，二南绝非周初之诗，是可以肯定的。但它虽不是西周初年之诗，但有一部分是西周末年之诗。

近人又说“二南”是国风中最晚的诗，有的先生说，二南是楚风^①。考楚国在西周及春秋时代不服从周天子的号令，与周系敌对国家^②，至少也是叛服无常；在这种情形下，楚国的诗无法被采入周天子的朝廷内。我们知道列国之风之采入朝廷，不但是一种文化活动，而且表现一种政治上的隶属关系。王官采诗，只有在王威可及之地；列国献诗，也必须先有主从关系。楚与周无这种关系，楚诗自然不能选入周天子的“乐府”里去。郑玄乐谱说的好：

“陈诸国之诗者，将以知其缺失，省方设教为黜陟。时徐及吴、楚，僭号称王，不承天子之风，今棄其诗，夷狄之也。”^③

这话是不错的。总之，以“二南”为“楚风”，其说不可信。

我想二南之中有一部分是西周末年的诗，其余为春秋初年的诗。但即使是春秋时代的南诗，其时代最晚也不能超过周釐王之世（公元前681—677在位），也就是楚文王之世（公元前689—677）。因为在楚武王、楚文王之世，经常地伐随、伐中、伐蔡、伐邓，几乎把周人在汉北、汉东所建立的姬姓姜姓小国全部灭掉了。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定公四年（公元前506）也说：“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我想二南里的诗一定在这些诸姬灭亡以前，才选进朝廷里的；否则，这些国家灭亡了，这些南风也无由采入。从这里可以判断二南之诗的时代下限。

〔邶鄘卫〕“邶”“鄘”“卫”三风皆卫诗，这由于三风之中所言之事皆卫事，所言地名皆卫地名可知^④；所以“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季札闻歌“邶、鄘、卫”，而总评之曰：

“美哉！邶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汉書地理志”也说：

“……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

在这里，我們應該知道“衛風”中的詩，皆公元前660年衛國被狄人滅亡以前的詩；只有一首“定之方中”是亡國以後的詩，但它是贊美衛文公遷都于楚丘（今河南滑縣東）的事，在這以後的詩，便沒有了。

崔适“讀風偶識”卷二曰：

“邶風十五篇，而‘感彼泉水，亦流于淇’，在第十四篇中。衛風僅十篇，而言‘淇’者四，至第九篇猶云：‘在彼淇梁’，其為渡河以前之詩明甚。考衛渡河之日，在魯閔二年（案即公元前660），上距春秋之初僅六十年，然則其詩在春秋以前者多矣！”

魏源“詩古微”卷三也說：

“吾讀‘衛風’終于‘木瓜’，大都皆文公以前，齊桓所陳于王朝^⑤；而知衛風皆采于朝歌旧都，非渡河以後之風，故加邶鄘衛之名，以別于楚丘之衛也。……地理志曰：‘衛至十六世懿公，為狄所滅，齊桓公更封衛于楚邱，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之風既歿，而紂之化猶存。是朝歌衛水已皆非所有，而其詩則皆采自旧都；其‘定之方中’、‘木瓜’二篇，正著故衛甫亡之

① 陆侃如先生“中国诗史”章五、“二南”有此说。

② 武王死后，楚与殷东诸国响应武庚，反抗周国。“逸周书作雒篇”谓“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涂、奄、及熊盈以畔。”说者谓“熊盈”即“史記楚世家”之熊绎。又西周初平成王时铜器“令殷”，有“伐楚伯，在炎（郟）”之语，知周初楚确与周为敌。其后周昭王伐楚，死于汉水，见左传僖公四年。周宣王虽一度中兴，但对楚系防御性质，观其徙封申伯于谢，加封召虎“江汉之浒”可知，见“大雅·嵩高”、“江汉”。春秋初年，周平王末年，楚武王北侵，子文王继之，不久在成王时，即达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的程度。可见西周及春秋时代楚人反周，偶有顺附，亦为时甚暂。

③ 见马建《释史》辑本。又若为楚诗，孔子亦不能如此推崇。

④ 如“邶风、泉水”所言“泉水”即卫地百泉，“邶风桑中”所言之“洙乡”，即牧野，“淇水”即卫都朝歌北之淇水（今淇县），皆卫地。所言卫事，如“邶风新台”刺卫宣公筑台纳媳事，“邶风、泉水”与“邶风、戴月”为卫女许穆公夫人归唁卫侯亡国之事，“邶风定之方中”赞美卫文公复国于楚邱事……可见邶鄘卫三风皆卫风。

⑤ 此说不可信。古人论事，往往于极正确的论断中，夹杂一些极容易辨别的错误的说法，当分别观之。

事，則亦邶鄘遺民从徙渡河者所作，正当新旧絕續之交，未足为新衛之風。……”

这一点可謂定論。

〔王風〕全部王風為東遷以後之詩，把王風降為列國風詩之一，也可以看出東周天子的政治地位。

〔檜風〕鄭玄詩譜置“檜風”于“王風”之後、鄭風之前，蓋因檜國為鄭國所滅，猶魏為唐（晉）所滅，故“魏”“唐”相連，“檜”“鄭”亦相連。案檜國為夏人之後，其地在今河南密縣東北，西周末年為鄭桓公所滅^①，春秋時為鄭地。因此猜想：檜風四篇也是鄭詩。朱熹“詩集傳”引蘇氏云：檜風皆鄭詩。又考：檜風最末一篇為“匪風”，為西方武士在東方久役不歸思鄉之作，這個武士必是西人，然後才能談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是檜國之詩，則軍人為自國之人，就談不到西歸的問題。又此詩言“周道”即周人專用的軍用公路^②，亦可知必為鄭桓公已滅檜國以後之作。如此說來，全部“檜風”四篇當為西周末年鄭桓公滅檜以後之詩。

〔鄭風〕全部“鄭風”皆為春秋時代作品。“鄭風”中有“清人”，“左傳”閔公二年（公元前660）說：“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案此事在鄭文公十三年。全部鄭詩大約皆鄭文公以前作品。（鄭文公在位四十五年，自公元前672—628）

〔齊風〕“齊風”十一篇，其中有三篇是諷刺齊襄公和他的妹妹文姜私通的事（“南山”、“敝笱”、“載驅”）；一篇是諷刺魯庄公與齊襄公會獵的事（“猗嗟”）；前者在魯桓公三年，公元前709年，後者在魯庄公四年，公元前690年。大部分齊詩，皆齊桓公以前的詩。

〔魏風〕“魏風”是魏國的詩。魏國在公元前661年為晉獻公所滅，全部魏詩應該是亡國以前的作品。

〔唐風〕唐風即晉風，內有“揚之水”一篇，諷刺晉昭公封他的叔父成師于曲沃，曲沃大于翼（晉都邑），以演成尾大不掉之勢，事在公元前745年。

〔秦風〕全部秦風皆春秋時代之詩。秦國在周平王東遷以後，才被封為諸侯，與東方諸侯“通使聘享之禮”^③。又“秦風”有“黃鳥”一篇，是秦人哀悼為秦穆公殉葬的“三良”，考此年為公元前621年。大概全部秦詩皆秦穆公以前的詩。

〔陳風〕陳風有“株林”，諷刺陳靈公“公元前613—599）通淫于夏姬之事。陳靈公在公元前599年為夏姬之子夏徵舒所殺，大部“陳風”皆此以前之詩。

〔曹風〕曹風僅四首，其最末一篇“下泉”，為曹

人贊美晉大夫知彘納周敬王于王城的事，事在公元前516年。這一首詩是現在所能見到的國風中最晚的一首詩，這一年孔子三十六歲^④。

〔邶風〕在國風中問題最多的是“邶風”。傳統的說法，說“邶風”是西周初年的詩，“七月”一篇是“周公陳王業也”，“東山”、“破斧”皆言周公東征的事。

“陳王業”的說法固然不可信，但“破斧”篇明言“周公東征”，則其為指周公東征之事確無疑問。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聞樂工唱“邶風”，說：“其周公之東乎？”就是指這一首詩而言。近人則說“邶風”是“魯風”，因為魯為大國，不應無“風”，又魯為周公之後，所以說“邶風”為魯風^⑤。案魯國為什麼無風，其故不可知。我們不能因魯國無風，便張冠李戴之，其理由甚不充足。

我以為“邶風”為西周詩，其中確實有好幾首是說周公東征之事。但寫定的時代不能很早，因為它與國風中其餘各風，形式上甚相近。因此推想它是西周末年詩。或古有此歌，而在西周末年寫定。“文學形式”雖然不是判斷時代最可靠的尺度，但仍然不失為一個尺度。

明了了“國風”中的各時代，則它排列的順序及其大致的時代也就可以推知。國風中以邶風為最早，故列于“二雅”之前。邶風是西周的風詩。其次是二南、邶鄘衛。再其次是王、鄭、齊、魏唐、秦。鄭、齊、晉、秦的順序，正是春秋時代霸者出現的順序。關於這一點，崔適在“詩風偶識”卷四里已約略地談到。他說：

“又按春秋傳，季札觀周樂，以齊、邶、秦、魏唐、陳為次，而今列秦于唐風後者，意編詩者之所更定。蓋自周衰鄭弱，齊晉迭興，晉霸既衰，而秦遂有雄天下之勢。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卷一“十五國風次序論”曰：

“……于檜鄭、齊、魏唐、秦，可以觀春秋之國

① 見魏源“詩古微”卷九“鄭檜答問”。

② 見拙著“小雅大東篇釋義”，“文史哲”1956年11月号。

③ 見“史記秦本紀”。

④ 王夫之“詩經稗疏”說“秦風·無衣”，為公元前506年吳伐楚時事。吳兵入郢，楚昭王奔隨，申包胥到秦國求救，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事見左傳定公四年。但據“漢書地理志”所言，知王說不可信。

⑤ 見徐中舒先生“邶風說”，載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四分，1936年版。

勢焉。春秋之初，鄭最稱強，‘桡’則滅于鄭者也；故桡鄭為先。鄭衰，而齊桓削霸，故齊次之；齊衰，而晉文繼霸，魏則滅于晉者也，故魏唐次之。晉霸之后，秦穆繼霸，故秦又次之。若夫陳、曹、豳，則又詩之廢興所關焉：陳滅于淫，曹滅于奢，而豳則起于勤儉者也。……大抵十五國之風，其先後皆以國論，不得以一詩之先後為定也。”（案論“豳”殿后理由，不甚了了，姑列于此。）

這一個概括的看法，大致可以肯定的。

“魯頌”、“商頌”之時代 “魯頌”、“商頌”為魯僖公時代之詩，其說論定于魏源，而梁啟超最後肯定之。魏源“詩古微”，說二頌是魯僖公四年（公元前656）魯僖公、宋桓公（宋襄公父）跟從齊桓公攻打楚國，在召陵陳師之后，回到魯國和宋國所作的詩。這時楚國正強，齊桓公率八國之師稍挫其鋒，中原諸侯認為這一舉是“中夏攘楚第一舉”，所以才作了這種告祭祖宗、誇張武功的詩。他在卷六“魯頌韓詩發微”說：

“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宋公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召陵（案今河南偃城）。此中夏攘楚第一舉，故魯僖、宋襄，歸修厥績，各作頌詩，薦之宗廟。”

又在“商頌魯韓發微”說：

“……‘殷武’詩三章，箋云：‘時楚不修諸侯之職’，四章、箋云：‘時楚僭號王位’，此亦邦君闡用韓詩，以三章、四章為春秋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伐楚之事，故箋以‘歲時來辟’，責包茅不貢之文；‘不僭不濫’，責僭號稱王之義；與‘魯頌’‘荊舒是愆’，皆修召陵攘楚之伐，同時、同事、同詞，故宋襄作頌，以美其父。”

這一說可謂定論。梁啟超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里猶以商頌為“商代郊祀樂章，春秋時宋國沿用之，故得傳于后”；但在“古書真偽及其年代”里就完全採用魏源的說法。他說：

“詩經起自何時，迄于何時，自來即多異說。他那最後五篇——‘商頌’，據現行的‘詩序’說，就是商人祭祖之詩。這話若確，那麼，‘詩經’的年代很早，商朝已經有了。……但在西漢以前，並沒有人說‘商頌’是商詩的，都說是宋人作品。‘國語’有这么一句話，‘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正考父是宋國的大夫，是孔子的祖孔父嘉的父。周太師是周室的樂官。‘國語’的意思（是說）‘商頌’

是正考父作的，請周太師校正其樂律。後來毛氏‘詩序’說：‘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意又却和‘國語’說的大不同了。‘校’是請別人校自己的，‘得’是在別人處得到別人的，哪里可以隨便更改！但很不幸，此後都相信‘詩序’的話了。一直到宋朝以後，才有人開始懷疑，從事辨別；辨別最清楚的，沒有人比得上魏源。魏源著‘詩古微’，列舉十三條証據于‘商頌發微’篇中，斷定商頌是宋襄公時正考父祭商先祖而稱頌君德的。他那些証據也許不免瑣屑，但大都很對，足以成為定論。”①

三 詩經中所反映的地域性

研究詩經或引用詩經作史料，尤必須注意詩經的地域——特別是十五國風的所在地，以及這許多國風所反映的地域性。

我不想一一敘述這十五國風的地域，因為有許多地域，是大家所周知的。我只談談周南、召南、豳風的地域，然後再談談在國風中所顯示的地域性。

我以為“周南”即自陝縣（河南省西邊陝縣）以東，周公所管理的南國之地；召南，即自陝縣以西，召公所管理的南國之地。我十分相信武王滅商以後，周公召公分陝而治的說法，因為這合乎當時的政治情況。周人的根據地在今陝西，其向東的自然界限是陝縣一帶的山地，——也就是後來秦國的東方大門函谷關一帶。滅商以後，新得到大片領土，人心未服，故必須分區統治。因此，把陝以西周國的老根據地交給召公管理，把陝以東新占地區交給周公管理，這在當時是十分睿智的辦法。因此，就當時的政治情況而論，我相信此說。

其次，“禮記·樂記”所記載的周初開國樂章大武舞，其第五曲曰：“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大武舞六曲，有六歌配置，而其歌又多見于詩經。大武舞、大武詩既不能假造，則其中所反映的分陝而治的歷史事實亦絕不能假造。有這兩點主要根據，因此，我相信周公召公分陝而治之說；因而也贊相信，所謂“周南”即陝以東，周公所統治之南國；“召南”即陝以西，召公所統治之南國。

周南的範圍北自成周（洛邑），南至江漢之間。“周南”第一篇“關雎”曰：“在河之洲”，這足以說明周南的北限在黃河。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太史公留滯周南”，摯虞曰：“今之洛陽”，張晏曰：“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也足証周南的北限在黃河。其

① 見“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第109—110頁。

南限則在江漢之間，周南有“汝墳”，言汝水，有“漢廣”，稱江漢。又漢水二女故事盛傳于江北襄陽一帶，因此“漢廣”的地望，也必在襄陽一帶。“水經注江水篇”引“韓詩、周南序”曰：

“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述取舍于甘棠，陝間之人皆知其所。”

這南郡與南陽之間，應該是南國的南限；申、鄧、蔡、隨等南國，皆在此地。所謂周南之詩，大概就是這些小國的詩。後來這些小國被楚人蠶食，所以把它們的詩，統名之曰“周南”。

召南的北限，似指終南山，“草蟲”篇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蓂”，“殷其雷”曰：“在南山之陽”，這“南山”即“終南山”，也就是“秦風”所說的：“終南何有？有條有梅”的“終南”。可見召南的北限在終南。召南的南限，似達到蜀地的長江，由召南“江有汜”一詩可証。

以上是周南、召南的地望。

“邠風”的地望，我以為指渭水以北的周地，倒不一定准限于公劉所遷之邠地（即今陝西省邠縣）。從種種形迹上看，“邠風”和“二南”可能如舊說所云是西周時代的詩。編詩的人，把西周京師以北的歌詩叫做“邠風”，把京師以南的歌詩叫做“召南”，把成周以南的歌詩叫做“周南”。這些詩歌大部分是西周時代的地方歌詩，與“大小雅”之為京師文學作品，遙遙相對。

詩經中所包括的地區為黃河流域，以及漢水流域。若以現在的省份來說，則西起陝西、東至山東、南至湖北、北至河北（“大雅韓奕”言周宣王改封韓侯于北燕，其地在今北京南固安縣，此燕師指北燕），而以河南為天下的中心：國風中的周南、邠風、鄘風、衛風、王風、檜風（密縣）、鄭風（新鄭）、陳風（淮陽），八風之詩皆在其地。這以上地區就是當時所說的天下。

在這裡應該注意的是陝北、晉北是游牧部落戎狄薦居的地區，大小雅中有許多伐獵的詩，就是和他們戰鬥的記載。又在東南方的淮水流域（今河南東南部，安徽全省，江蘇北部）也不包括在詩經地域的範圍以內，因為在這一地區所居住的淮夷，也是周人的死對頭，周人經常侵略他們，其事見于大雅江漢，常武以及魯頌、商頌等詩。這兩個大地區應該在詩經地域之外，也就是在周人政治勢力之外。

在西周時代，朝廷所在地的丰鎬一帶是全天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所以在大小雅中有那許多“雅士”作出那么多的藝術成就極高的“雅詩”。但在

春秋時代，同樣占有陝西省的秦國（在陝西西部），因為它與戎狄作戰，就充滿了殺伐之音。“漢書地理志”說：

“……故秦地，于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案為秦風小戎之詩），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案為“無衣”之詩）及“車鄰”“四載”（今詩作“駟驥”），“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這就是“秦風”的特點。

今河南北部殷周王畿的衛國地方，以及河南中部的鄭國地方，有一個特點就是風詩多，而且“淫詩”尤多。邶鄘衛三風共三十九篇，幾占今本國風四分之一（國風共一百六十篇）。而且在國風中最好的詩，如“谷風”、“氓”皆是這一個地區的民歌，其他國風除去邠風之外，皆相形見绌。我以為這是因為這地方的文化特高，是承繼商代文化的余蔭，所以才有這種現象。鄭風二十一篇，其篇幅雖短，但在國風中數目也甚多，這是應該注意的。

鄭衛之詩有一個特點，就是淫詩多，這是孔子所最痛心疾首的地方，他說：“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論語衛靈公篇）“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論語陽貨篇）

“禮記樂記”也說，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怠慢、淫放）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為什麼鄭衛之音有這種現象呢？難道說：只有鄭衛之人才喜歡戀愛，而他國人都喜歡戀愛麼？顯然不是的。關於這一點，魏源有一個好解釋。他在“詩古微”卷九“檜鄭答問”中說：

問：“鄭衛皆以弱小介強大之間，一迫于狄，一迫于伯，民歲受兵而風俗淫佚，甲諸國者何？”曰：“三河為天下之都會，衛都河內，鄭都河南，故齊晉圖伯爭曹衛，晉楚圖伯爭宋鄭，戰國縱橫爭韓魏。……據天下之中，河山之會，商旅之所定集也。

商旅集則貨財盛，貨財盛則声色誘。“史記貨殖傳”：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邱紂淫乱余民，民俗僣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愴

（下轉第6頁）

教 学 问 题

談談历史課联系現實的目的和原則

天津市一中政史教研組

我們閱讀了“历史教学”一月号刊载的三篇关于在历史課中如何联系現實的文章以后曾展开討論，在討論过程中受到很多啓示。但在某些地方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为了互相交換意見，願从对現實的理解、联系現實的目的、联系現實的原則三个方面來談一談。

甚麼是“現實”？在一月号的三篇文章里有着不同的看法。廣雅中學的同志認為“所謂現實，其內容是十分廣泛的，主要應着重下列的几个方面：（1）联系党的方針政策。（2）联系國內外形勢。（3）联系乡土教材。（4）联系学生思想实际。

謝承仁同志对廣雅中學同志們提出的上述見解，在原則上是同意的，但具体說來又有些出入。例如在談到联系学生思想实际时謝先生談：“他們所說的‘思想实际’指的是一般的思想問題，如象对‘三好’認識不足啦，學習的动力不大啦，搞小圈子啦……等等。我所說的‘思想实际’指的是在學習历史這門科學時所产生的一些想法。”

上海第一女中历史教研組的同志們則又認為联系現實和联系思想实际是兩回事。他們說“联系現實是指联系‘現時生活’，为的是使学生更深刻地認識过去的历史現象，更深刻地認識社会發展的必然趨勢。联系思想实际是指向学生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品質的教育，历史課應該負起这个教育任务，這應該通过發揮課文的內在思想性来解决的，不是联系現實的問題。”

我們的看法是：“現實”是对“历史”說的。凡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过程，不屬於“現實”便屬於“历史”，同时二者密切地关联着。从一方面看“現實”是从过去發展而來，从另一方面看則今日的現實又將是明天的历史。人类历史既然是一部階級斗争史，那么現實也就是指当前國內外階級斗争的各个方面的：政治，經濟，思想意識等。講授历史，联系現實，也就是說把历史教学跟目前劳动人民反剝削反奴

役的斗争結合起來。

廣雅中學同志們所提出的四个方面，我們基本上是同意的。但除這四方面以外究竟還包含哪些內容呢？這四方面彼此間有無重合的地方呢？這四方面又怎樣統一起來呢？“現實”一語的精神實質到底是怎樣的呢？讓人看了以后很難把握。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對這些內容或範圍加以提高和概括，指出“現實”的含義就是指的前國內外階級斗争的各个方面的。

謝承仁同志對於联系学生思想实际的看法，我們感到在理解上有些困難。例如在北伐过程中共产党的領導作用問題，西安事变時为什么党主張釋放蔣介石的問題乃是各該課時的中心內容中心思想的組成部分，就課的本身要求來說也是非交待清楚不可的，否則便根本無法講明白。因此似不應視為現實。比如說當我們講到中国历史的南宋的抗金斗争，岳飞率領軍隊打到偃城准备北上收復中原，而宋高宗和秦檜却把岳飞調了回來時，学生也很自然地会产生这样一种想法：他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試想，我們能把解决这种思想实际看成“联系現實”嗎？如果这样类推下去，对現實的理解就容易陷于混亂状态。

上海第一女中同志們認為联系思想实际是指向学生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品質的教育而不是联系現實的問題。我們認為这样划分是不妥當的。如果可以說“現實”是指当前國內外階級斗争的各个方面的，人們的思想意識自然也應包括在內。从另一方面談，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品質教育乃是教學目的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联系現實乃是完成历史教学总的任务的一种手段，也是对学生更深刻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一种手段，因此在我們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品質教育時同样可以采用。

現在我們來談一下在历史課中究竟为什么要联系現實，联系現實的目的是甚麼。

关于這一問題廣雅中學同志們沒有明确地正面地

提出。若是从他們所提出的具体做法来看，則使人体体会到他們突出強調的是“宣傳党的方針政策”，強調“使學生們認識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在这个时代中應該担負起什么責任”以及“培养學生对時事的兴趣”等。

謝承仁同志在談到联系現實的目的時写道：“我認為比較完善的說法應該包括兩方面：对教師來說联系現實是为了更好地闡述課本的内容，补充或修正某些观点和說法；对学生來說是为了更好地啓發他們的思維，發揮他們學習的能动性，以便牢固地掌握知識。”

上述这些看法，对我们有一定的啓示。但終于感到广雅中学的同志們有着片面強調向学生宣傳時事的傾向；謝承仁同志从教師与学生两个方面把問題提出而沒能統一起来。經過討論后我們認為联系現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历史教學总的目的任务。

能不能把联系現實的目的确定为兩項呢？即第一个目的是为完成历史課总的目的任务，第二个目的是为了幫助学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認識現實呢？我們說不能。其所以不能是因为历史教學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具体史实对学生進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使學生成为社会主义自覺的建設者和保衛者。就是要使學生不仅以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观点方法認識过去，同时也要使學生以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观点、方法認識現實。如果把历史教學目的任务看成仅仅是如何以馬克思主义方法認識过去的話，那么实际上必然会产生脫离现实社会生活的历史教學。

明确联系現實的目的，我們認為極為重要。如果認為目的有兩個，認為除去完成历史教學总的目的任务外，还有另外一个使學生以馬克思主义立場、观点、方法認識現實的目的，那么，这种割裂提法的后果，在實踐時就可能产生离題太远和生硬联系当前政治任务的現象。这种事例，只要稍加注意，在我们教學改进过程中是不难找到的。

最后，讓我們談談历史課联系現實時應該注意的要点，或者說應該把握的基本原则問題。

广雅中学的同志們在联系現實的体会一段中，有这样一些看法：“我們思想上已經重視历史联系現實，便要从深入鑽研教材出發。因为联系現實并不能离开教材孤立地进行，而是要在深入鑽研教材的基础上考虑：这堂課有什么要联系的嗎？有，便联系。沒有，也不可勉强。如果一定机械地每堂課都进行联系，那就太形式主义了。已經認為有可以联系的了，又要考虑，这些东西有用嗎？有用，便联系；沒有

用，便要割爱。这些东西联系在教學里面有作用，是不是就可以联系呢？不是的，还要看这些东西學生能否理解。”

总之，广雅中学同志們是注意下列几点的：（1）要与教材有联系；（2）被联系的东西要有用；（3）是學生所能理解的。

是否所有各个时代的历史都可以联系現實呢？广雅同志們这样写道：“我們在历史課中进行联系時事的經驗中証明，不論現代史也好，古代史也好，只要我們敢于打破‘清規戒律’都是一样可以进行的。”

謝承仁同志談到联系現實應該把握一些什么要点時說道：“我認為比較完全的提法應該是：一方面既要注意結合學生的实际知識水平，學習時的思想狀況和有关學習、生活实际等各种条件，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切合課本的内容，照顧教材的難易，特点和分量的輕重。”

我們結合自己教學實踐中的一些經驗教訓，討論了这些問題的提法，大家感到不太中肯，沒有能鮮明地从如何完成历史課的目的任务和历史課特点提出問題。我們認為應該着重地指出下面三点：

（一）历史課联系現實應該把握的原则首先是要从更好地揭示課的中心思想，更好地完成課時目的出發。既不能損害教材的科学性系統性，也不是把一堂課的个别部分与现实相联系。

我們認為广雅的同志們在講“明朝的科学家李时珍”时所联系的材料是很不适当的。因为它既不能指明“本草綱目”这一偉大科学著作所以能完成的原因，也不能正确闡明这一著作問世的巨大意义。这种联系，实际上有害于課時目的的貫徹。總結中有些較好的例子，也正是由于联系的結果可以更好地揭示課的思想内容，更好地貫徹課時教學目的。

（二）要注意历史观点。注意历史观点就是說，既不要美化历史也不应醜化历史。既不能失掉历史課的战斗性与思想性，也不能牽強地联系当前的政治任务。

广雅同志們在講“隋文帝的改良政策”时联系的材料就存在这方面的缺点。因为“国家的富裕”和“生产的一定程度的提高”是这段历史时期的主要方面，因此把重点摆在闡述人民的貧困上是不对的。在講隋朝的时候，并且是在講当时社会生产正在向上有一定程度發展的时候来強調消灭私有制的重要，是違反历史观点的。当然若是把隋文帝时期的人民生活理想化了，同样也是錯誤的。

（三）联系的内容要为学生所能理解并且大体上为学生所知道因而无须作过多解釋的。例如在初中一

年級講課時聯系到王斌對待中醫中藥的資產階級思想是學生所不能理解的。

這次討論引起我們相當大的注意。我們認為要想徹底解決歷史課聯系現實的問題，應進一步討論一下如何把握課時教材的中心思想和正確地確定課時目的問題。蘇聯教學法專家瓦庚在他的“蘇聯中學高年級歷史教師的備課”一書中說：“實踐證明，第一個最困難的問題，就是確定一堂課的具體的思想教育教養

任務和揭示它的基本概念。”他接着指出：“這個問題是備課時最重要的問題。材料的正確選擇和配置，上課時教學的方式方法的選擇，都取決於這一問題的正確解決”。

我們覺得這種看法是很符合於我們所知道的目前情況的。因此我們盼望歷史教學刊物在這次討論告一階段之後能繼續組織大家討論。

（王學林執筆）

對於在歷史教學中如何聯系現實的意見

天津師範學院 黃光碩

在“歷史教學”一月號發表的三篇有關聯系現實問題的討論文章中，主要着重討論聯系現實的做法問題，這是比較具體的。但要徹底解決歷史課聯系現實的問題，還必須進行理論上的探討。我認為要解決聯系現實的問題，首先必須對“聯系現實”這一概念的含義有正確的理解，其次正如編者所提出的應了解聯系現實的目的和基本原則。我僅就個人的理解發表一點不成熟的意見。

對歷史教學中聯系現實的問題應如何理解，三篇文章都沒有明確提出。但從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們認為聯系現實便是“聯系現時生活”，或者只是在講課時加進一些現實生活的材料。我認為這樣理解是不夠全面的，聯系現實生活的某些材料，只能是聯系現實做法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這種理解會限制了聯系現實在教學中應有的作用。

聯系現實的問題，是學校教育中理論聯系實際的一個部份，而且是主要的部份。理論聯系實際是共產主義教育的一個主要特徵，也是新社會學校教育與舊社會學校教育的根本區別之一。

有人以為，歷史學科與自然學科不同，自然學科是直接服務於生產實踐的，在教學中又可以通過實驗、實習等方式來聯系實際，而歷史課則無法這樣做。這種說法是不夠全面的，社會實踐固然是以生產實踐為其基本形式，但“人的社會實踐，不限於生產活動一種形式，還有各種其他的形式，階級鬥爭，政治生活，科學和藝術的活動，總之社會實際生活的一切領域都是社會的人所參加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952年第二版，第271—272頁）歷史科學所研究的是人類社會生活中一切領域的綜合，它包括着階級鬥爭、政治生

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等等。所以它與現實的社會實踐有着密切的聯系。列寧指出：“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上的聯系，而要對於每一問題都根據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出來，以及它在發展中經過了怎樣一些主要階段的情形去觀察。”（列寧：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莫斯科1949年版，第408頁）這充分說明各種社會生活如果離開了歷史，便會成為不可理解的東西。歷史教學的任務，不僅是使學生了解人們的過去，而更重要的是認識現在；理解社會發展的規律和共產主義發展的遠景。所以歷史課聯系實際的問題，也就具有其本身固有的特點。它並不在於培養學生具有生產方面的技能和熟巧，而在於通過歷史知識的講述，闡明歷史的發展規律，使學生掌握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並運用這種觀點方法去認識現實，在社會實踐中去改造現實。

聯系現實並不是機械地等同於講歷史事實時加進一些現實生活的材料，而應該把歷史與現實生活有機地聯系起來。“從相同的史料中引伸出來”或“聯系現時生活”固然是聯系現實所必須的，但更重要的是教師能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方法，科學地、客觀地和具體地去闡明歷史的發展過程，指出其現實意義。

那麼聯系現實與理論聯系實際又有什麼區別呢？如上所述，聯系現實只是理論聯系實際中一個主要部份；我們不能以聯系現實來代替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理論聯系實際的範圍是比較廣泛的，方法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除了教師在課堂上正確地分析和評價史實，形成學生的歷史觀念與概念之外，採用現實生活中的現成材料，利用鄉土材料，學生的獨立作業，組織有關歷史課外活動和歷史問題的討論等，凡是能培養學生把歷史知識運用於實踐的做法，都是歷史教學

中理論联系实际的方式方法。

历史教学中的联系现实，实际上就是給学生作出运用历史知識来認識现实問題的示范。例如在講戊戌变法的失敗时，教师除了指出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之外，便可联系到只有走革命的道路，才能獲得今天偉大的胜利。这样学生便会認識到改良是錯誤的，只有走革命的道路才是正确的。同时教师还应在分析史实的过程中使学生掌握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

总而言之，历史課联系现实的問題是与理論联系实际密切相联的，它是历史課中实现理論联系实际的一种手段，也是理論联系实际的一个組成部份。

二

历史教学中联系现实的目的是什么呢？广雅中学历史教研組提出：“联系现实进行历史教学是能更好地达到教学目的和完成教学任务的。”北京師院謝承仁先生則認為：“比較完全的說法應該包括兩方面：对教师來說，联系现实是为了更好地闡述課本的内容，补充或修正某些观点和說法；对学生來說，是为了更好地啓發他們的思維，發揮他們學習的能动性，以便牢固地掌握知識。”这两种提法，都只是从完成教学目的和教学任务出發。当然，这也是联系现实的目的之一，但如果仅限于此，便会把联系现实的意義看得太狹窄了。正由于广雅中学把联系现实的目的只归結为“更好地达到教学目的和完成教学任务”，所以在联系现实的做法上，便只能是“有，便联系；沒有，也不可勉强”，“有用，便联系；沒有用，便要割爱”了。这便是說，历史有些和现实是有联系的，有一些則是沒有联系的。显然，这种說法便否認了他們在文章开头所提出的：“它（指历史）与现实是有天然联系的，學習过去就是为了現在，所以結合现实来講述历史是十分自然而且必要的”这一論点了。

我認為联系现实的目的，首先在于培养学生对历史知識的运用；也就是說，通过教学中的联系现实，使学生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去認識现实，理解现实和改造现实。广雅中学的历史教师由于在历史課中能联系当前国内外形势，引起学生对时事的注意和兴趣，这是做得很好的。謝承仁先生对这一点却發生怀疑說：“为什么历史課主要会培养学生學習时事的兴趣而不是學習历史的兴趣？为什么学生們經常不新要历史老师去作时事报告，而不是作历史报告？为什么成立学生課外活动小組是分析时事而不是研究历史？”当然培养学生學習历史的兴趣，作历史报告，研究历史是必要的；但学生如果能运用历史知

識来分析目前的形势，这正好說明學習历史已对認識现实起了作用，是應該肯定的。“學習过去就是为了現在”，这种联系现实的做法，正是联系现实中最主要的一面，这是指导学生运用历史知識去認識现实，理解现实的必要手段，它不但不会降低学生學習历史的兴趣，反而会增加这种兴趣。只有这样，才会使学生感到學習历史是有用的。我想誰也不能否認，學習知識的目的是为了运用它，只有書呆子才是學而不用。毛主席指示我們說：“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毛澤东选集”第一卷1952年第二版，第174頁）如果在教学中不去培养学生对知識的运用，那么我們所培养出来的年輕一代，显然是无法承担建設共产主义的偉大事業的。因此在历史教学中联系现实的目的，主要是要培养学生运用历史知識的技能。

其次，联系现实的目的还在于使学生能更深刻和正確地去理解历史，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教学目的和教学任务，使学生牢固地掌握知識。教师在分析或評價每一历史事实时，“…自然不应忘却历史远景，在观察过去某一事件时，他不能用当时人的眼光，他应从現代科学的頂点去解釋或評價这些事实”。（“历史科学的特性与任务”，第30頁。）如果离开了现实去評價历史，对历史便不会得到肯定和否定的东西，也便不知道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光明面与黑暗面，这样容易陷于客观主义的立場，学生学起来也会感到历史是一笔糊塗賬。联系现实对加深学生对历史的理解是很有帮助的。如广雅中学講德皇威廉二世如何指使其士兵殘酷地对待中国人民，联系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訪問中国时，送还义和团旗和“永乐大典”。这一对比联系就加深了学生对德国軍国主义者对我国侵略的本質的理解。課堂教学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能領会并牢固地掌握教师所傳授的知識，联系现实正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手段之一。

第三，联系现实的另一目的是啓發学生學習历史的自觉性与积极性，引起学生对學習历史的兴趣。目前一般中学生对學習历史的积极性是不高的，他們認為历史与现实生活无关，学不学沒有关系。这一問題的解决，主要依靠于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善于联系现实，便是解决問題最有效的办法。例如苏伊士运河問題是大家極為关心的现实問題，如果在世界近代史講到十九世紀英国对外侵略政策时，教师一面講述英国如何控制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历史，一面联系到現在苏伊士运河的事件，指出埃及的行动是正义的，而英法企圖保持殖民主义的統治是不可能的。这样不但加深了学生对英法侵略埃及的本質的認識，还会使他

們感到學習這段歷史是很有意思的。總之，只有使學生認識到這種學習對他是必要的、有作用的，他才能自覺地、積極地去進行學習。

總起來說，歷史課中聯繫現實的目的是：為了培養學生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去認識現實和改造現實，使學生能更深刻地去理解歷史，對歷史作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解釋，並激發學生對學習歷史的自覺性與積極性。

三

從聯繫現實的目的性出發，在歷史教學中應該如何去聯繫現實呢？這一問題，上海市第一女中歷史教研組引用了“蘇聯中學高年級歷史教師的備課”一書的一段話，其所談的原則是正確的，但也只說到聯繫現實的一面，即聯繫現時生活的某些材料時所依據的原則。聯繫現實的含義既然不僅是聯繫現時生活的材料，而且是包含着對現實生活的指導意義，所以我認為在歷史教學中聯繫現實所應依據的原則，有下列三點：

（一）既然聯繫現實的主要目的在於培養學生對歷史知識的運用，那麼在歷史教學中聯繫現實的最主要之點便是：教師應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科學地、客觀地和真實地去闡明每一歷史事實。從歷史過程和歷史發展的規律中，去揭示歷史的現實意義。從這一原則出發，任何歷史課程，不論是古代或現代，本國或外國，都與現實有着“天然的聯繫”。這一聯繫是存在於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之中，是原來就已存在的客觀的聯繫，而不是人為的聯繫。從這一原則出發，雖然在講述歷史時，教師並沒有談到現時生活，而只是給學生揭示了這一歷史事實的現實意義，這便已經達到聯繫現實的目的了。例如，在講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失敗時，教師揭示了右傾投降主義的危害性對於現實的意義，學生便會很自然地体会到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對於今天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重大意義，也會認識到反對右傾思想的重要性。在講述古代史時也是如此，教師只要闡明歷史發展的規律性，揭示歷史事實的階級實質，便能使學生更好地來認識現實生活。如講隋文帝的“改良政策”時，只要揭示統治階級實行某些改良的階級實質，使學生認識到這些改良主要是對統治階級有利，認識了統治階級實行改良政策的本質就夠了，而不必作過

多的聯繫。廣雅中學講這問題時聯繫到生產資料私有制，則有些公式化了。

總之，聯繫現實是每一堂歷史課都可以做而且也是必須做的。但聯繫不一定要加上現實的材料，如果為了聯繫現實，便人為地東拼西湊，實際上並沒有任何現實意義。

（二）在聯繫現實生活的某些材料時，不能從表面現象上去聯繫，而應從歷史事實的內在聯繫中很自然地引伸出來。廣雅中學歷史教師在講到“葡萄牙人強租澳門”時所做的聯繫，是很自然的。但講“明朝科學家李時珍”時所做的聯繫，便是表面現象的聯繫，其內容並不是從本課的中心綫索中引伸出來的，而只是因為“本草綱目”是藥學巨著，便聯繫到許多有關中藥和中醫的問題。我認為介紹“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主要是說明我國早在明朝便產生了這一偉大的科學著作，使學生認識這一科學著作的偉大意義。從這一綫索引伸出來，便可聯繫到目前政府正在組織人力來研究和承繼我國的醫學遺產；蘇聯對我國的醫學也極為重視，曾派專家來我國學習醫學，這樣聯繫會加深學生對李時珍所做的科學貢獻的認識。

（三）教師所聯繫的現實材料，應該是學生已有的經驗和知識。如果教師所聯繫的東西，都是學生所不能理解的，教師就必須費許多話來解釋，這樣便完全失去聯繫現實的意義了。即使是揭示歷史的現實意義，也應在經過教師系統講述，學生已領會了這些知識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如果不掌握這一原則，便會把歷史課講成政治課。廣雅中學的教師在初中一年級的歷史課中，聯繫到“生產資料私有制是人民貧困的根源”。為了闡明這一概念，又只好引用蘇聯的、我國的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材料來加以說明，這樣就形成了教師並不是在講述隋朝的历史，而是在講“生產資料私有制是人民貧困的根源”的概念了。謝承仁先生已提到的“應該注意結合學生的實際知識水平，學習時的思想狀況和有關學習、生活實際等各種條件”這一原則，我認為是很正確的。

在歷史教學中要正確地聯繫現實，除了正確地理解“聯繫現實”的含義，目的和原則之外，我認為廣雅中學歷史教研組在該文第三部分“聯繫現實的體會”中，所提出的幾點都是正確的。如果教師沒有掌握教材的內在聯繫，沒有深刻了解現實生活，沒有了解學生的實際，當然就談不到教學與現實的聯繫了。

关于分析和組織教材的几点体会

东北师大附中 王 鰲

教学質量的高低决定于教师的备课，而备课的中心环节在于教师深刻地鑽研教材。只有正确地分析和組織教材，才能保證教学的科学性、思想性和系統性。現在我以中国历史一个課时的教材——“南宋政府內部和战兩条路綫的斗争”、“金兵南下和南宋軍民的抗金斗争”为例*，来談一下我个人对分析和組織教材的几点体会。

一 正确地分析教材地位，掌握教材的內在联系，是保證教学科学性、思想性和系統性的前提条件。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的事物，而是和其他历史事件彼此相互联系着、相互影响着和相互制约着的。分析一个課时的教材时，首先需要探求它在某个历史时期中的地位 and 它与其他課时教材間的內在联系。

从整个中国通史来看，南宋是处于封建社会的中期，当时的經濟和文化在隋唐高度發展的基础上，由于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創造，有了进一步的發展。但是在國內外的政治关系方面，由于大地主阶级政府的高度中央集权，实行了对內全力鎮压，对外妥协退讓的政策，結果造成了无力抵御严重的外患，致使南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怯弱的朝代。

从第七章第七节教材的主要内容来看，它講的是北宋灭亡、南宋建国到宋金紹興議和这十五年間的历史。这一时期，金人繼續南侵，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南宋政府繼續实行北宋的政策。前一阶段破坏了李綱的抗战，后一阶段又破坏了以岳飞为代表的抗战派的斗争，并和敌人訂立了屈辱和約，因而兩次错过了收复失地的有利时机，出卖了民族的和人民的利益。所以，这节教材充分地說明了南宋是腐朽的北宋王朝的繼續和發展，是历史上最怯弱的朝代。这在揭露南宋历史特点上是很重要的。

“南宋政府內部和战兩条路綫的斗争”“金兵南下和南宋軍民的抗金斗争”这一課时教材的中心内容是：北宋灭亡后，黄河以北的人民在敌后奋起抗战，并支持李綱的抗金斗争，为收复失地創造了充分有利的条件，但以高宗为首的大地主阶级却橫加破坏，造成了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严重后果。这一課时教材对啓發学生深刻理解南宋的历史特点和系統地了解人民

的抗战路綫來說，都是承上啓下的重要一环。本課是前課所講北宋末年兩条路綫斗争的繼續，而又为理解下一阶段兩条路綫更加激烈的斗争以及斗争的基本終結，打下了基础。

我們認為这样由整体到局部的逐次分析，便于把握整个教材的体系，我們可以根据南宋历史特点来講授这一課，同时，又可以通过这一課的教材，来具体說明南宋的历史特点，使历史知識前后有机地联系起来，也就可以使学生較深刻地理解到南宋外患的严重，并不是由于中国民族和人民沒有力量，或是不願去抵抗外侮，而是由于南宋大地主阶级一貫实行对內鎮压、对外妥协投降政策的結果。在实践里我們深切地体会到，对每一課时教材的地位和內在联系的分析，都是用馬列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历史史实的过程，每一課时教材的内容都不是孤立的，是整体中的有机組成部分。

二 正确地确定教学目的、是严密組織教材、突出教学重点的重要依据，是貫徹政治思想教育的有力保証。

明确了教材地位及其前后的內在联系之后，就給正确地确定教学目的創造了条件。有了明确的教学目的，就能规划这一課时的知識和教育任务，确定講授重点，給組織教材和选择教法以方向。

确定教学目的的主要根据是教材的中心内容和中心思想。在分析教材中心内容和中心思想的过程中，就需要比較准确地找出这个課时的知識結論是什么，它要說明什么本質問題，它对学生的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以及共产主义道德品質的培养能增添些什么。我們就是按着这个方向来确定教学目的的。譬如我們首先分析这个課时的中心内容和思想，就是說明“南宋初期是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民族矛盾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不仅人民反对大地主政府对外投降，要求坚决抗金救国，就是統治阶级內部个别人物如李綱等，也反对投降，因而在南宋初期政府內部就出現了和战兩派的斗争。最初由于人民的压力和高宗本人为了稳定帝位，不得不任用李綱来抗战。在抗战派掌政

* 参考本文时請注意，文中所举实例是根据实行新教学程序以前的初中中国历史課本，教学对象是理解力較强的工农連中的学生。

时期，在敌后又军的配合下，曾造成了收复失地的有利形势。而宋高宗等为了大地主阶级一小撮人的私利，却惧怕抗战胜利，破坏了抗战，逃跑求和。结果由于投降派取得了胜利，因而不但错过了收复失地的时机，更招致了黄河以北的全部沦陷，江南也受到金军的劫掠，使民族危机更加深了。”根据对教材中心内容和中心思想的分析，确定了如下的教学目的：“使同学了解南宋初年由于人民以及人民支持下的抗战派的斗争，曾出现了收复失地的有利条件，但投降派却破坏抗战，逃跑求和，以致金军大举南侵，给人民带来很大灾难，最后在军民反抗下才使金军退去。从而使同学认识南宋内部和战两派斗争的消长，实关系着民族和人民的命运，其实质是反映了在民族矛盾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大地主阶级的投降路线和人民的抗战路线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借以进一步培养同学树立阶级观点和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坚决反对侵略和卖国，继承光荣的爱国主义斗争传统。”这个目的包括了使学生了解那些基本知识，透过知识的结论认识哪些本质问题，以及对同学进行什么品质教育这几方面。它包括了教养和教育两方面的目的，而这两方面又是相互密切联系着和相互依赖着的。这样的结论，不是额外附加，同时也符合南宋的和整个历史的教学目的的精神和要求。教学目的确定后，教学重点就易于确定了。所谓教学重点就是在系统讲解的基础上，为貫徹教学目的而需要突出讲解的教材的最本质的部分。譬如我们为了达到本课教学目的，就确定以“人民及在人民支持下的抗战派的抗战，和投降派的破坏抗战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为教学重点。

明确教学目的，把握住教学重点之后，就不难解决教材的取舍问题了。为了突出重点，达到教学目的，我们感到有必要重新安排教材的结构，并补充或删减某些教材。我们变动了的讲授次序和标题如下：

一、南宋政府内部和战两派的斗争和人民的抗金斗争

- (1) 李纲的抗战主张及其抗战措施
- (2) 河北、山西义军的抗金斗争

南宋初

的有利形势

- (3) 主和派破坏抗战及其南逃——主和派第一次胜利

本段小结

二、金兵南侵及其受南宋军民的抗击而败退

- (1) 金军大举南侵
- (2) 江南军民打退金军的入侵
- (3) 宋高宗偏安江南 宋都临安

本课小结

按上述教材结构来看与原课本的变动是较大的，这是否违背原课本的精神呢？我们认为课本是国家规定的教学工具和依据，当然要重视和尊重，不应随意更改，但考虑为了把课本里所提示的知识范围和基本问题更好地教给学生，就不能“照本宣科”。因此在符合课本的精神和教育原则的情况下，做某些变动、精简或补充是应该容许的。当然，重新组织教材是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的。

在这一课里讲授系统变动较大的是把河北、山西义军的斗争提到前面来讲，把防守在长江上、中、下游的抗战将领的抗战，挪到下一课讲岳飞防守长江中游的形势时再提。为什么没有象原课本那样按问题性质先讲投降派对内镇压，对外妥协，再讲人民抗战和抗战将领的斗争？原课本这样编排教材虽然眉目清楚，但严重的弱点是违背了严格按年代顺序来编写历史的原则，而且不能很好地突出重点，减低了思想性。我们认为把义军的斗争和南宋初李纲抗战同时讲授，不仅合乎按年代顺序讲授历史的原则，而且也更有它的内在逻辑性，能更好地说明抗战派的斗争和人民敌后的抗金斗争，是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赞助的关系，声势非常浩大，造成了对收复失地充分有利的条件。因此也就突出了人民的抗战路线，同时更有力地反衬了大地主阶级投降卖国路线的严重罪恶，从而突出了重点，加强了教学的思想性。从实际效果上来看，这样讲也是较好的，学生学完这节课后，一般都能很清楚地了解南宋初年的有利形势和宋高宗在这种有利形势下破坏抗战的史实，增强了对大地主阶级的憎恨。至于把防守长江流域的抗战将领的斗争，挪到下一课讲，不仅符合南宋奠都临安后的抗金形势和史实发展的时间顺序，而且对突出奠都临安前人民的抗战，并为下一课突出地说明岳飞抗战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友军的配合等都有益处。随教材组织结构的变化，为使标题符合每段的中心内容，并尽量使其显明和富于思想性，所以也就相应地更改了。

在对两条路线斗争的史实的叙述和分析方面，也做了适当的补充和删减。补充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形象而具体地理解中心内容的知识结论，要防止材料堆砌。删减的对象是那些次要的或枝节的问题，但要不损害教材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譬如在叙述史实方面，为了突出两条路线的斗争，使同学更深刻地理解人民抗战路线，曾补充了八字军和红巾军反侵略英勇斗争的典型事迹及金军大举南侵时，南宋军民奋起抗战打退金兵的某些材料。在分析方面，主要在阐明和战两派斗争的实质上做了一些补充。首先指出和战两派斗争的阶级性，人民对和战两派的态度，特别着重

地說明了抗战派和人民的关系，指出人民高昂的爱国热情推动了抗战派的斗争，反之抗战派的斗争也鼓舞了敌后人民的斗争，他们是互相配合贊助的。由此再进一步分析民族矛盾占主导地位时期，人民和抗战派的抗金斗争，虽然有阶级性的差别，但在对外抗金，对内反对卖国的斗争中要求却是一致的。抗战派的斗争也就反映了人民的抗战要求。所以和战两派的斗争，虽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反映了人民的抗战路线和大地主阶级卖国投降路线的斗争。这样結合叙述史实进行分析，就可使同学透过现象来明确这一课的最本质的问题。另外与本課关

系不大的部分，如南宋奠都临安后的斗争形势问题就删掉，挪到下課去講。对某些次要问题和某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为了突出重点说明中心问题，也做了一些删减。如高宗破坏李綱抗战逃跑求和，招致金軍南侵问题，只要把金軍在1129年南侵及其对江南人民的焚掠講清楚，能说明大地主阶级对内鎮压、对外妥协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就够了。至于从1127年十一月高宗南逃揚州后，金軍开始南侵时，曾被宗澤为首的抗战将领打退；待宗澤死后，当投降派将领杜充任东京留守时，金軍才得以在1129年二月大举南侵等詳細过程，就没有必要詳述了。

(上接第16頁) 經濟上以及一切社会傳統習俗中的不平等，这正是資本主义萌芽因素滲入农村，地主与佃农由隶属轉变为契約的关系，因而决定农民与地主之間矛盾斗争的新内容，也是新的思想意識的反映，因此，这次起义將为农業中的資本主义萌芽开拓道路。

这次起义虽然被鎮压下去了，但是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乃至封建傳統的旧習上，都給統治者严重的打击，起义的火焰，迫使統治者不得不向人民大众作有限度的讓步。首先是減輕賦稅礦課。如景泰三年四月令免金华处州无征稅粮①；正統十四年九月令“从实酌量减免浙江福建坑場所产采办不及額銀課”②。

其次是征办貪官污吏，对橫行的地主惡霸稍加压抑。如正統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派出專人往閩浙等地考察政事，令“遇县官之庸奸貪

酷者，黜削有差，以慰民心”③；景泰元年六月二十一日令处州“鎮守等官复实彼处小民田地被豪民侵占及准折私債者，一概追还，大戶詭寄別籍者，依律逮問，庶得盜息民安”④。

这些讓步虽然不可能徹底执行，但在一定程度內多少是推动了生产力發展的。如起义后的十多年間，政府对矿業的統制政策不敢严厉执行，取消“盜矿”的死刑处分⑤，說明政府的矿業的統制政策已經被“矿工”起义所冲破，給明代矿業發展創造了条件，也多多少少推动了明代資本主义因素成长。

① “英宗实录”卷二五〇，“景泰附录”卷二三。

② “英宗实录”卷一八三。

③ “英宗实录”卷一八六。

④ “英宗实录”卷一九三“景泰附录”十一。

⑤ “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第三三八卷：历年“矿禁”法令条文。

“历史教学”第十二卷合訂本（1956年7—12月号）于本月內出

版，各地新華書店均出售，特此預告。



对初中課本世界史上册的一些意見

本刊收到了讀者对新編中学历史課本的一些意見，這些意見涉及課本的科學性、思想性和系統性等各个方面，我們都轉給人民教育出版社課本編者看了。讀者意見中所談到的問題，有些在再版時已經作了修改；另有一些，課本編者準備在以后修訂課本時參考。我們現在先綜合發表一部分有关初中世界史上册的意見。

大家所提的寶貴意見，对于訂正課本上的錯誤和提高課本質量有很大的幫助，課本編者委托本刊向提意見的同志們轉致謝意。——本刊編者

一 河南鄭州師範專科學校楊連山的意見：

(一) 課本第21頁，談到古代埃及農民的處境時說：“農民經常處於半飢半飽的狀態。遇到歉收的年份，就有幾千萬人餓死。”我們認為埃及在中王國時期農民負擔很重，遇到荒年，會有許多萬人餓死，但絕不至餓死幾千萬人。當時埃及的土地面積和生產力水平是養活不了幾千萬人的。現在埃及的人口也僅僅約二千萬人。（按：因校對疏忽，誤將幾十萬人餓死刊為幾千萬人餓死。課本出版後，已在“刊誤表”上更正。——課本編者）

(二) 第107頁寫道：“二世紀以後，我國的養蠶術傳到中亞一帶，後來，東羅馬人從中亞學會了養蠶的方法。歐洲人就掌握養蠶繅絲的技術了。”但在課本第112頁又談到：“六世紀時候，東羅馬人從我國學到養蠶的方法。東羅馬境內開始有了蠶絲業。”究竟東羅馬人的養蠶方法是從中亞學到的還是從中國直接學去的？是二世紀還是六世紀？我們根據普洛科庇阿斯的“哥特戰記”（查士丁尼朝戰史第五冊第227—231頁）及另外一個史料上的記載，證明東羅馬人從我國學到養蠶的方法是直接的，而且是在六世紀。

（按：“刊誤表”已更正過）

(三) 第115頁敘述東羅馬（拜占庭）在七世紀中期外族入侵時說：“從多瑙河北岸南移的斯拉夫人，那時候也開始威脅到羅馬的邊境了。”柯斯明斯基著“世界中世紀史”第64至65頁中寫道：“斯拉夫人最初大規模地侵入巴爾幹半島，是在六世紀初。”“到七世紀中葉，斯拉夫人的居地幾乎遍布於巴爾幹半島。……有不少人移居於小亞。”和謝苗諾夫著“世界中世紀史”第69頁中寫道：“在七世紀前半期和七世紀中葉，居住在多瑙河的斯拉夫人，組成了

稱為多瑙河畔斯拉夫人的七個斯拉夫部落的相當大的聯盟。”由上兩書所說來看，斯拉夫人在這時不但大量移入東羅馬境內，而且定居下來了。

(四) 第57頁在希波戰爭中談到波斯進軍中希臘雅典求救斯巴達時說，“一次是在公元前490年，波斯的軍隊在亞狄加的馬拉松登陸，那里離開雅典只有一天路程。一個雅典勇士從馬拉松出發到斯巴達去求救，他在四十八小時里走了一百五十公里。”而在許多書上都是這樣說的，當時曾派奧林匹克運動會競走冠軍斐地比底斯勇士到斯巴達去求救，他回到雅典後又趕到馬拉松參加作戰。馬拉松一戰雅典取得了完全勝利後，他又立刻從馬拉松被派往雅典報信。當他跑到雅典時，已精疲力盡，只嚷了兩句話“高興吧，我們勝利了！”便仆地而死。因而我們認為這一點應該按照史實加以修改。

(五) 第121頁，敘述查理曼帝國的瓦解時談到：“查理曼建立的帝國是不穩固的，那只是個各部族、各封建國家暫時的極不牢固的聯盟。”我們認為查理曼帝國，不是一個各封建國家的聯盟，其內部並沒有形成什麼各封建國家。在謝苗諾夫著的“世界中世紀史”第30至34頁中談到，查理曼帝國是一個早期封建帝國，內部是不牢固的，不但有各個不同的部族，而且日益形成的地方大封建領主在地方上占有許多莊園，並擁有政治權利和許多依附於自己的小騎士。並沒有談到帝國是一個各封建國家的聯盟。這種提法和課本第122頁的內容也是有矛盾的。課本所談：“到九世紀末，在查理曼帝國的舊境上形成了三個主要王國，西法蘭克，即法蘭西王國；東法蘭克，即德意志王國；還有一個是意大利王國。”正說明三個王國的形成是在帝國分裂之後，而不是在帝國存在之時。

(六) 第117頁談到法蘭克封建化过程时, 時間概念不够明确。應該明确标出从克洛維时代(481—511年)到查理曼时代(768—814年)的三百年間, 是法蘭克封建領主势力逐漸强大、自由农民被压榨剝削淪为农奴的过程。

(七) 第44頁对古代印度“賤民”来源的解釋不够确切。課本說: “还有一种不属于任何种姓的人, 他們是俘虏, 被称为賤民。”但古代印度賤民来源并不完全是俘虏, 还有其他方面的来源, 其中主要来源是高級种姓与奴隶通婚(奸)所生之子。

二 浙江定海中学叶建亞的意見:

(一) 課本第38頁在談到波斯王大流士統治时, “从国都有一条大道直通到中亞細亞的爱琴海岸”, 应改作通到小亞細亞的爱琴海岸。(按: “刊誤表”已作更正)

(二) 課本第43頁对古代印度北部統一的时间肯定为公元前五世紀左右, 这和普通說法不同, 狄雅可夫和尼科爾斯基合編“古代世界史”(日知譯, 第214頁)上說: “公元前315年他(按指旃陀罗笈多)成为全部恒河各地的国王……旃陀罗笈多在印度历史上第一次創立包括整个印度北部即亞里亞塔發地区的强大王国, 遂建立了孔雀王朝。”这是把時間确定在公元前四世紀末。陈和山編的“世界文化史講話”中也說它是前四世紀統一的。

(三) 課本对于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内容, 簡單地写道: “沒收奴隶主非法侵占去的土地, 分配給破产的农民。”我們認為这种提法不够具体也不够妥当。因为沒收的不是貴族、奴隶主所侵占公地的全部, 提比略·格拉古的意見是每个“家主占有公田不得多于500犹格(約125公頃), 長子和次子, 每人占有公田不得多于250犹格。……这样, 一个家族所有不会超过1000犹格。……多出来的土地按30犹格一分划成小塊, 分發給貧窮公民世襲租种, 但不許出賣”①。我們建議把改革的内容, 写成“沒收奴隶主超过規定数量的公地, 划成小塊分給破产农民世襲耕种”。

(四) 課本第109頁說: “西羅馬帝国灭亡后, 日尔曼人在西羅馬帝国境内建立了很多国家。”这种写法需要再考虑。西羅馬亡于476年, 而早在它灭亡之前, 即在419年西哥特王国已成立於它的外省高盧, 439年汪达尔王国也已成立於它的非洲領土上了②。因此是否可以把它改作“在西羅馬灭亡前后, 日耳曼人在其境内建立了許多国家”。

(五) 課本第19頁說到埃及“有一个神庙使用八万六千名以上的奴隶同时工作”, 这个数字是有待考査的。虽然这里指的是孟斐斯亞孟神庙, 即最大的太

陽神——賴的庙, 恐怕也沒有这样多的奴隶。神庙里奴隶的来源基本上是靠国君所贈送的战俘。而有名的远征者, 古埃及第三王朝最末一个法老西洛夫魯在他征服努比亞的战役(規模最大的一次)中所獲得的战利品中, 奴隶仅七千③, 就是这个数字狄雅可夫和尼科爾斯基还認為是有些誇大的。著名的侵略者吐特摩斯, 在一次征服巴勒斯坦这个富庶的地方后, 运回去的奴隶也只几千人④。他送給亞孟神庙的也只是战俘中一部份, 約一千人⑤。因而我們認為古埃及最大一个神庙的奴隶数目以焦敏之主張的“八千六百人”⑥, 較為恰当些。

(六) 課本中第44頁在講印度的种姓制度时, 說賤民不属于任何种姓, 这需要再考虑。种姓制度最末的“首陀罗”不仅仅指的是奴隶, 它包括許多种姓亞群, 而賤民是雅利安人最后征服的部民——“差大拉”(在恒河下游)和“帕里亞”(在德干高原)⑦, 也屬於第四种姓。不能把他們說成种姓以外的人。这些人在当时是很多的, 到現在这些被压迫的种姓还構成今天印度居民中將近七分之一的人口。

(七) 初中世界历史上册教学参考書第75頁告訴我們: “从社会的發展过程來說, 关于氏族制度的怎样逐步变革, 国家机构怎样由局部而至全部代替了氏族制, 古代雅典的历史提供了最好的具体研究材料。”第三編第二章教学目的中, 也叫我們講清雅典国家与斯巴达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不同点; 可是課本的第53頁最后一段並沒有突出地說明国家是在氏族崩潰基础上逐漸形成的。使人看去, 反感觉雅典国家也好像是在武力压服附近各公社而成的。我們認為有修正的必要。

(八) 課本第74頁說“大夏……由于跟我国和西部亞洲进行了頻繁的交易”, 所以城市兴起来了。可是同頁又說“古时我国人知道大夏已經在它初受大月氏統治的时期”。这两种提法好象有些矛盾, 既然在它还没有被大月氏統治之前就已經与我国进行頻繁的貿易, 那早就該知道他們了; 絕不是等到公元前138年(正是大夏被大月氏征服的第二年)張騫出使西域时才知道的。所以这点也值得研究。

① 米舒林著、王易今譯: “古代世界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 第241—242頁。

② 參閱“世界历史掛圖”中古部第一幅, 1955年二月再版, 大中国圖片出版社出版。

③ 日知譯: “古代世界史”, 第118頁。

④ 同注③。

⑤ 同注①, 第32頁。

⑥ 焦敏之著: “古代世界史綱”, 第14頁。

⑦ 同注③, 第209頁。

(九) 課本第四編第一章第一节中关于羅馬在地中海霸权的形成一段里, 最好在对外战争中加上“东方战争”, 使学生了解这时羅馬还灭亡了馬其頓、希腊, 又打败了条支。这对以后講“斯巴达克起义、西西里奴隶起义”, 大多是东方叙利亞和色雷斯被俘去的奴隶”, 可以前后呼应。

(十) 課本第83頁說西西里第一次奴隶起义是在公元前138年, 第87頁說斯巴达克起义是在公元前73年。这和过去使用的課本的說法不同, 和一般参考書的說法也不同。旧課本、苏联学者米舒林編“古代世界史”(王易今譯, 第249頁)和焦敏之著“古代世界史綱”(1949年版, 第224頁)都說西西里第一次奴隶起义是在公元前137年。旧課本和米舒林著的“斯巴达卡斯”(馬雍譯, 第106頁)都說斯巴达克起义是在公元前74年。新課本上的这两个年代是否錯了?(按: 斯巴达克起义和西西里奴隶起义的年代, 应各为公元前73年和公元前138年。米舒林認為是公元前74年和公元前137年是不对的。柯瓦辽夫在1955年苏联“历史教学”月刊上發表的“中学古代世界史的新課本”一文里已有詳細的說明, 苏联的历史課本也已經作了更正。——課本編者。)

三 北京女八中孙永淑的意見:

我認為初中世界史上册中有些材料精簡得过多。例如:

(一) 課本对古巴比倫談的太少。它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学生是不可能通过一堂課的簡單內容来認識古巴比倫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

(二) 雅典在許多希腊国家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关于雅典国家的形成, 課本講的很不够。如53頁上所講的“雅典公社”, 究竟是氏族公社呢? 还是过渡到阶级社会时的农村公社或城市公社?

(三) 希波战争后希腊奴隶制的发展, 在課本上已列为一个标题。但在这一节里, 沒有对随着奴隶制度的发展而出現的希腊社会阶级斗争的加强以及希腊国家之間的矛盾的日益加深等問題留下一个伏綫来和后面的教材前后联系起来, 仅在課本第59頁輕淡地提了一句。这是不够的。

(四) 羅馬国家形成前的情况不完全与雅典相同, 而羅馬的扩张在羅馬的历史中, 又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課本上把这两个重点放在一节里, 就显得教材过于精簡。象羅馬城市公社形成的時間沒有交代; 平民与貴族的長期斗争沒有較完整的介紹; 布匿战争第一次开始的年代沒有交代; 第二次与第三次布匿战争之間的东方战争, 究竟羅馬侵略东方的什么地方也未說明。

(五) 課本把西西里的奴隶起义与意大利的农民运动, 还有格拉古兄弟的改革都放在一节里, 意大利农民运动的材料精簡得只有一句話。但在这一节的大标题上却标有意大利的农民运动, 分量輕重不太相称。

四 郑州第五初級中学曹玉書的意見:

我願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供課本編者作参考:

(一) 目录里列有“古代亞洲和非洲的最早国家”(第1頁第3行)。我們認為古代亞洲的国家既放在后边去講, 目录上的标题安排, 也应该与課文順序相吻合, 把“非洲”列在前边。

(二) 第21頁第3行写到“埃及农民的处境也不比奴隶好一些”。我們認為古代埃及农民虽然曾受到国王和州尹的殘酷剝削和压迫, 但农民和奴隶不論是在經濟上或政治地位上是要稍微好一些, 否則, 那不就等于說古代埃及的农民即奴隶, 奴隶即农民; 从同頁第11行到12行所提的“許多农民因負債变成了奴隶”来看, 农民的处境也是稍微好于奴隶的。我們建議把“好一些”改为“好多少”。

(三) 第50頁第23圖里写着“薩拉米”, 但在第58頁第26圖里却写着“薩拉米斯”, 在第59頁第4行中也是如此写的。为了不致給学生造成不必要的疑問, 还是前后統一, 較為恰当。

(四) 第88頁第40圖里, 說明欄中的第6行內所說“奴隶起义胜利战場和年代”, 我們認為所指不應該仅限于公元前72年的胜利战場和年代, 可以包括整个起义的胜利战場和年代, 如在加普亞城就可以标明胜利的符号和年代, 以免使学生造成一种錯覺, 好象除公元前72年奴隶們在意大利的一兩地取得胜利之外, 再无其他的胜利。我的意見是在說明欄內不写年代, 并在“起义”后边加上“主要”二字, 在圖中可标明胜利的地点和不同的年代。

五 哈尔滨第四中学姚崢山的意見:

課本第55頁“雅典奴隶制国家的确立”一节这样写: “梭倫的改革, 消灭了原始公社制的殘余……”我們認為这样写法是有問題的。恩格斯关于梭倫改革曾这样談到: “……氏族制度又遭受新的失敗。……党派底斗争还是繼續着; 貴族想恢复他們以前的特权, 在一个短促期間內并獲得了胜利, 直至克萊斯特納斯的革命(紀元前509年)徹底顛复了他們, 氏族制度底最后殘余遂隨他們而俱亡了。”^①這說明梭倫改革的作用, 只是确定了雅典的奴隶制国家, 并未徹底消灭氏族制度。

①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第111—112頁。



問：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距今五十万年，还是五、六十万年？新石器时代距今一万年还是五、六千年？（大同第三中学支秉坤）

答：在考古学上对石器时代的年代，一般只能求出它的相对年代，也就是根据

地層堆積的前後來決定遺址或文化的年代先後。最近雖然可以採用放射性同位素（炭14）來測定比較正確的絕對年代，但也只限於25,000年以內，其中仍有許多誤差。且在我們古代遺址的研究上還沒有採用，來測定新石器時代或較早文化的絕對年代。關於這種測定，請參看“考古通訊”一九五五年第四期，夏鼐“放射性同位素在考古學上的應用”及裴文中“關於考古和第四紀地質工作上一些新方法”。

旧石器时代因为久远，其年代在地質學或考古學上只是一個估計的數字。一般公認的說法是開始在五六十萬年以前，如中國猿人文化就假定在五十五萬年以前，甚至有人主張旧石器時代的開始應該在一百萬年以前。由此可以看出它的絕對年代的誤差數字是如何懸殊了。地質學或旧石器時代考古學的時代因為是概略估計，往往可以差到幾萬年甚至幾十萬年。

新石器時代的開始年代，在世界各地可能還是不甚平衡的。伊拉克新石器時代最早期的查摩文化，經用放射性同位素測定的結果，是在6707年以前，因此可以知道新石器時代的開始年代在六七千年以前，大體是可信的。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絕對年代，因為還沒有經過放射性同位素的測定，很難確定它們的絕對年代，我們更無須去做多餘的估計，只要知道它們正確的相對年代就夠了。至於過去安特生所謂的“齊家、仰韶（半山）、馬廠、辛店、寺窪、沙井”的“六期”說法以及所估計的絕對年代，都不過是出於揣測，不僅絕對年代不可靠，即相對年代也是錯誤百出的。（安志敏）

問：什麼是驛站？

答：唐代為了傳達政令和供官吏使臣來往食宿及交通工具，特設立驛傳制度，在主要交通綫上設立驛，非通途大路則設館。驛設驛舍，亦稱傳舍、郵舍。據“六典”載，凡三十里設一驛，天下凡一六三九所，其中二六〇所水驛，一二九七所陸驛，八十六所水陸相兼（按“玉海”一七二“理道要訣”：“驛千三百八十八”；“通典”三三“職官”：“凡天下水路驛一千五百八十七”。大概驛數不定，時有增減，故記載頗有出入）。若地勢險阻及須依水草則不必三十里。在陸路上，量驛之閑要以定其馬數；在水路上，亦量

事閑要以置船。凡馬三給丁一人，船一給丁三人。

設立驛站之通途大路稱驛路，唐代驛路大體可分下列四條：（1）由長安南至成都，（2）由長安沿丹江漢水至荊州、長沙、廣西、越南，（3）由長安經洛陽至山東，（4）由長安至范陽。驛路上甚為擁擠，如“國史補”載：“滎池道中……官私客旅，群隊鈴驛數千”。

乘驛者，在京師于門下給券，在外于留守及諸軍州給券。驛傳供給是有限制的，如長安四年規定：

“乘傳人使事閑緩，每日不得過四驛”；元和十一年規定：“事非急切者，不得乘驛馬”（會要六一）。

“唐律”更載明：“諸不應入驛而入者，笞四十；輒取供給者杖一百”。

每驛置驛長一人，“以州里富強之家主之”（通典三三），如定州大富何明遠曾“主官中三驛”（太平廣記二四三）。安史之亂以後，因民貧不堪命，遂以官司掌之。除每驛之專知官外，又有京兆尹、觀察使、刺史等遞相監臨，臺中有御史充館驛使，專察過闕。元和時亦曾以中官為館驛使。元和五年又規定，諸道節度使、觀察使等，各選清強判官一人，專知郵驛。大概在開元時，專知傳驛官的任期是有一定期限的，“一差定後，年限未終，所由不得輒迴改并別便及別報勾當”（會要六一）。在中央，駕部郎中員外郎“掌邦國之輿輦車乘及天下之傳驛”（六典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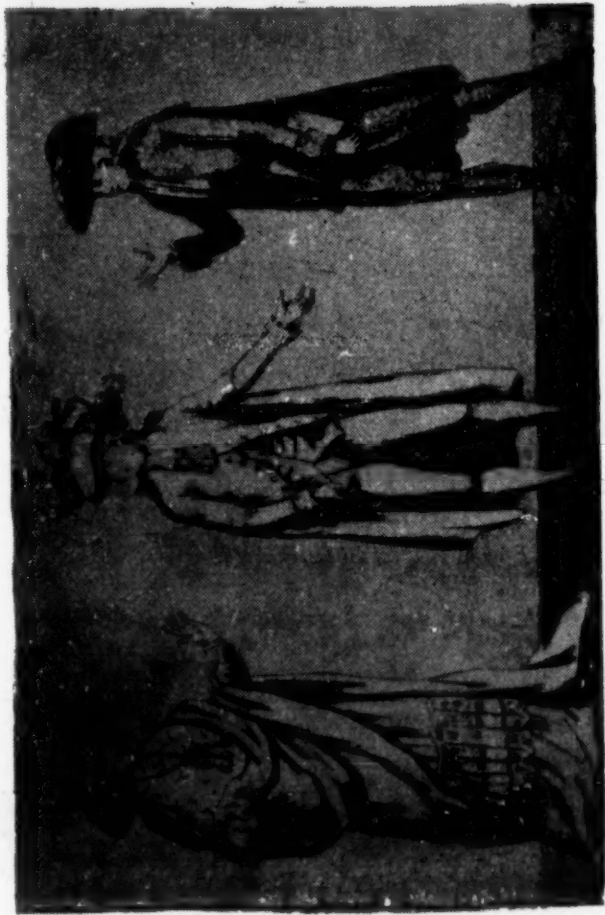
驛傳經費最初是官“給錢以資之，什物并皆為市”（同上）。會昌時，大概因為經費不足，更“量州縣大小及道路要僻，各置本錢，逐月收利”（冊府元龜四八四），於是驛傳就靠官營高利貸來維持了。

事實上，享用驛傳之官吏往往并非因公往來，郎官請假拜掃亦給公乘，常參官私事請假并給券牒。安史之亂以後，使命繁并，館驛空虛，於是“道路不修，驛馬多死”（舊唐書李渤傳）。加之諸道又濫給券，往來使客又多為武臣，“踰越條流，廣求供給”（會要六一），“苟不供給，必致怨尤”（冊府元龜四八四）。亦有“驛吏稱不見券，則隨所索盡供”的情況。南方江淮之間，乘券牒使命等，“或使頭陸路，則隨從船行；或使頭乘船，則隨從登陸。一道券牒，兩處只供”（會要六一）。以上各種情況均使驛傳制逐步走向崩潰，同時亦增加了人民的負擔，發生了“害物扰人”的作用。這種情況是與唐帝國之走向分崩離析的趨勢相一致的。

除官辦驛館外，私人旅店亦備驛驢，專供客商之用，如“東西宋汴，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丰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詣荊襄，此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近數千里”（通典七），這與唐代的商業繁榮是分不開的。（胡如雷）

世界歷史參考圖片(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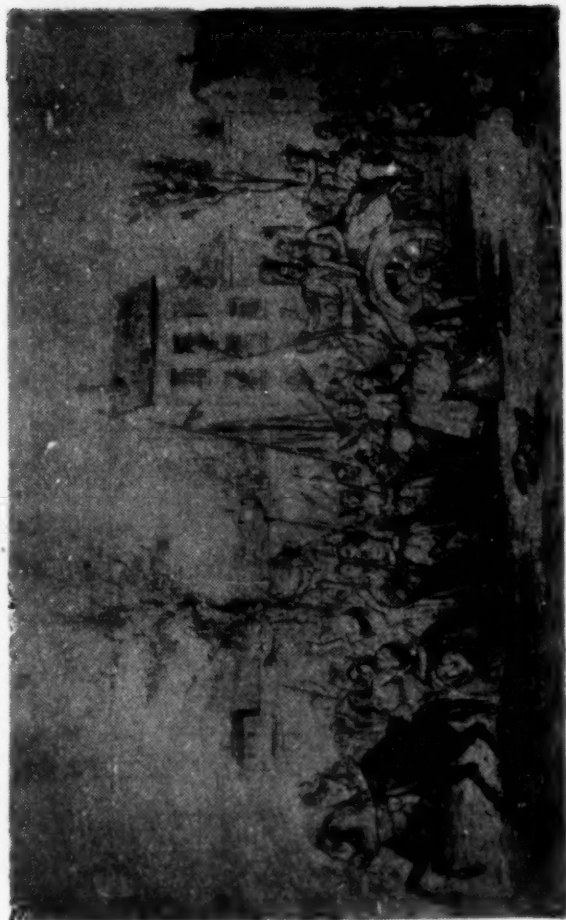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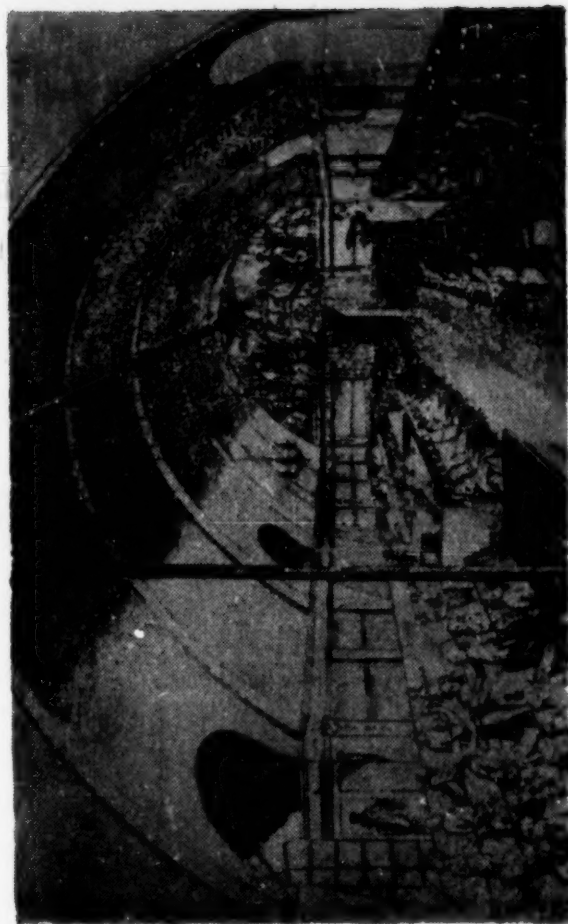
圖一 三級會議代表的服裝：自左而右：(1)僧侶，(2)貴族，(3)第三等級(采自布林吞：“革命的十年”，插圖1)。



圖二 第三等級代表在網球場宣誓，在制憲法前，決不解散，1789年6月20日(采自前揭書，插圖45)。



圖三 巴黎婦女向凡爾賽宮出發，向法王請願，1789年10月5日(采自前揭書，插圖5)。



圖四 雅各賓俱樂部(采自前揭書，插圖2)。

天津人民出版社最近新書

鐵木前傳

孫犁著

0.26元

本書敘述：木匠黎老東和鐵匠傅老剛原是很好的朋友，他們的兒女，在童年時期，也有過一段互助互愛的生活。但在農村合作化的前夜，因為思想和對待新的生活態度不一致，兩位老朋友的关系變壞了，兒女間的感情也發生了裂痕。（作者還準備寫作本書的續篇：“鐵木後傳”）

又一個浪頭

張鎮江著

0.26元

本書是青年作者張鎮江同志幾年來寫的短篇小說選集。“青春長在”“祖國，我來了”“春雨”等几篇是描寫部隊生活和軍民关系的；反映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村新面貌的，有“一個農業社”“又一個浪頭”“拖拉機手和農具手”“水到渠成”等几篇。這些小說對忠實於祖國的榮譽軍人和服從祖國需要的轉業軍人做了細緻的描寫，也生動地描述了農民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的思想鬥爭和農村的新變化。

續黃梁（評書“聊齋志異”選集第十集）

陳士和口述

0.17元

這是“聊齋志異”中一篇人民性比較強的故事。它描寫一個熱中於功名的曾孝廉，夢中作了宰相，驕侈淫逸，強取豪奪，無惡不做，後來被參，把官丟了，反過來又受到他所坑害的人們的報復。夢醒之後他回心轉意，放棄了功名利祿思想而隱居起來了。作者通過這個夢里故事深刻地描繪了官僚地主對人民的壓榨和人民對他們的痛恨。

在未來的街道上（科學小品）

本社編

0.14元

本書共包括五篇科學幻想的文章，其中“地球外面的驛站”詳細地說明我們可能如何建造人造的地球衛星——宇宙間的科學基地，以使用它來研究和征服宇宙；“未來的原子飛機”是假想我們怎樣應用原子能發展航空事業；“地球深處的能”是啓發我們積極想法利用這些取之不竭的地下熱能；“在北極的冰下”是設想原子能潛水船將給北極海運帶來光輝的遠景；“在未來的街道上”是述說一種新型的自動化汽車，會要在即將到來的日子裡，奔馳在城市的街道上。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

各地讀者、作者請注意：本刊已在郵局辦理“新聞稿件零寄整付”登記，以後來稿請在信皮上注明“零寄整付登記証35號”并請在信角上剪口，以免發生欠資罰款現象。

